

「旁若文學專輯」弁言

比喻，人外，去臉，語奏*

洪凌** (專輯主編)

在正式研究旁若文學理論之前，我對“para”這個字根意義產生極大興趣、其後持續認識並梳理相關理論的契機，是在1997年。彼時臺灣的女性主義運動出現巨大的裂解，被命名為「婦權派」(卡維波1994)的廢(公)娼女性學者們激昂熾烈地宣稱，「女人(之間)」的邊界與定義必須被編派為「宿主」與(未被言明但無法不被讀出的)「寄生」(parasite)的「重分配」，纔得以成立。¹ 在這場影響了接下來二十餘年的「性戰役」，

* 在將近兩年的時間，從開始發想如何招募以「旁若」為關鍵字的論文，到將近結束此專題編寫的此時，首先要誠摯感謝同儕與好友、邀請我擔任此專題特約主編的廖勇超。他不只提供學術期刊的篇幅與相關資源，而且在每個步驟都與筆者一起思考許多關鍵性的難解議題，並且在此專題內擔任壓軸對談文章的「共奏者」。此外，對於慷慨提供論文、對於旁若文化政治提出洞察力與可能有效方案的論文作者(白瑞梅與林宛瑄)，讓本專題的形成儼然是複數「旁若域」(para-sites)的交集與碰撞。在充滿磕磕絆絆、且走且戰的這段時間，最不可或缺的助力，是在編寫過程中以多觸手模式為我處理編輯與校對大小問題，以及在本專題最後一篇文章擔任紀錄撰稿與「小編」的呂東昱。

**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

1 此說法源於林芳玫的論文：「性慾政治的提倡者甚少獨自舉辦活動宣揚其主張，而是以現成的組織活動、事件作為其行動場域」，由於「性解放派不願開創自己的組織，反而寄望於性別路線的婦運組織」，這種「性慾政治之性解放派緊貼住性別政治之婦運組織，視其為宿主」(1998: 58-59)。在本篇導言，我並不打算重返臺灣女性主義在1990年代的論戰，對這個題目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我已經出版的這幾篇論文：〈排除與補殘：從晚近同婚倡議探究台灣性別政治的鬥爭與整合〉(2015)、〈多元作為遮蔽：台灣性別主流化造就的政治無意識〉(2016)，以及“Pluralism as Cover: Gender Mainstreaming and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2019)。

中外文學 · 第48卷 · 第4期 · 2019年12月 · 頁7-17。

掌握命名權的勢力視為「寄生(虫)」的群聚，包括對當時女性主義的「國族轉向」感到疑慮的學術研究者、在同一個組織(婦女新知)進行不被中產婦運所見容的性政治工作的成員(以至於被嘲諷為「寄生」了辦公室資源，彷彿吸血蒼蠅，或電影《異形》(*Alien*, 1979)會覆蓋臉部並將卵植入宿主體內的抱臉體(face-hugger))、以及很難被收攏納入正典「女—性」(female sex/sexuality)的娼妓們。

在白瑞梅的〈幻設轉向：「千禧年」之「喻」〉，無論是此論文處理的兩套幻設小說系列，或是作者分析目前的跨國文化政治趨勢，都讓我驚喜且震驚地感受到那股在1997年隱約觸及但難以明說的「分而治之」治理—統籌模式。自從19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如同注重經濟分配與階級分斷的左翼理論所言，逐漸席捲了總是一直前來的「未來」(yet-to-come)，掠奪並強化階級分斷。在文化政治與文學創作的兩股知識生產領域，具有洞見但不(被納)入主流(宿主)地位的幻設書寫，往往在「宿主」開始進行反省，驚覺自身可能誤識了「(惡)敵」與「我(族)之前」，就預先覺察了在現實事件到來之前的破壞性後果。《千禧年》系列的「龍紋身女孩」沙蘭德、《比喻》系列強大召喚力的異能者蘿倫，都不只是「個別角色」。她們一方面比喻了幻設(作者與讀者共組的社群)在閱讀(認識論層面)與構築(方法論層面)的奇異(weird)稟賦，另一方面，兩位主角異曲同工綻放的(被)病理化才情(talent)，亦不見容於這個高度壓制且精細管理「不良」人口(對比於上世紀末「良婦／良民」概念)的新自由主義當代。這兩個密切嵌合於旁若文學／文化政治界面的「比喻力量」(parable, para-ability)，冷眼凝視著時間朝向看似完滿、彷彿成為歷史終點(未來)。創作者巴特勒看穿了前者所(無法)遮蓋的西方問題性——從「過去」到每一個現在此刻的橫徵暴斂。她寫出陰冷抑鬱的近未來美國，也讓不正常的才情成為解套可能的寓／喻言，置疑又戳破了美國帝國主義內的自由進步主體的一廂情願。² 如白瑞梅所言，這兩個

2 大概的意思是，在尚未前來的流態時間地圖劃下定錨，樂觀盼望著虛妄的「人類—平等—全體」是一艘解決所有不對等問題的大船，航向第一世界規劃的美好結局。

系列在敘述與權力位置的「幻設比喻」解離了貌似必然的「保護者—掌權者」與「受制者—疾患者」兩端，提供了曖昧不明的拉鋸：「科幻語彙誘發的閱讀模式，得以將上述被問題化的同理心和單向透明，以及莎蘭德身上的怪物性，抽離出一般殘障、特殊才能、犯罪故事所預設的個體化敘事模式，而通常認證這些敘事的科學知識，是受過正規教育背景的專業階層產出的。她的角色光環將同理心的稀有，連結到更寬廣而深遠的資本主義發展史，但也讓性暴力批判脫離了新自由主義對良善公民與家庭的權利保護語境，甚至使這種語境在莎蘭德身上顯得相當狹隘」（白瑞梅 2019: 34）。

更值得深思的是，巴特勒的《比喻》系列寫作於1990年代。美國尚未遭逢強大極右翼與白人至上主義反撲的彼時，作者就逾越了時間次序，³ 鮮活地預見—預演—遇見了一個或可稱為「超（後設）—川普」（meta-Trump）政權的惡托邦（dystopia）。這些在近幾年才明顯發作的意識形態病徵，巴特勒卻早在北美與西歐歡慶蘇聯東歐等共產黨政權垮台不久的二十幾年前，就能夠以「跨時」⁴（trans-temporal）的視野，打開「平行宇宙之眼」，從事鉅細靡遺的設想與推論。如同白瑞梅的推論，羅倫的角色影響了《千禧年》系列作者寫出主角沙蘭德，尤其是她橫跨「怪物（近乎超能力）」與「失能」（拒絕／缺乏共情）的非常態性／別位置。更有意思的是，羅倫這位過度共情以至於成為病患（精神病理學認定的共情失調症〔empath disorder〕⁵）與「教主」（cult leader）的典型，繼巴特勒寫出

3 這也是旁若文學有別於其他書寫的特質之一，我暫時命名為「時間觸肢」（tentacles of time）。

4 意指旁若文學創作者有能力將時間轉化為「類空間」的「場域」。如此的操作方式可連接文字的配置，也就是「旁若」這個字根所涵蓋的「字詞位置調動」。

5 由於過度共情造成病理症狀的一般寫法是“hyper-empathy syndrome”。然而，在巴特勒的《比喻》系列與在本專題另篇論文也有大幅度分析的《漫長的冬季》（*Winterlong*），兩位創作者不約而同，都以更特定的“empath disorder”來形容這等不只精神醫學定義的共情溢出，而是讓主角接近怪物生命（具有侵入並破壞他者與自我能力，或改變周遭生命）的超額能力。

這兩部小說之後，出現了令人驚豔的傳承者。在Netflix的電視劇《先見之明》(OA, 2016 & 2019)由影集主創與主演者瑪琳(Brit Marling)所再現的跨次元漫遊者，就是個共情過剩的超生命：某個介於生物人與他者物種的「中介—使者」(既是傳遞訊息者，亦是超生命「原初天使」[Original Angel])。在第二季，主角來到了類似但不同於第一季的平行(旁若)宇宙(para-llel Universe)，短暫接觸了克蘇魯神話(Cthulhu Mythos)設定的超卓生命體「太古之夜」(Old Night)。這一幕讓「使者—怪物—奇才」三位一體且以OA為「真名」的主角，歷經了共情溢出而瀕臨死亡的閾值。另一則值得留意的極短畫面，是OA在平行宇宙探索的時候，在近未來隱居者的住所瞥見一疊書籍，最顯眼的就是巴特勒的《比喻》系列。在這些經由書籍(知識物件)與時空—語言出現怪誕調動的「共存」(being side by side)情境，也拉出了para的另一重意義，便是「邪擬」(parody)：既非按照線性位序決定主從，也不必具備物理時間的前後關係，而是不同的異己—場域相互遭遇對方(others encountering their others)，共在但不以連結主義地構築「人類無關緊要」的世界——這個概念，恰好是我在設想本專題論文〈人外與「外人」：探究旁若文本的跨物種政治與世界構築〉(以下稱《人外與「外人」》)時的理論基礎。

在2018年開始構思本專題的架構時，我意圖將para蘊含的「不相像也不模仿」，於是「並置(平行於旁)與彷彿(似是似非)」的這股雙軌螺旋納入論文寫作。在撰寫〈人外與「外人」〉的過程，通常在尚未講述「人外」的界定，就會被某些次文化愛好者誤認為此詞彙指涉著「獸的配備，人的心靈」，亦即行話的「獸為肉，人為心」。⁶ 就我而言，本論文不將「心靈」高於其他，而是視為物種之間「並置與彷彿」的拼裝組裝的一部分，並沒有「心」主導「肉」的趨勢，更非「人=心」與「獸=肉」的黏著模型。若要說「人外」的激進意義，正就在它打破了從啟蒙世代以來

6 這也可以說是動漫層次的跨物種情慾想像，愛好者通常以配戴非人類物件來呈現自我認同。

的「心—心靈—靈魂」主導一切物質的潛規則。至於「外人」(other-than-humanity)的思考過程，來自於過去這五年來、深究並觀察許多施展排外主義場景所推演(speculate)出來的「非我族類」心智構造。在「外人」的概念，「外於人類／人性」者不盡然在生物層次有任何異變，就可以經由意識形態動員與恐懼的佈署，在不同的事件被視為「不(是)人」。在摩爾(Jason Moore)的〈廉價自然的興起〉(“The Rise of Cheap Nature,” 2016)，他犀利道出在以「人」為空虛能指的前提，被歸為「(小寫)人」(humans)的族類，是人口少數，亦是資本主義的掌握者與受惠者。在摩爾推演的「人類／自然」(Human/Nature)大寫二分公式之內，「人」的資格並非生物學定義的「自然人」或具備公民權利的「政治人」。如上所述，唯獨擁有豐沛資產或特權的「小寫人」是“Human”這一端的成員。至於許多生物定義的「原件人」、幾乎所有的非人物種，皆被分派到「廉價自然」這邊，無償提供勞動力與龐大的資源物料，為橫徵暴斂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從事長遠服務(2016: 91-93, 101-04)。

在《人外與「外人」》這篇論文，除了呼應上述的論證，重點是分析三部幻設小說當中、非正典的情慾／時空他者，論證這些「外(來)者」與自居物種內外掠奪者的「人」的頡抗與鬥爭：「自從塞薄叛客與英國太空歌劇的復興(Revival of British Space Opera)等讚頌(廣義)後人類的次文類勃發以來，研究者絡繹不絕地見識到各種『增幅』(augmentation)與『升級』(Clarke 2003)——無論是針對原生人類的合成強化，或是各種(非)生命的超絕能耐。然而，即便再壯麗的『進化』或『超升』(transcendence)，多元豐富且不缺『光怪陸離』的描繪鮮少有批判進步主義、拒絕這些興高采烈描繪『太人類』本色的奇觀，並無意願來嚴厲檢視讓常態人本中心難以承受的負面情感與『不未來』的肉體畸零美學。本論文……〔的立場〕既不託身於孤絕英雄主義來衝撞龐然的權力系統，亦不流於禮讚『後稀缺超文明體烏托邦』(Kincaid 2017)的直線史觀，而是以『非悲劇、非勵志、非母性』的『肉身—世界』詭異形變與怪奇樣貌，論證即將到來的、西方啟蒙思維與性別主流化不欲面對又難能承載的『難

堪』與『壞毀』潛力」(洪凌 2019b: 57)。簡化地說,「人外」與「外人」不是兩種額外,更不是對「人類性」(humanity)的外部補充,而是接續海拉崙(Donna Haraway)在《與麻煩共處》(*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2016)所提出的「觸生紀」(Chthulucene)戮力追究的議題。也就是說,「人外」與「外人」的知識論題在於構築出一個不排除物種內外「遭拒斥者」的物質時空組模,讓自居「我族」的主體學習如何與異質親近者(odd kin)共享政治權力,並逐漸改寫既定的生命權力範式。⁷

在晚近思考集體抗拒國家機器或權力體系的方法論時,雖不乏有諸多路線不以單獨「個體」為基本單位的「群戰」模式,但這些思考路線鮮少脫離抗爭者即使遮頭蓋臉、也難以不以人為本位的「有頭有臉」公民／民間抗議,例如以溫馨「同胞,手足」為修辭的「揭竿而起,打垮暴政」等範本。林宛瑄在〈控制社會中的昆蟲式反抗：以《Psycho-Pass 心靈判官》為例〉這篇論文提倡的「蟲群政治」,以蟲族集體的攻略與當代權力網羅相互對話。本文最重要的貢獻在於林所論述之「無臉性」不但可以擺脫人文主義無所不在的影響,更基進地挑戰了「不能不要臉」的人類至上主義與該物種集體無意識的自戀情結。如同作者所言：

7 關於「觸生紀」的討論,可參見這段紀錄:「Chthulucene可以翻譯為『觸生世』,有觸手、觸鬚和觸角的意象,同時也是生發的、多重生物(bio-diversity)或甚與『非生物』所共在的情境。在中文的語言框架內,觸生和畜牲同音,[作者]希望這樣的翻譯可以戳到『自豪為人類者』,[抵銷]『他們辱罵任何不是人類的物種為「畜牲」時得意洋洋的快感。』在中文的語境,比起過於直接的『怪物』,無論就語法或發音,『觸』跟『生』有巨大的潛力,成為讓『人類』(human)變成堆肥(humus)的觸媒」(廖勇超 2019)。然而,在細讀此書之後,有個明顯無法與(被痛惡的)麻煩共存的問題性便赤裸浮現:「[我認為]作者在making odd-kin、making connection with和sympoiesis等概念上有其貢獻,但書寫本身做了不可欲的示範。海拉崙對拉夫克浮特(H. P. Lovecraft)視為罪大惡極的『不可並存者』的說法,顯示無意想像他的生命故事與創作脈絡、更無意和他產生任何連結,但又要使用與他無法脫鉤的關鍵字,粗暴挪用拉夫克浮特最著名的作品關鍵字,而且擅自調動字母,不考慮早以這個字命名的『克蘇魯大腳蛛』(Pimochthulhu)。(在此書,海拉崙)用『種族歧視』和『厭女情節』去定義拉夫克浮特,將他寫出『共生發』之外,他的創作體系也在本書完全消失」(洪凌 2019a)。

螳螂的「頭臉」雖然似乎與人有相似之處，但其三角形頭部、間距極寬的巨大眼部以及口顎部，跟電影中常見的異形或外星人幾乎如出一轍。因此庫茨主張，誠如布斐爾(E. L. Bouvier)所說，螳螂越看似與人有相似之處，當這點相似處與其讓人感到陌生不安之處相混合之後，反而讓昆蟲更顯詭秘殊異(Coutts 299)，夏維若亦援引威爾斯(Christopher Wills)宣稱，昆蟲最令人厭憎卻又執迷之處在於它們沒有人類熟悉的表情，因此對人類來說可說是一種無法吸納之絕對他者般的異質性存在(Shaviro 47, 53; Braidotti, *Metamorphosis* 149)。關於如何面對這種異質性的進一步思考，帶出了「給不給臉」的政治與倫理等議題。坎帕納[Joseph Campana]觀察到，在早期現代世界中，掌權者以賦予面容或說「給臉」的方式來馴化蟲魚鳥獸，希冀藉此將被視為威脅的蟲群等納入可治理的範圍，試圖在此「過度人性化」(over-humanization)的過程中取消其異質性，「『給臉』相當於使成為『人』／公民」的等式由此建立(73-74)。「給臉」牽涉到如何給不同的動物臉等複雜細節，且未必真能產生含納蟲群等的效應；然而此一等式的反面，亦即「不給臉」意味剝奪「人」／公民的地位，使之成為可謀殺的非人對象，卻不乏應用於排除異己的例子。萊佛士[Hugh Raffles]即指出藉昆蟲意象「去人性化」的作用機制：「一方面必須讓某個被鎖定的族群與一種特定的非人類生物產生關聯，另一方面則是要讓那種生物具備某些適當的負面特色」；被選取為標的非人類生物經常是所謂有害蟲群，如猶太人像蟲子般被消滅或圖西族被視為螳螂屠殺的例子所示(174-75)。萊佛士並提及，華沙猶太隔離區的猶太反抗組織指揮官艾德曼(Marek Edelman)在華沙起義失敗、猶太平民區遭到肅清之後，從藏身的下水道現身時，在亞利安人街區看到一張海報，其上「有一隻巨大蟲子正爬上一張充滿『猶太味』的畸形醜臉」；艾德曼的「反應驚慌失措，這也驗證了蟲子的形象符合他」，他心中甚且浮現了一個念頭：「真希望自己是個沒有臉的人」(183-84)。海報上與蟲子合而為一的猶太人形

象，是將猶太人去人性化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不給臉」的結果；因此艾德曼不想要擁有的臉，其意義事實上不同於「人」／公民的臉，而是變成蟲子的非人面目，如同前述螻蛄似人非人的異形頭臉。昆蟲／蟲群之異質性與猶太人「令人不安的異己性」疊合，被援引來為「不給臉」的剝奪／排除機制背書，除暗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外，亦隱含「非人(昆蟲／蟲群)不配像『人』／公民那樣活著」的意涵……。(林宛瑄 2019: 107-09)

這番精彩的分析，在目前各種反抗迭起的局勢，實則導向兩種認識論與實踐性：前者讓猶太起義者剎那浮現的「不想當有臉的人」發酵，主體成為覺悟「人」不盡然是「我們」，洞察法西斯主義對於「人」這個符碼的惡意佔有，終於選擇了不欲「成人」的批判性背離，朝向一個促進共生發的異己群聚。後者卻反其道而行，挪用了準法西斯的策略，以「非人化」異議者來爭取「人」這個被權力體視為最可貴的語言—物(most valuable term-as-object)。這樣的趨勢，在2010年以來由美國帝國主義所操盤的種種「顏色革命」堪稱顯例。再以最晚近的香港事件為例，無論是2014年的「雨傘運動」或2019年夏天以來的「反修例(送中)運動」，示威群眾採取的位置與戰略(甚至信仰)是以民主主義為名目的極右翼無意識修辭。若是與1940年代華沙起義的猶太反抗領袖做對比，2019年的香港黑衣青年所挪用的語言是物種內／外的雙重排斥，將他們所凝視的中國政權與生命群體視為極大惡，比附為不值得為人(物種階序頂端)的「支那」、「孽畜」，以及(尤其是與納粹視為物種最低端的)「螻蛄」等。毫不稀奇地，香港的建制派(藍絲)亦挪用廣東語的「害蟲」來蔑稱這些嚮往「光復(回返殖民美好狀態)」的青年與少年。更巧合且「邪擬」的是，廣東語拼音的「螻蛄」(香港的寫法是「甲由」)竟是目前被以色列國家機器實行國家恐怖主義、極盡宰制與殺戮之能事的加薩走廊(Gaza Strip)的“Gaza”。

藉由拼音寫法如出一轍的“Gaza”，這樣的耦合處境諷喻出馬克思形

容的「第二次發生的歷史鬧劇」。至於猶太種族從「淪為害蟲」轉為「製造蟲族的高貴人種」，可從強調「可否辨識臉」就是判斷該生命是否值得的哲學家李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的異類恐懼心態得到印證。李維納斯在著作《艱難的自由》(*Difficult Freedom: Essays on Judaism*, 1997)中，以無須辯論的斷言，認定「蠻荒的亞洲他者」是不足以成為「有臉者」的下等生命，他認為優越的古老文明體(猶太文明，基督教文明，希臘羅馬文明後繼者的西方共同體)必須覺醒並組成聯合陣線，一起守護將被粗野落後、只配稱呼為「亞人」的團塊亞洲(Asian Horde)奪去的世界主導權。他宣稱，猶太教主義與基督教主義是文化的、更是倫理關係性的先決條件。再者，他以種族主義姿態提出警示：處於亞洲的各種「低下群體」已經崛起，這些文明低階民族將會威脅上述(基督教旨與猶太教主義)的普遍性與正統性。上述的說法與他的警示相互呼應：李維納斯堅決認定倫理不可能從異種文化(xeno-culture)的基礎得到滋生……他同時對著基督徒與猶太人疾呼，提倡雙方必須結成一股新興的親族情誼，在將來一起擊潰那些「只可能是野蠻主義」(亦即非基督教與非猶太教的他者)的東西(1997: 42-29)。

本專題的最後一篇作品〈旁若的多重宇宙／語奏〉，是靈光一閃的即興雙重奏，出於兩個在近年來密切分享共同研究興趣的「奏者」(players)。這篇對談包含的觸角與「旁枝」，在文體形式與語法展演的界面示範了何謂「旁若(式的)文學評論」。在此，為了保留讀者欣賞的樂趣，我就不詳細談論這篇文章的內容。必須補充的兩點，首先是本篇的英文標題“Para-Sites and Multiverse: An Inquisitive Conversation on Politics of Speculative Fiction, Weird Syntax, and Radical (dis)Connections”是對於狄蘭尼(Samuel R. Delany)與一群訪問者共同編寫的書籍《沉默的訪談們》(*Silent Interviews: On Language, Race, Sex, Science Fiction, and Some Comics: A Collection of Written Interviews*, 1995)的致敬。再者，容我大膽地詮釋，這篇文章的中文標題不但明示了兩位對談作者就是兩座毗鄰的「旁若域」(para-sites)，亦是「瘋狂的多重宇宙」(the madness of the multiverse)的兩

抹化身，時而共振，時而辯證。身為特約主編，我欣悅地期許在本專題出版之後，更多研究旁若文學政治的動力與成果將會陸續浮現，且讓「多重域一字」(multiple sites-verse)的演奏群蓬勃滋長，陸續發聲與發生。

引用書目

- 卡維波(Ka, Wei-bo)。1997。〈「婦權派」與「性權派」的兩條女性主義路線在臺灣〉“Fuquan pai’ yu ‘xingquan pai’ de liangtiao nuxing zhuyi luxian zai Taiwan” [“Sexuality” feminism and “gender-based” feminism in Taiwan]。《國際邊緣》*Inter-Margins*。網路。2019年12月07日 [Web. 7 Dec. 2019]。
- 白瑞梅(Parry, Amie)。2019。〈幻設轉向：「千禧年」之「喻」〉“Huanshe zhuanxiang: ‘Qianxi nian’ zhi ‘yu’” [The Speculative Turn: Parables for the Millennium]。《中外文學》*Chung Wai Literary Quarterly* 48.4 (2019): 19-51。[[http://dx.doi.org/10.6637/CWLQ.201912_48\(4\).0002](http://dx.doi.org/10.6637/CWLQ.201912_48(4).0002)]
- 林芳玫(Lin, Fang-Mei)。1998。〈當代台灣婦運的認同政治：以公娼存廢爭議為例〉“Dang dai Taiwan fuyun de rentong zhengzhi: Yi gongchang cunfei zhengyi weili” [Identity Politics and Women’s Movement in Taiwan]。《中外文學》*Chung Wai Literary Quarterly* 27.1 (1998): 56-87。[[http://dx.doi.org/10.6637/CWLQ.1998.27\(1\).56-87](http://dx.doi.org/10.6637/CWLQ.1998.27(1).56-87)]
- 林宛瑄(Lin, Wan-shuan)。2019。〈控制社會中的昆蟲式反抗：以《Psycho-Pass心靈判官》為例〉“Kongzhi shehui zhong de kunchong shi fankang: Yi *Psycho-Pass Xin Ling Pan Guan* weili” [Lessons of Swarm-Style Resistance i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 from the *Psycho-Pass* Series]。《中外文學》*Chung Wai Literary Quarterly* 48.4 (2019): 91-126。[[http://dx.doi.org/10.6637/CWLQ.201912_48\(4\).0004](http://dx.doi.org/10.6637/CWLQ.201912_48(4).0004)]
- 洪凌、廖勇超(Hung, Lucifer, and Yung-chao Liao)。2019。〈旁若的多重宇宙／語奏〉“Pangruo de duochong yuzhou/yuzou” [Para-Sites and Multiverse: An Inquisitive Conversation on Politics of Speculative Fiction, Weird Syntax, and Radical (dis)Connections]。《中外文學》*Chung Wai Literary Quarterly* 48.4 (2019): 127-57。[[http://dx.doi.org/10.6637/CWLQ.201912_48\(4\).0005](http://dx.doi.org/10.6637/CWLQ.201912_48(4).0005)]
- 洪凌(Hung, Lucifer)。2019a。〈Haraway 對 Lovecraft 的批評是否成立？〉“Haraway dui Lovecraft de piping shifou chengli?” [Is Haraway’s Critique Toward Lovecraft Valid?]。研讀班發言 Yandu ban fayan [the preceptorial conference statement]。比較文學學會「媒介研讀班」〈怪物世〉研討會 Bijiao wenxue xuehui “meijie yandu ban” “Guai Wu Shi” yantao hui [“Guaiwu Shi” in “Mediation”: The Preceptorial Conference

-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of R.O.C., 23 Feb. 2019].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19年2月23日 [23 Feb. 2019].
- 。2019b。〈人外與「外人」：探究旁若文本的跨物種政治與世界構築〉“Renwai yu ‘wairen’: Tanju pangruo wenben de kua wuzhong zhengzhi yu shijie gouzhu” [Extra-Humans and “Other-Than-Humanity”: Extrapolating Interspecies Politics and World Buildings in Paraliterary Writings]. 《中外文學》 *Chung Wai Literary Quarterly* 48.4 (2019): 53-90. [http://dx.doi.org/10.6637/CWLQ.201912_48(4).0003]
- 。2019c。〈怪誕邪神宇宙中的怪胎情慾政治〉“Guaidan xieshen yuzhou zhong de guitai qingyu zhengzhi” [The Politics of Monstrous Sexualities in the Cosmos of the Weird and the Lovecraftian Horror]. 2019比較文學學會「媒介研讀班」研討會 2019 Bijiao wenxue xuehui “meijie yandu ban” yantao hui [“Mediation”: The Preceptorial Conferenc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of R.O.C 2019].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19年3月30日 [30 Mar. 2019].
- 廖勇超 (Liao, Yung-chao)。2019。〈怪物世〉“Guaiwu Shi” [On Clthulucene]. 2019比較文學學會「媒介研讀班」研討會 2019 Bijiao wenxue xuehui “meijie yandu ban” yantao hui [“Mediation”: The Preceptorial Conferenc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of R.O.C 2019].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19年2月23日 [23 Feb. 2019].
- Alien*. Dir. Ridley Scott. 1979. 20th Century Fox (USA). DVD.
- Butler, Octavia. 1993. *Parable of the Sower*. New York: Grand Central.
- . 1998. *Parable of Talents*. New York: Grand Central.
- Delany, Samuel R. 1995. *Silent Interviews: On Language, Race, Sex, Science Fiction, and Some Comics: A Collection of Written Interviews*. Hanover: Wesleyan UP.
- Haraway, Donna. 2016.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Durham: Duke UP.
- Larsson, Stieg. 2008. *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 Trans. Reg Keeland. London: Quercus & MacLehose.
- Levinas Emmanuel. 1997. *Difficult Freedom: Essays on Judaism*.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 Moore, Jason W. 2016. “The Rise of Cheap Nature.” *Anthropocene or Capitalocene?: Nature,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Ed. Jason W. Moore. Oakland: PM Press. 78-115.
- The OA*. 2016, 2019. Show Runner: Brit Marling. *Netflix*. Web. 7 Dec. 2019.

airiti

幻設轉向

「千禧年」之「喻」*

白瑞梅**

摘要

這篇論文處理兩部未完結的小說系列。一部是廣受好評的非裔美籍科幻小說家奧克塔維婭·巴特勒的《地球之種》，又稱《比喻》系列。另一部是瑞典記者史迪格·拉森的《千禧年》系列，亦即全球暢銷的《龍紋身的女孩》系列小說。我將指出這兩部系列將女主角被賦權或奪權的敘事，連結到法西斯白人至上主義的歷史軌跡，揭示了自由西方世界的概念究竟為何。這些未完結的系列作中的旁若文學元素，讓故事整體得以破除新自由主義的現世所幻設的未來，以及冷戰結構下自由主義世界所幻設的過往。因此，這兩部系列標誌了我認為在當代文化生產與評論中出現的「幻設轉向」。我認為，這兩部系列針對近來被視為轉型典範的國族國家(nation-state)體制，具有相當的批判性；兩部並讀也突顯出幻設轉向橫跨了既有學術界域及地緣政治的性質。

關鍵詞：幻設小說，新自由主義，奧克塔維婭·巴特勒，史迪格·拉森

* 本文108年5月13日收件；108年11月20日審查通過。

** 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教授。

中外文學·第48卷·第4期·2019年12月·頁19-51。

The Speculative Turn

Parables for the Millennium

Amie Parry*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reading of two novel series: the *Earthseed* series, also known as the *Parable* novels, by Octavia Butler, a critically acclaimed African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novelist, and the *Millennium* series, aka the globally bestselling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 novels, by the Swedish journalist Stieg Larsson. I argue that both series unpack the idea of the liberal West by connecting narratives of dis/empowerment for female protagonists to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ies of fascistic white supremacy and racial capitalism. The para-literary elements of these arguably unresolved texts allow the narratives to unravel speculative futures for neoliberal presents and speculative pasts for the Cold War construction of the liberal. In this sense, both texts are emblematic of what I call a “speculative tur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riticism. I consider the two series as critical texts from nation-states that have been considered exemplary transitional models; reading them together shows how the speculative turn itself is formed across existing disciplines and geopolitical sites.

Keywords: speculative fiction, neoliberalism, Octavia Butler, Stieg Larsson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iriti

幻設轉向 「千禧年」之「喻」*1

白瑞梅

身為地球之種

被拋置於新世

首須領會

己身一無所知

——巴特勒，《撒種的比喻》(Octavia Butler, *Parable of the Sower* 178)

「寫書是藉口，那麼真正的目的呢？」

——拉森，《龍紋身的女孩》(Stieg Larsson,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 81；中譯本 95)

奧克塔維婭·巴特勒(Octavia Butler)的《比喻》系列(*Parable*, 1993,

* 謝辭：本研究計劃由科技部補助。本論文的最初版本發表於2015年多倫多美國研究年會上，修訂過後的完整版本發表於2017年十月國立臺東大學「轉向／重新定向：第二十六屆英美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此特別感謝兩場研討會中和我同分會場的其他成員，以及許多聽眾寶貴的意見回饋。同樣感謝我的研究所專題課堂學生一同參與了令我驚豔，也對我助益良多的討論過程，以及方郁甄同學及時協助專有名詞的翻譯。同時我也感謝2017至2018年康乃爾大學人文學會駐校研究群成員，期間我們對於貪腐、透明度等概念的諸多對話都深具啟發。最後，我想再次感謝本期專題主編洪凌，匿名審稿人豐富、建設性的意見(如果有足夠的時間，我也非常希望能將更多的建議整合進這篇文章，或是往後的版本中)，特別是本文的譯者張竣昱仔細、良好的譯文，以及後續幾次修訂的耐心協助。

1 Parable既可翻譯為「寓言故事」，也是聖經的「比喻說教」之意。由於此系列書名來自於聖經內文，故選用「比喻」的「喻」。

1998)和史迪格·拉森(Stieg Larsson)的《千禧年》系列(*Millennium*, 2005-2007; 英文譯本2008-2009),這兩部乍看之下驚人的相似處,在於將基督教基本教義派與種族主義追溯至二十世紀跨國企業的力量,一反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形塑出的歷史敘事。² 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所發生的眾多事件之前就寫出這些作品,更突顯出新自由主義架構下,白人文化國族主義、國家權力、企業階級,與所謂中立的市場操作之間長久以來的聯繫。兩部系列作也都圍繞著女主角在身心理皆有缺陷的情況之下,獲得力量。故事中的她們使用自身的特殊能力時,不循著自己是無辜的劇本套路,而是呈現她們持續求索能力的運用及其效應。兩部系列突顯了主角,也可能是整個系列,對於賦權之倫理困境的階段性理解,包括了公開透明、個人自主、以及歸屬(belonging)等議題。³ 在我對(後)冷戰政治/倫理道德良知批判性的比較閱讀中,上述的公開透明、個人自主、歸屬等都會被問題化,沒有簡單的答案;同時,這些問題也碰觸到西方在戰後自由主義下,酒井直樹所永遠延宕的、「假定的一體感」(putative unity)(180)。本論文將這兩部系列視為建立不同世界觀的旁若文學文本,探究其中的科幻元素除了稍微描繪出另翼想像的困難,更極富批判思考地將上述問題指向私有制,與促成不同程度自由

2 參見梅拉麥德(Jodi Melamed)詳解反種族主義一直以來對戰後美國自由主義演變的重要性。本論文之後談《比喻》系列時還會再討論她的著作。

布萊希(Erik Bleich)曾針對戰後美國、英國和西歐的種族歧視言論立法規範,做過比較研究。雖然自由跟反種族言論被定位成偶爾會「相互抵觸」的兩種「價值」,但Bleich指出美國的情況實際上隱含了「很少被公開認知的內在矛盾」,在他的比較研究分析框架裡被突顯。首先,美國在他研究的國家中,對於保障言論自由的執法程度最為嚴格,甚至還違反了國際準則,自二戰起「美國實際上擴張了種族歧視言論的自由」(6;粗體為原文強調處)。然而一旦一樁事件在法律上開始被理解成行為,而非只是為某個信念發聲時,美國在仇恨犯罪的相關立法也獨步全球:「相較於其他自由民主國家,其制定地更早,也更厲行」(12)。

3 關於「歸屬」與政治或哲學上的自由主義之間的關聯,參見瑞迪(Chandan Reddy)著作《暴力的自由》(*Freedom with Violence*)中的專章〈妮拉·拉森《流沙》中暴力的合法自由〉(“Legal Freedom as Violence in Nella Larsen’s Quicksand”)。

化之法律等結構因素，以國家和／或個人權利之名，實則系統性地將財富重分配予經濟上層。

本論文中我會將小說中對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幻設思考 (speculative thinking)，與現行學術界對幻設小說的研究進行對話，以強調「旁若文學」作為一種理解西方體系在當代政治思想中造成的問題有其重要性。許多旁若文學的文化評論已經指出，科／奇幻是少數得以反省並突破「別無選擇」此等經濟現實論的再現模式。在非裔未來主義的部分，近來前所未有的大量研究專注於幻設小說 (speculative fiction) 作為一種批判方式用以回應並介入種族資本主義衍生出的新自由主義價值觀。⁴ 巴恩 (Aimee Bahng) 於 2018 年出版了一部重要著作《遷移未來》(*Migrant Futures: Decolonizing Speculation in Financial Times*)。書中論及處理幻設小說的難題，在於幻設 (speculation)⁵ 本身就是新自由主義金融制度的立基工具。⁶ 巴恩認為「反幻設／反投機」(counterspeculations) (17) 是來自「常識之下」(undercommons) 的反實證主義知識形式，並在書中開篇即講明其立論前提：「旁若文學的系譜，讓我們注意到從資本主義之外的平行脈絡中迸發出各種新穎的文學形式及其意義，因而為超越資本主義系統的世界想像提供更多的可能」(20)。即便未提及旁若文學一詞，2011 年法律學者思倍 (Dean Spade) 也在〈要求難以想像的〉(“Demanding the Unthinkable”) 一文中，以類似的方式討論新自由資本主義現實論與科幻文學的關係 (科幻亦正是「旁若文學」所涵蓋的文類之一)。思倍雖

4 相關研究可參見如 Curtis Marez, *Farm Worker Futurism: Speculative Technologies of Resistance*, 以及 Shelley Streeby, *Imagining the Future of Climate Change: World-Making through Science Fiction and Activism*。

5 該詞原意有根據得到的資訊作想像推斷之意，在金融領域內又譯為「投機」。

6 關於此問題的相關研究，可參見 Linh U. Hua, “Reproducing Time, Reproducing History: Love and Black Feminist Sentimentality in Octavia Butler’s *Kindred*” (2011)，編者未具名的合輯 *Speculate This!* (2013)，以及 2017 年 Sherryl Vint 所編的 *Paradoxa* 期刊 *The Futures Industry* 專號。套用巴恩的話來說，這本專書有很多篇幅也探究「幻設怎麼成為具基進性的開展形式，而非保護主義式一味地盼望」(7)。

然沒有在著作中討論幻設／投機分別在虛構小說和金融領域的兩面性，但他提出科幻擁有對社會改造工作重要的思想資源。他在書中聚焦於他認為有必要介入的兩件事，一是目前因愈行嚴厲的移民法而急遽惡化的種族及性別暴力問題，另一則是美國所採行的監獄工業複合體(prison industrial complex)，以同化策略進行階級戰爭。如同巴恩在其書中後段的主張，思倍指出此時此刻所要求的社會改造，在正式政策(formal policy)象徵性地涵納差異的情況下，總被認定為「不可能」與「無法想像」；而這種「不可能」正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現實論的論述策略。思倍提到：「批判改造工作變得不可言說、前所未聞、難以辨析。政治可能被想像的範圍，被新自由主義經濟框架變得很狹隘、拘謹，「不可能」就成了唯一仍有創造力的領域」(1-2)。目前為數眾多且還在增加的研究，都將科幻和相關文類連結至批判新自由主義、投機金融、種族資本主義等等，上述所提的兩份研究是比較顯著的例子。我把這股在學術界與文化界的新興發展稱為「幻設轉向」(speculative turn)。

我認為就《千禧年》系列與《比喻》系列當中的科幻元素而言，兩部都有超越資本主義現實論的思考，一部分是因為源自於它們都攬起了對抗新自由主義經濟價值，此等「無法想像」的任務；同時，兩部作品也點出抬高自由主義以對抗新自由主義極端信仰的作法是有問題的。為了突顯這點，我會從民主制度上沒有完全奉行自由主義的東亞國家中，援引談及冷戰資本發展主義史的理論。這兩部系列作裡對於自由主義和反自由主義諸多複雜的探索過程，我將其視為一種思考過程，嘗試跳脫冷戰後學術領域劃定的「西方／其餘」二元典範，例如比較文學研究將民主(粗略定義，但常常等同自由主義)與西方連結，而獨裁專制的國族主義(一樣是粗略定義)則與其餘的各地域連結。我認為這兩部以科幻進行世界建構的未完成作品中都提出了另一種時間觀與歷史觀，讓西方在自視為種族觀的進步者，擁護冷戰價值，以及代言新自由主義的劊子手這兩種角色之間，暴露出其身為一個連續體(continuity)所製造出的種種問題。以這種形式再現自由主義、自由化、西方等理念，即是針對被認

定為客觀，實則奠基於冷戰認識論本位延續至今的現實論典範，進行介入干擾。在〈科幻與正統文學〉，狄蘭尼(Samuel Delany)提出了大寫L起首的文學(Literature)／正統文學與科幻之分別；此分別有益去理解科幻敘事元素如何具有叩問現實主義範式的潛力。對於狄蘭尼來說，這兩群我們認知為正統文學與科幻的文本，其重要差異並非在於文類的分野本身，而在兩者之分野所形成的兩種差異性的論述。科幻論述與文學論述皆具有其相異的寫作與閱讀實踐。正統文學論述根基於現實主義的假設與正典之形構上。相反地，科幻論述肯認非現實的世界建構實踐。相較於由單一作者論著，且由大出版社出版的正統文學作品，科幻論述乃是由次文化的閱讀、寫作、出版社群形構而成(65-68)。我提議將此種狄蘭尼稱作科幻論述的社群實踐，作為一種介入後冷戰西方現實主義建構的可能性；實現上述的介入干擾，正是此刻旁若文學日益重要的原因，而在此之前少有論者意識到這一點。

「新自由主義」這個字捕捉到此批判性政治想像被資本主義現實論抑制而失落的狀態。但在此之前，長久以來已有論者對於一些具備質疑性卻又偏離正統現實主義及其世界觀的「文學文本」(literary texts)做出討論，試圖點出其所具有的理论高度。在1970年茨維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對幻奇文學的形式主義研究(1973年英譯版)中，他認為幻奇文學在具顛覆力地懸置了後啟蒙實證主義帶來的可預測性(certainty)。而1972年蘇恩文(Darko Suvin)極有影響力的一篇文章(根據其六零年代晚期的演講所寫)則將科幻定義為「認知疏離」(cognitive estrangement)的文類。如同蘇恩文受到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之影響，狄蘭尼亦在七零年代末提出了新的針對科幻的討論。但重要的是，狄蘭尼是從科幻讀者和寫作者的社群出發，而非科幻本身的詩學問題，並且以社群中的動態互動過程，反駁傅柯(Michel Foucault)說的「作者功能」和文學界認定的正典作品。狄蘭尼認為，不論是化為文字或閱讀實踐，科幻將小說建構世界的方式運用到極致。閱讀科幻與閱讀寫實作品不同的是，讀者無法先假設自己認識故事敘述的世界，他們必須把文字敘述

的世界和規則拼湊在一起；換句話說，讀者會被迫閱讀未知的事物，並了解到即便是一個簡單的文句，都有多種可能的涵義。⁷ 這種閱讀實踐讓科幻和文本的世界有了思索推斷(speculative)的關係，也以同樣的方式潛在地和讀者身處的世界連結。

《千禧年》系列被歸類為犯罪小說，通常也不會特別討論其中的科幻元素。但如果就科幻小說對其他類型文學(包括主流文學)影響力日增的情形來看，不難理解這種將科幻類型元素嵌入報導寫實的情形。從拉森的生平資料就能看出他和科幻文學之間，有著相當明顯而持久的聯繫：自年少時期，他就非常熱衷閱讀科幻小說，甚至以科幻雜誌出版者的角色參與科幻寫作的社群。⁸ 而本文並非以一般認知的文類理解「旁若文學」，而是將它視為一種**建構世界的模式**；這雖然源於旁若文學，但也擴散至其他主流的敘事形式。這種擴散的現象是旁若文學和近年來的幻設轉向中，很重要卻經常被忽略的面向。學術界雖然未將《千禧年》系列納入大寫的正典文學範疇，但它確實是市場認定的主流作品。若從上述狄蘭尼的論述來看，他在文章的末段認為，寫實作品確實可以用科幻的方式閱讀，也就是以非寫實的科幻閱讀模式解讀寫實。他也暗示這種閱讀模式，對文學的未來可能會是好的發展方向。而今看來，當時的他或許真有先見之明。

如果根據狄蘭尼論及科幻是一種論述實踐，而非一組具體的作品，

7 舉個狄蘭尼給的例子。「他轉向左側。」在一般的寫實文本中，這句話的意思可能是說一個躺著的人側個身子，科幻文本裡雖然也可能是這個意思，但也有可能他是個生化人或機器人，往左是幫身體的右側打開開關；又或者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意思，但故事還沒解釋，因此讀者先將不知道的事情留待往後，繼續讀下去。閱讀的過程中細讀每個句子，即便有些意思彼此相反，但保留句子潛在的多重涵義，最後將得到的資訊拼湊起來。(103)

8 參見彼得森(Jan-Erik Pettersson)所著的傳記資料，其中討論到拉森的这个興趣，延續至成年之後：「[拉森]是1980年北歐科幻協會(Scandinavian Science Fiction Association)的主席，任期一年，也是該協會期刊的主編」(21)。關於他對科幻的興趣及其政治立場的關係，見註18。

那麼我認為巴特勒和拉森的小說在建構世界的手法上，都運用了認知疏離的科幻技巧，以此批判一個將自身呈現為唯一可能的世界系統；因此兩人的作品對於當前政治思想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資源。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兩部作品也都試圖闡明以自由價值批判新自由主義的闕漏。我認為這個一致性源自於一個具批判性格的「想像性遭遇」(imaginative encounters；Hortense Spillers的一篇論文標題，後續會再討論到)系譜。雖然巴特勒的科幻作品在這套廣闊的系譜中舉足輕重，但也不能以「作者功能」來簡化地認定其論述上的影響。而後文雖然討論了1990年代巴特勒筆下的蘿倫與2000年後拉森創造的莎蘭德這兩個角色的相似點，以及兩部系列中的其他相似處，然而這不必然就是巴特勒直接影響拉森的證據(雖然確實有這種可能性)。我認為，這些相似處即是上述「想像性遭遇」這個廣闊而跨越國界的系譜存在於幻設小說文化中的軌跡，同時也是冷戰之後試圖讓政治思維脫離自由主義底線(Chua)——亦即在墨守既有法規的倫理框架中，強化對個體及其權力有利的各種價值——的諸多嘗試之一。

一、(後)冷戰政治良知的密室懸案

「自從蘇聯解體後，歐洲興起一種新的**現實政治**。我們在辨識間諜方面的工作愈來愈少，現在多半和恐怖主義有關，要不就是評估某個地位敏感人物的政治取向。」

「這一直都是重點。」

——《直搗蜂窩的女孩》(Larsson, *Girl Who Kicked the Hornet's Nest* 131；中譯本 108-09，粗體沿自中譯本)

拉森轟動一時的小說《千禧年》系列(2005-2007)，在英語世界中較為人熟知的是其中的第一冊《龍紋身的女孩》(*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瑞典語原意為「憎恨女人的男人」。⁹小說的開場圍繞著一樁聲稱曾發生過的兇殺案。一名善於採訪金融貪腐案的新聞記者麥可·布隆維斯特(Mikael Blomkvist)，在揭露一名身價十幾億的投機客所犯下的多起金融案件後，被控以誹謗罪。布隆維斯特在等待法院判他入獄前，暗地裡受雇於瑞典僅存的家族企業前CEO亨利·范耶爾(Henrik Vanger)，從自己的近親中找出犯案兇手。范耶爾最愛的姪女，也最可能承繼其衣鉢的接班人海莉(Harriet Vanger)神秘地失蹤，這起凶殺案幾十年來都未能破案。范耶爾當初因她的雙親失能，以收她為徒的方式救了她。這起凶殺案發生在范耶爾整個大家庭團聚期間，他居住的小島聯外交通被切斷；加上其他的因素，讓范耶爾確信兇手是他的親戚。在故事的前期，我們開始了解到這個所謂的模範家庭有家暴的前例，甚至在戰前和戰後長期參與法西斯活動。布隆維斯特在等待判刑期間開始調查，週遭的人都認為他收集范耶爾的家族史料是為了提供這位老去的家族族長寫自傳。正如駱里山(Lisa Lowe)點出這種模範人物自傳是自由主義重要的文類，這個「藉口」(pretext)在書中建立了一組范耶爾的人生與事業故事：范耶爾的企業雖已衰微，但在國家經濟處於資本主義發展初期，他將整個企業帶向領導地位，被稱為「這個福利制度完善國家的產業砥柱」(Larsson,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 66；中譯本 80)而為人所敬仰。

雖說寫自傳的藉口是為了掩蓋范耶爾雇用布隆維斯特的「真實目的」：找出殺害海莉的兇手，但其目的立刻就被島上的其他親戚所猜到。然而即便如此，這個謎團依然無法解開，直到隨著情節發展而轉變成另一個問題：最初推測認為合理的假設根本是被誤導的，因為范耶爾

9 關於標題翻譯和國際版書封設計隱含的行銷邏輯，參見Louise Nilsson, "Uncovering a Cover: Marketing Swedish Crime Fiction in a Transnational Context"。此文記述了拉森在原版標題中呈現的政治態度，但出版商希望改掉，英文版標題則是在拉森過世後不久定案。其中提到一件重要的事情：「英語是幾百萬讀者的第二語言，英語文學和電影也通行全球。標題翻譯的選擇去掉了作品本身限於國內的框架，而將小說和電影和範圍更大的美國流行文化連結」(5)。

極具說服力的說法完全誤導了調查的對象。在前半部分，范耶爾、布隆維斯特，甚至讀者，都不曾想過當年的小海莉並沒有死，而是自己安排了一齣失蹤的劇碼。他們更沒有想到海莉殺了其中一位襲擊者，並逃過另一位的追殺，最後在澳洲內陸的一個放牧場當牧羊人，就像平行時空一般，在一個沒有人想像得到的地點與時空中過活。由此而言，布隆維斯特「真正的」目標，是在資本主義式的親密關係樣態中，進行「與過去不符的假設式」(past conditional)解讀(Lowe 40)，將家族中的厭女情結和法西斯國族暴力，視為更大的、在現下時空中從未徹底被知曉之過去歷史的一部份。¹⁰ 故事中當下的時間是海莉備受寵愛的哥哥馬丁(Martin Vanger)接任了CEO的職位，但實際上他卻是連續殺人犯，而受害者多數都是移民女性，犯案時間長達二十五年以上。布隆維斯特的作品成果，或是說拉森的這部系列，以橫跨二十世紀跨國經濟的規模，在這條基於現下時空重新劃設的歷史線中，改寫了家庭暴力的意義，並將當下時空遭遇這段危險、人命關天，卻未被直面肯認之暴力過往的時刻戲劇化。正如布隆維斯特從調查者轉變為受害者時所說：「這**不是陳年懸案。馬丁到現在還在殺害女人。而我竟然這麼一腳踩進……**」(Larsson,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 417；中譯本 423，粗體沿自中譯本)。

這樁案件之所以久久未破，是由於一位極受企業家受寵的姪女被認定遭到家族成員殺害。這個預先假設已經先破除家庭是避風港的迷信。然而隨著小說和整個系列的敘事發展，可以發現這整個事件將其最後目標限定於家族規模內作結事實上也是一種藉口，就和自由主義強調家庭生活(domesticity)的說法一樣是個幌子。¹¹ 一開始「**密室懸案**」(217；

10 「〔借歷史學者史戴芬妮·斯莫伍德(Stephanie Smallwood)的用詞〕『過去可能會是如何』(what-could-have-been)蘊含著一種與過去事實不符的假定時間(past conditional temporality)，巧妙地象徵著一種不同思維……企圖能包含歷史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與實證方法，但也同時包含那些沒有切入方法、被不同的方法所糾纏混亂、甚至無法被任何方法所探求的事物」(Lowe 40-41；粗體為原文強調處)。

11 在此借用了蘿絲瑪莉·喬治(Rosemary George)從性別化的殖民性脈絡談家庭生活

中譯本 102) 般的認知，到最後卻被完全推翻。范耶爾最愛的姪女不僅沒死，甚至逼不得已變成殺人犯，而故事則以眾多女性的屠殺作結，她們甚至也不是受人尊敬的名家族范耶爾的其中一員。這些女性都是從東歐來的宗教少數移民，而東歐在故事開頭還被國家選定，成為以企業利益為核心而實行的金融投機計劃預定地區。除此之外，范耶爾家族中有一人以上參與犯案，故事中甚至暗示這些案件更大的程度和北歐戰前及戰後法西斯活動有關。這部看起來像是「會讓人沉溺其中」(217；中譯本 223) 的故事，最終原來是由冷戰資本主義、移民與人口販運、白種國家法西斯等過往的歷史**紛雜交錯**而成。而系列標題「千禧年」，其實標誌了原本結合社會主義國家福利、資本主義自由市場觀，以及「自由主義式、以權利為本之個人保障」(Sejersted 8) 的瑞典，目前已偏離了這個曾廣受推崇的北歐模式。¹²

這部系列的巧妙命名，也表明了媒體(尤指新聞報導)所扮演的角色。社民黨主導下的政治體制雖然放棄對媒體的控制，然而歷史學家和《千禧年》系列都認為媒體並沒有真正「獨立」，因為背後還有廣告商的利益和制度資源(Sejersted 442-43, 467)。2005 年第一冊出版之前，2004 年底拉森就已過世，他自己即是新聞記者，在一些合作計劃中調查白種至上和法西斯活動，甚至成為死亡威脅的目標。據現有的文字紀錄和訪談，拉森相信這些看似邊緣、地下、激進的右派集團，其實是整個

與個人主義興起，以及駱里山直觀地以親密性出發，觀察佔有式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如何在殖民史中被建構為個人生活的認可形式，亦即：「歷史發展的分野，將世界的發展過程分為兩種，一種發展出現代式的自由主體和社會生活，另一種則是被遺忘的，被打入失敗或無關的，因為它們沒能生產出可以被現代性所辨識的『價值』」(Lowe 17-18)。

12 在第三冊中有一故事段落聚焦在國安局憲法保障組負責人，其中包含了他對於言論自由(和限制)作為基本權利，關乎瑞典的「民主能否持續」(291；中譯本 243) 的省思。關於限制的部分：「立法的精髓主張的是沒有人有權利騷擾或羞辱其他任何人……。(但報告已有利地聲稱)幾乎不可能將任何人以違反族群仇恨法起訴並判刑」(291-92；中譯本 243-44)。

瑞典社會重要的內在因子。這個說法的可信度，可以參照史學家厄斯林（Johan Östling）觀察 1990 年代至 2000 年之後，史學界在二十世紀瑞典納粹「經驗」研究上的典範轉移。¹³ 拉森的長期研究讓他的小說具有歷史縱深與可信度。但除此之外，在暴露並挑戰新自由主義的一些自然化邏輯上，整個故事的科幻元素所具有批判力道，與其作為犯罪小說的報導寫實元素不相上下；這兩種文類並不衝突，都需要大量的研究為基礎。這些科幻元素包括了莉絲·莎蘭德（Lisbeth Salander，也就是書標指的紋身女）這個角色，科幻文本常有的駭客（莎蘭德的夥伴們），以及小說的形式風格。我會在接下來的篇幅，處理這些要素。

《千禧年》系列建構世界的方式，將當代眾多第一與第二代移民角色的命運，放進二十世紀納粹主義、白種至上、厭女問題等被詳盡探索的歷史中。這三部曲進展的過程中，原本熟悉的斯德哥爾摩城市地景，成為眾多角色的故事舞台。不論是他們的家、辦公室，甚至有時穿插著驚人的艷情過往，不供讀者臆測而將細節悉數展開，訊息量大得像科幻小

13 厄斯林的歷史研究涵蓋了一戰前和一戰後歐洲的自由主義、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以便定位和理解瑞典的特殊地位，並將瑞典聲稱的中立位置歷史化。在導論中，厄斯林一反當代以野蠻原始（atavistic）的眼光看待法西斯主義，他強調其實在一戰前，這三者都可以被視作是現代思想，某種程度上有著同樣的系譜，也有著不同程度的相似度。「很多會議現在的我們聯想到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模式，並不限於納粹一類，而是更廣大的當代思想語彙的一小部分」（Kindle 電子版 338）。後續厄斯林在分析歷史學家諾博·高茨（Norbert Gotz）著作的段落中，他強調「儘管明顯地和——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等其他意識型態選項相關，（瑞典模式，高茨視其為『自由民主之選項的代表』）組構一個連貫的社會形式，與其它種社會形式有著根本的差異。然而，納粹主義一直以願景或幻想的形式競爭，同時作為挑戰和引誘，或明或暗的威脅」（Kindle 電子版 338）。接著認為這種存在形式經常被忽略，但對於理解歷史和當下情況非常重要。「納粹曾在 1930 至 1940 年代非常明顯地出現在瑞典，但它的支持人數有限，幾個主要的團體也沒有廣大的影響力。儘管如此，如果將其視為一種集體經驗，它依然有非常深遠的影響。納粹在當年發揮的效果甚至比其他現象還大……因此，只要有政治意識，不論職業或政治傾向，即便說任何人都與納粹有關係也並不為過」（Kindle 電子版 417-24）。

說中常有的描述段落。¹⁴ 如此緩慢卻引人入勝的敘事，鋪陳出莎蘭德有著相機般的記憶力和近似自閉症的症狀。在往後的故事中，我們漸漸明白這些能力／缺陷((dis)ability)和特質，是前俄國情報員亞歷山大·札拉千科(Alexander Zalachenko)四散各地的孩子身上都有的，而莎蘭德有的只是眾多能力中的其中一種。「札拉」自俄國叛逃，投靠瑞典後成為告密者，後來成為犯罪集團首腦。他的存在不能洩漏，因此受到國家的庇護。札拉在冷戰期間備受倚重時，常常對莎蘭德的母親施暴，然而這些暴行卻被保安警察中的秘密部門掩蓋掉，因而札拉得以繼續為政府進行秘密工作。一次莎蘭德的母親被暴打幾近死亡，當札拉準備離去時，她點火引燃他的車。事後莎蘭德被認定「法定失能」，另外還須在成年後繼續被「受託人」的監督，才免除了被收容的危機；亦即她無法享有法律上的一切權利保障，受託人也需要負責她的日常花費。故事中暗示札拉千科年輕時所加入的戰時實驗，應該意味著他們製造出常被提及的「札拉千科基因」(似乎也解釋了莎蘭德超乎常人的調查技能，和她同父異母的哥哥過人的體能，且感覺不到肉體疼痛的缺陷)。莎蘭德二十幾歲時，受託人覺得法律已認定她對週遭人有危險性，故不保護她。相較之下，自己則是個無不良紀錄、潔身自愛的律師。莎蘭德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成為虐待狂律師性暴力的受害者。受託人能夠利用她過去的收容和診斷紀錄佔便宜，也意味著她很容易被國家、社會，甚至自己，認定是瘋子或怪物。

《千禧年》系列有引人入勝的情節和核心人物設定，但我想指出的是，其中的敘事結合了幻設小說建構世界的手法和報導調查的風格打開了以往家暴敘事常有的「密室」典範。建構世界的敘事方式，讓被掩蓋的歷史和社會力量浮現，揭露了家暴，以及莎蘭德被媒體、警察、醫療及法律權威標籤為怪物的整個過程，讓她身上不尋常的能力、傷害，以及她的犯罪紀錄等等的意義去個體化。但同時這些答案又只是暫時的：不僅因為這些是日常表面下隱藏的驚人現實，也因為後續都還會有更深的

14 見 Wolf, *Building Imaginary Worlds*, 尤其是第一章的部分。

謎團被揭露，很多謎團又因為拉森死得突然，暫時沒有解答。這種不完整感更深化了在敘事上本就充滿晦澀、陌生化細節的敘事技巧，看似平鋪直敘的故事模式讀起來逼真，但卻讓某些熟悉而老套的主題（如同理心），發揮預料以外的效果，關於這點後續我會再行討論。《千禧年》系列挑戰了將親密程度等同於人際之間的透明公開程度，挑戰了同理和誠實即為善的觀念連結，而這個思維也部份拒絕了從自由派的思維理解並解決它所呈現的自由或不自由暴力。

二、這世上沒有天真無辜的人，但有不同程度的責任

在《千禧年》系列的世界中，同理心不僅特殊，甚至可能是個問題。首先同理心在故事中，不同於以往用普世人文主義或自由的典範呈現，而是在整個新自由主義個體化，將疾病、失能、罪刑化等以人口統計的思維衡量的風潮中，突顯其稀有的地位。事實上，《千禧年》系列和《比喻》系列都將同理心呈現為一種特殊的，甚至是某種人工的特質；或者雖是殘缺，但在某些層面上有賦權的作用。¹⁵ 這種特徵，尤其是有些角色有同理心，但為了自保，不得不維持冷酷或深不可測的態度，在當代的科幻和相關文類中非常普遍。雖然莎蘭德經常被其他位階高過她的角色形容為完全沒有同理心可言，但我認為她正是在科幻作品中展現同理心的典型角色。她在調查過程中展現的同理心並非只是情感的，更多的是在理智認知的層次上展現，反倒突顯她對於自己所調查的對象精準的情感描繪。此外，她詭異的能力可以「鑽進調查者的表皮底下」(Larsson,

15 我在2014年發表在美國研究學會(ASA)的論文中，將狄蘭尼的說法，和思倍針對科幻、移民的執法、監獄工業複合體的論文，放在一起並讀，探究當代的某部「新自由」科／奇幻小說怎麼處理同理。當時處理的文本是喬治·馬汀(George R. R. Martin)的《冰與火之歌》系列，並一同參照HBO的改編影集《權力遊戲》。但我當時並非聚焦在有同理能力／缺陷的女性角色，而是著重分析幾個缺乏同理心的病態角色，例如年輕的喬佛里國王(Joffrey Baratheon)，讀者則透過一位有貴族身分的侏儒蘭尼斯特(Tyion Lannister)的觀點，並帶點幸災樂禍的態度教訓這些病態角色。這樣的態度，並沒有和同情(sympathy)背道而馳。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 33；中譯本49)，某方面而言駁斥了同理心必然和公開、互為主體、互相坦誠等特質之間的聯繫。首先，由於莎蘭德藉非法管道對他人資訊透徹的理解掌握，並以此威脅他人，使得她在別人資訊透明的情況下，必須依然保持不透明。儘管她只是個高中輟學生，又是最年幼的視點角色(POV character)，但她對其他人的行動、背景、不為人知的動機，甚至是感情，跟其他在小說中本應更擅於此的角色(包括受專業訓練的調查人員、心理醫生、偵探、國安人員、老辣の間諜罪犯等等)，相比之下了解地更為深入。她的神祕感以及她的過去、能力／缺陷，只有在一連串的謎團中才慢慢解開，對於前述的眾多專業角色，或對讀者而言皆是如此。這一點，與我在下個段落要討論的《比喻》系列一般，點出了公開透明並非為善。在情感的層次上，每當她密切理解他人的行動和動機時，除了情感上的同理，往往還有譴責；即便情感上同理，自己也會遭受到痛苦折磨。她對於他人的透徹理解，更多的是透過電子媒介而非人際互動，互為主體性的成份也相對較少。整部故事的推動是以莎蘭德入侵其他角色的資訊，並以這些資訊推理，足可見她從電腦獲取他人隱私的情節本身，就是小說建構世界的過程之一，也抵觸了自由人文主義下的角色特質和劇情發展。

最後，科幻語彙誘發的閱讀模式，得以將上述被問題化的同理心和單向透明，以及莎蘭德身上的怪物性，抽離出一般殘障、特殊才能、犯罪故事所預設的個體化敘事模式，而通常認證這些敘事的科學知識，是受過正規教育背景的專業階層產出的。她的角色光環將同理心的稀有，連結到更寬廣而深遠的資本主義發展史，但也讓性暴力批判脫離了新自由主義對良善公民與家庭的權利保護語境，甚至使這種語境在莎蘭德身上顯得相當狹隘：「假如〔莉絲〕莎蘭德是個普通公民，她很可能……立刻上警局指控……強暴」(210；中譯本217)。然而，「莎蘭德和一般正常人不同。……對她而言，警察是多年來不斷地逮捕她、羞辱她的敵對勢力。……她的交友圈不大，也沒有任何住在郊區、受到保護的中產階級友人」(212-13；中譯本219)。

小說中大量描述莎蘭德和中產階級、郊區住民、警方之間的疏離，強調了她從來沒有，也從不可能被視為強暴的受害者，更無法考慮求助婦女救助中心，或是走一般的法律途徑。相反地，整部小說將她描述成沒有怕過「任何人、任何事」，雖說這也可能意味著她的基因組成有問題，可能和她同父異母的哥哥無法感受疼痛的原因相似，但她確實也認為自己很危險，甚至有時會變得像怪物一樣。在敘事上，這三部曲呈現莎蘭德的驚人天賦時，未來感的描述逐漸增加，愈強化她超越常人的形象，如同科幻常採用的人物描繪和形容方式，比如她雖然嬌小得像個十四歲男孩而已，但卻像超級女英雄般不畏戰（直至第二部才因劇情需要而隆乳）。

莎蘭德不斷地和這種疏離，以及背後種種力量搏鬥的敘述，遙相呼應了法律學者思倍談到科幻和當代美國移民政策之種族歧視的關係時，他所提出的「『家庭』、『勞工』、『怪物』這三種象徵語言層次」(2)。《千禧年》系列建構世界的非寫實手法，呈現這種分類方式在強度升級的入罪化大業中，如何被生產運用。同時小說追溯極右翼國家主義，與橫跨歐洲各國的法西斯組織在瑞典的發展時，也展現了這種分類如何植根於反移民情結中。最後一部則在結尾以附記的形式，簡短提及瑞典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的「移民危機」(746；中譯本無收錄)。至此，我會在剩下討論《千禧年》系列的篇幅中，將這部作品建構世界的手法和閱讀方式，連結到角色在面對右翼國家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歷史的倫理困境，並討論《千禧年》系列呈現了冷戰之後，政治良知在碰觸到控制、監禁、正義的內涵等議題時陷入的僵局。

第一部以布隆維斯特起頭。他是一位有爭議但有成就、受人尊敬的記者，被控以誹謗，即將判刑入獄（「身為罪犯便是如此，他心想，置身於麥克風另一頭」[9]）。第二部則從莎蘭德開始。她是一個甚至在法律上沒有完整人格的少女，因為三名死者的謀殺案，以及媒體的大肆渲染，而被警方追捕。前兩部的劇情發展都從核心主角被判有罪起頭，描繪出兩位主角、法律、既有的倫理墨守法規，三者之間的關係，例如

將大型金融犯罪與女性家暴相連的環節。第三部以移民政策的相關軼事暫時作結(續集已在籌備中),突顯出這幾條反貪腐和女性賦權的故事線,都是以國家主義、移民問題、種族主義等相關事件背景闡發的。隨著莎蘭德和布隆維斯特的關係愈發親密,兩人在道德觀念上無可妥協的張力,以及在政治思想上的僵局,迸發出這段關係中的情感橋段。即便讀起來既奇怪又發展地不太完全,但我認為這個張力和僵局的戲劇化處理才是這整部系列的「真正目的」:布隆維斯特雖然至少年長了二十歲以上,但莎蘭德覺得他的道德觀實在太過天真(不管一個人對他人做了何等傷害,他都會對此人受到某種程度的壓迫油然而生自由派式的同情心);相反地,她在認知上同理的表達方式雖然不太合法,但貫徹起來更加徹底到位,也非全然為善,正如藍道·威廉斯(Randall Williams)所形容的「不倚仗法律的清算」(non-judicial reckoning)(xxxii)。¹⁶ 在這層意義上,「莎蘭德原則」(321;中譯本326,粗體沿自中譯本)這種反自由,或至少是非自由派的道德原則,成了《千禧年》系列批判新自由主義的重要根據。¹⁷

對布隆維斯特(或許對讀者亦然),即便他所調查的地下法西斯活動愈來愈多地與資本主義史和經濟自由化有所關聯,但他還是只視這些活動為非法策動而已。作為一位左傾的金融貪腐案專家,即便要被關押,

16 雖然莎蘭德涉入的非法活動遠比布隆維斯特還要多,但兩人同樣都被法律嚴厲制裁。此外,雖然故事從布隆維斯特的判刑起頭,但隨著劇情發展,他的爭議報導揭發了許多人的犯法行為,包括從銀行搶匪,到有頭有臉的大企業家,不過他還是選擇隱瞞莎蘭德的秘密犯行,並在自己的調查中利用她高超的入侵技巧,挖出企業高層的貪腐行為。

17 莎蘭德被一間保全公司的人員雇用,調查並入侵布隆維斯特的個人電腦。他發現之後,兩人第一次見面,她解釋了自己個人原則的其中兩條。「你或許有興趣知道我也有你們道德委員會那類的原則。我稱之為莎蘭德原則。其中一條是混蛋永遠是混蛋,如果我能挖出一些狗屁倒灶的事來傷害一個混蛋,那是他活該。……不過重點是當我做私調的時候,我也會提出自己對那個人的看法。我並不中立。如果那個人看起來像個好人,我的報告可能會寫得溫和一點。……我本來可以寫一本關於你的性生活的書,也可以……提到艾莉卡曾經上過『極端夜總會』……(但)我若提到她,只會傷害你們兩人或是給某人提供勒索的題材」(321-22;中譯本326-27)。

他也戮力地想戳穿這群倚仗法律保護私產，得益於投機行為最多，卻仍犯下貪腐案的企業頂尖份子。但到最後，雖然他已經了解到白人至上和企業力量之間的關聯，卻還是回到自由派的基礎與法律秩序。莎蘭德與他截然不同，她的生命歷程和獨特**原則**，是在布隆維斯特最後無意間回歸的佔有式個人主義(possessive individualism)之外形成的。她的原則是在她和小群沒有太多交集的人之間，賦予不同程度的信賴感而逐漸形成的(這些人包括她的母親、社會學研究生兼情色愉虐服飾設計師但關係時有時無的女友、成員都是女性但已休團的金屬樂團「邪惡手指」、駭客朋友構成的虛擬社群、願意在系統內給予最大程度自由的前受託人、她的老闆德拉根·阿曼斯基、以及拳擊冠軍保羅·羅貝多、布隆維斯特)。這些角色在空間上和社經地位上的分佈不一。莎蘭德甚至幾乎沒有對他們透露自己的創傷過往和現在的法律地位。這些問題正如故事所強調的，沒有一點能與現有被認可的家庭型態相容，不論是血緣式、另組的，或是社群式的皆如此(唯一例外也許是「駭客共和國」，莎蘭德對其中的成員也最為坦承。但這個社群幾乎是以線上互動為主，偶爾涉入非法行為，彼此也幾乎不見面)。莎蘭德和這些角色的倫理關係幾乎都不是出自對家人或對國家的愛，也不是因為共同的利益。相反地，她將父母過世而繼承的財產全數捐出。除此之外，她在米爾頓保全公司的薪水也很少。她唯一一次的大筆收入是從網路上盜領一位劫財成性的億萬投機客的帳戶。她的個人財產和人際關係所奠基的倫理性很難被其他人一眼看透，因為對大多數人而言，侵犯個人和侵犯家庭與財產是三位一體、相互連動的。對他們來說，她對正義的理解，和控管風氣、自命正義的暴力法西斯難以分辨。同時莎蘭德的原則，以及整個家內謀殺案如何被預想的方式及過程，都迫使書中角色與讀者看見這整個探案模式中所仰賴的、現行的倫理框架，暗含了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議題。原本這種探案模式構想出的整個敘事和最後真相，是要逐漸發掘出背後的犯罪行為，卻沒想到在這個過程中，反而碰觸到合法性與私產制度的問題。

布隆維斯特與讀者只知道莎蘭德原則的其中兩條：第一，傷害女人

或其他弱勢群體的「混蛋」，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是混蛋，即使用非法手段曝光也是活該；第二，對駭客而言，非中立性在判斷該曝光對方多少事情的時候是個重要依據，端看對方是否像個「好人」（不是混蛋）。莎蘭德基本上雖然接收了法律上定義強暴所仰賴的合意原則，但在其他問題上偏離了法律，以及對不涉及利害關係的客觀信念。雖然我們僅知曉兩個原則，但這也暗示還會有更多的原則。另一起事件也呼應了這種不完整感：莎蘭德曾被人恐嚇，要對她與其他女性不利，當時的她差點採取暴力行為報復對方；這種反應透露出她雖然一直想掌握「後果」的觀念及其重要性，卻也並不容易。莎蘭德原則未充分道盡，亦不知是否有所窮盡。隨後兩人之間的道德僵局，在認識論上，也在劇中情節引發各種弔詭的情形，更讓布隆維斯特眼中的莎蘭德，在當前的親密關係模式中顯得更加高深莫測。這些才是整個系列真正想處理的「密室懸案」。

當上述的這些弔詭情形成為閱讀焦點時，就能理解當今將「西方」視為一整組政治與社會價值的文化大業其不友善與危險性何在。《千禧年》系列可以從各種支持與自由化對立的政治立場進行閱讀，在此我會探索其中的兩個立場。布隆維斯特和莎蘭德對政治倫理的意見分歧，也在其他地方有所呼應：例如劇中諸多岔出的議題討論，像是瑞典憲法保障的權利與言論自由的本質。或者更具系統性例子：許多劇中角色，甚至可能連故事敘述本身，都在爭論「札拉千科俱樂部」是否代表瑞典國安局(SAPO)和整個國家，還是它只是個扭曲後的存在。對多數角色而言，一個有所運作的警方必然會維護民主價值，因而民主才能保護人民。但從莎蘭德對此絕不可能接受的態度而言，從她遭受到的對待來看，這樣的立場無法徹底解決故事敘述提出的問題。這些立場的張力在故事中完整地保留，也意味著從這兩方的立場閱讀《千禧年》系列都可行；但是在新自由主義的問題日趨嚴重的當下，這部作品的可貴之處在於它開放這個問題的方式，得以對自由派提供的解決方案進行幻設層次的批判。

本文剩下的篇幅將討論巴特勒的小說《地球之種》系列，並追溯前述的歷史對接(將資本主義發展史接到個體化的理念及其敘述模式)和意識

形態上的解套（對於新自由主義入罪化效應的批評格局，脫離自由派對法治與私產保障的話語），這兩種手法在1990年代這個系列小說中的原型。前文提及，年輕時的拉森極度投入狄蘭尼謳歌過的科幻出版社群，¹⁸而這部系列作在拉森的圈子中也大受好評。但在此我比較著眼於科幻社群的重要性如何大過正典文學的建構，而非從一般文學建制所說的作家影響。作出這種推斷的緣由，一是基於狄蘭尼的文章，二是如同葛蕾絲·洪(Grace Hong)所敘述的「有色女性主義實踐」，對文本創作影響的所在之處及其方式，不見得都能被辨識肯認。¹⁹像拉森筆下的莎蘭德，這種一部分從科幻文化中形成，卻廣泛地在各處出現的角色類型，可能已有系譜可循。這種可能性，讓我們得以用另一種眼光，理解瑞典和其他譯本出版商想改掉原標題「憎恨女人的男人」，拉森卻死命堅持的插曲（這部分有許多文字紀錄，尤其可參考Gabrielsson）。「婦女受暴」(violence against women)或許是源自小說所採用的集體強暴事件原型，而這個理解也正是基於社會事實，但卻成為了個體化之意識形態工具（將事件源頭和譴責歸咎於某些個體）的其中一個例子。然而，正如我在

18 利奇(Nathaniel Rich)在《滾石》雜誌的一篇人物側寫中，將年輕時拉森在科幻出版文化中的社群活動，連結到他的左翼立場與生涯志向：「在青少年時期，拉森就創立了兩份科幻愛好者雜誌，寫故事，寫文章，畫插畫。讀者可以寄自己寫的故事，或寫信給主編，當成一種支付雜誌費用的形式。科幻和政治之間的隔閡雖說本就一直不甚明顯，但當時可是七零年代，瑞典的青年運動已經到達了一種狂熱的高峰。雜誌常常會收到年輕的左翼份子來信，但當時有個例外：有位署名Lars-Göran Hedengård的科幻迷來信，激昂地為尼克森辯護，支持越戰。拉森不能放任這種言論不管。沒多久雜誌就被他對Hedengård的回應大篇幅佔據。後來愈來愈清楚Hedengård是個支持法西斯活動的活躍份子。拉森其實本來就有注意到瑞典的這些仇恨團體，但他非常震驚這些團體在他的同代人之間重新復活。他決心一定要曝光這些秘密運作的人群，他要變成偵探。」

19 「發展式的敘事製造出對抽象的有產美國公民形象的認同，以及佔有式的個體，並將這種主體形構普遍化，讓個體之間的差異變得不顯眼。不同的是，有色女性主義實踐徹底地根除這種單一認同或普世主體的概念，〔並〕強調認同與不認同等各種軸線之間彼此的交會與競逐」(Hong xxvi)。

前文分析過的，《千禧年》系列反而花了大量的篇幅（雖非處處皆然），試著將家庭暴力（被一群只在乎單一議題的白種女性主義者推廣到全球），連結到資本主義、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等原本可能都會被模糊掩蓋掉的歷史發展。²⁰

三、「生物性的良知也總好過沒心沒肺」²¹

斯皮勒斯(Hortense Spillers)在一篇短文〈想像性遭遇〉(“Imaginative Encounters”)中，將科幻的重要性定位在它「詭異」地將「熟悉的與怪異的事物結合……以我們未知而未曾經歷過的方式帶我們回到原本熟知的事物」(4)。斯皮勒斯在文章中聚焦於巴特勒的作品整體，而她也從思倍所談的「不可能」和「難以想像」，討論巴特勒如何在作品中再現這兩個概

20 如同我在導言所討論的，思倍曾論及科幻對女性主義政治思想的重要性，在於新自由主義挪用社會運動的涵納策略下，科幻能讓我們敢於要求難以想像的事情。「反父權的政治計劃不斷地受邀或受誘進到『可能』的範圍，結果變成入罪化和帝國的正當理由。種種女人和酷兒族群生命的修辭被四處利用，在國內發起仇恨犯罪的立法，在全球輸出入侵略他國的軍隊，建立並維持著施加種族與性別暴力的體系。還有，在諸多打著『女性』、『LGBT權利』的旗幟下運作，實則為種族歧視和同志不典的計劃，卻因為金錢援助、媒體報導、專業認可只認這些標語而大行其道」(Spade)。拉森的小說應是奠基於某一種女性主義的政治主張，用思倍的話來說，也就是可能「變成入罪化和帝國的正當理由」。女性受害者的形象貫串全系列，從新聞報導檔案、殺人犯日記中的紀錄，到屍體的照片、未成年少女裸體被家人性侵的照片，以及被噤聲販運的東歐女性和亞洲女性(拉森曾聲稱自己幼時目擊過一個女孩被集體性侵，時常提及此事是他創作此系列的動機。但也有可能這些女性就是這個女孩的原型)。這點正是此系列小說在種族和性別政治上站不住腳的地方，其一是讓其中少數、未被記錄的女性噤聲，其二是它的賦權方式，讓莎蘭德成為所有女人的榜樣與捍衛者。我把上述這些讀作是新自由主義式的賦權與涵納敘事作用在小說上的證據。這個力道，和前述思倍的分析、巴恩對幻設小說的專文討論，還有葛蕾絲·洪在《難以否認的死亡——差異的不可能政治》(*Death Beyond Disavowal: The Impossible Politics of Difference*)一書的導論中，都指認出新自由主義欲結合社運的策略，兩者並行不悖。但同時，如同我在這篇文章的分析，這部小說系列再現了自由派正義觀的難題，也正是在對抗上述的邏輯。

21 出自《撒種的比喻》(Butler, *Parable of the Sower* 115)。

念，以突顯時間性(temporality)對於非裔未來主義(她自己並沒有使用這個詞，但這篇文章收錄在標題為《非裔未來女人》[*Afro-Future Females: Black Writers Chart Science Fiction's Newest New-Wave Trajectory*])的合集中)的重要性。她在討論巴特勒的小說《親族》(*Kindred*)時，談到書中回到奴隸時代之旅的情節，以及這種穿梭時空的旅程想像本身就讓人「難以想像」，說道：「但巴特勒甚至將它想像成小說體上最大膽的一步：如果虛構時間真的具有可塑性，那麼它必然可以前進，也能倒轉。」這段難以想像的思考／旅行之所以詭異，部分原因是它「拒絕了……前進的必然」，以及它強迫讀者從「偽造的天真夢境中」醒來：「我們不想知道自己在現實的存在是用難以計數的代價換來的」(5)。²² 甚至不只是巴特勒的《親族》一書，眾多評論者包括斯特里比(Shelley Streeby)都有提到的《比喻》系列，已經是諸多針對美國新自由主義的學術研究對象。巴特勒在《比喻》系列中展現了她對整個社會和政治變化過程的研究和推演，像是刪除圖書館和學校等公共服務的預算、國家監視強化、日益嚴重的罪刑化、監獄大興、負債和私產剝奪的情形增加、氣候變遷，以及這些現象與種族資本主義及奴役的歷史。²³

在接下來的段落中，我會探究《比喻》系列中兩條不同走向的時間性，一條是以科幻語彙，針對「新自由主義對冷戰悲劇的再製」進行反思。²⁴ 首先，在幻設式的過往這方面：我將女主角蘿倫的「過度同理症候群」，視為是在批判式地回應冷戰自由主義種族小說論述中「同理」所

22 在這個啟蒙後的進步時間性被當成自然的當今，斯皮勒斯除了劃出完全對反而「難以想像」的歷史之外，她對小說的閱讀方式也意外地應和了全球金融資本主義中的種族主義邏輯的相關理論。

23 有些研究將《比喻》系列視作對氣候變遷和新自由主義之批判性的幻設作品，相關研究可參見斯特里比專書中的章節：Shelley Streeby, "Climate Refugees in a Greenhouse World: Archiving Global Warming with Octavia E. Butler," *Imagining the Future of Climate Change: World-Making through Science Fiction and Activision*。

24 這個名稱沿自美國研究學會2016年會的一個分會場主題名稱，也是這篇文章首度發表處。

扮演的角色(Melamed)。第二,《比喻》系列正面對抗,並試圖超越後啟蒙傳統下,將封閉性視作實現烏托邦的條件(Jameson),重新思考共同體的未來。²⁵ 這種想像未來性的方式,一部分是立基於一種既必要,也可能反自由派的實用主義(Chua 192-93)。相較於另一群匿名作者稱頌其為「積極平權式幻設」(affirmative speculation)的想法,《比喻》系列以「在眾星之間生根」(84)這種看似矛盾的觀念模式所想像的未來,更往前推進了一步。

《撒種的比喻》開頭,女主角蘿倫·歐拉米娜(Lauren Olamina)以日誌的方式,敘述一連串的夢。一開始先從一場火燒房子的惡夢開始,之後慢慢敘述蘿倫和繼母的對話。繼母以西班牙文向她敘述自己從前看不見星星,是因為蘿倫沒見過的「城市之光」(5)。對話中蘿倫提及,即便沒有月亮而僅有星光,她也能很清楚地看見「社區之牆」。這種形容也許會讓人以為場景是在一個有警衛大門的普通社區裡,不過這種設想立刻就會被後續的語句打上問號:牆「是鄰近地方魁梧聳立,隱然令人不安的存在」,像是「既伏欲出的巨獸,與其說是給予安全,不如說是令人有壓迫感」(5)。當讀者在小說中進入後續的日誌,他們立刻明白剛才的那場夢是對整個環境的直白描述。這裡的科幻世界設定在近未來洛杉磯附近的一座小城,而非一般科幻設定的遙遠他方。但讀者已經必須從這個設定,從批判反省當下的眼光,閱讀他們尚且未知的事物。

小說中的南加州在氣候變遷和嚴重乾旱,以及國家驅使的種族暴

25 或者就像詹明信在《未來考古學》(*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一書中討論布洛赫(Ernst Bloch)時所說的:「在諸多隱蔽的話語及實踐中,找到突出表面的路」(3)。《才幹的比喻》(*Parable of the Talents*)中,「地球之種」這種不斷在變化的社群概念,可以讀作是將兩種對反力量的結合。一種是開創烏托邦式的衝動(開放、改革式的),另一種則是建立烏托邦式的計劃(封閉、革命式的)。在《撒種的比喻》(*Parable of the Sower*)故事開頭,蘿倫的至交及其家族放棄了日亦弱勢的飛地社區,選擇被收編進城鎮中,而她卻採取了「反—反烏托邦」(詹明信語, Jameson xvi)的立場,或可認為此處的設定已經體現了前面所述的對反。

力之下柔腸寸斷。國家並無介入緩和現況，警察和消防機關都因私有化過於昂貴，一般民眾無法求助。多數人口皆失業與無家可歸。水是相當稀有的商品。有些人更服用一種流行的新藥，變得特愛四處縱火，讓原本極盡乾旱的現況雪上加霜。僥倖佔據到房屋的人民須於社區周圍建立高牆，將其他人阻擋在外。否則像是沒有房屋，也沒有養護車輛費用的眾多人民，都必須以雙腳走上高速公路，成群結伴保護彼此，向北方逃去，即使北方早已對這些加州居民封鎖了邊境。在這樣的設定中，以蘿倫為第一人稱的敘述，說道：「我可以在不崩潰的情況下承受許多痛苦」(11)，若說從故事先前已敘述過的痛苦情況來看，似乎就能理解這句話。但在下個段落，我們又讀到蘿倫談的是她自身的「過度同理症候群」，導致她僅看到他人受苦，就會在身體上受到同樣的痛楚，在童年時期甚至還會流血。小說中敘述這種情形的用詞是「同享」(sharing)。每當蘿倫遭遇到暴力或受難事件時，都必須承受這種超乎想像的痛苦，然而不論在她的世界或牆外世界，這些事件又相當普遍。小說以「過度」和「症候群」等字眼，標示出這種極度同理表現形式的不正常；如同《千禧年》系列，這也暗示著在新自由主義的圖景中，同理作為打破社會形勢的一種嘗試。

梅拉麥德(Jodi Melamed)的研究指出，「同情」(sympathy)在冷戰時期種族小說的論述形成中相當重要。美國雖標榜自由主義，並以此領導自由世界，但包括前蘇聯等國都指控美國在國內施行法西斯主義，以及奠基於奴役的種族化資本主義，而這些小說即如同證據(53)。梅拉麥德認為冷戰的「種族自由主義」運用同情，譴責白人至上，認為白人要為種族主義負責。然而它的方式是將這些主張個人化，例如閱讀種族小說(無論內容如何)可以即刻賦予白人一些認知，從心智意念上徹底轉變為反種族主義者，藉此也讓種族觀擺脫一些認定其已納入資本主義體系的批判。這種論述，以及同情在其中扮演冷戰的協同角色，不僅不反對，甚至將美國為首的全球資本主義合理化，成為自由西方的反種族主義提倡手段(54-55, 62-71)。冷戰之後，新自由主義式的多元文化主義當道的

今時今日，反種族主義和民主依然和自由市場的理念掛勾，黑白二分的種族觀早已不復其當年的效力(42-43)。²⁶

梅拉麥德在研究中爬梳了冷戰時期更具批判性格的小說。具同等批判性的巴特勒，從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罪刑化、債務奴役等現象擴大的過程，在故事中演繹出美國資本主義的種族形構，是一種無法以自由派觀點解決的結構問題。巴特勒的科幻語言，一反現有研究多隱含了社會學式的現實論預設——將小說的形式視為文化的透明「窗口」。

種族自由主義中的同情心，中介層次過多又相當膚淺，而《比喻》系列中的過度同理症候群，得以讓蘿倫對他人的理解更深層也更準確，對於處在其社區牆外之人也是如此。隨著故事的進展，她運用這種能力高效地領導，收服人心。她偶爾會設想(但通常不會太久)如果所有人都有這種「狀況」，特別是有了能感知他人痛楚的能力後，世界是否能變得更好。蘿倫出生在一個曾為中產階級的混種家庭中(她的父親是黑人牧師，母親是拉丁裔，兩人都有博士學歷)，成長於多為黑人的多種族社區中，父親因教會職位成為非正式的領袖。一天蘿倫的父親突然失蹤，雖然她還年少，仍須擔起父親一部分的職責。當其他社區居民對於當下的危機採取否定的態度，或是妄想有一天能回到「往日的美好時光」(例如九零年代，也是小說系列的寫作年代)時，蘿倫卻採取行動，進行應對，也說明她是優秀的領導人及思想者。由於無法逃避或忽視過度同理症候群讓自己遭受的種種痛楚，蘿倫最後決意要成立新的宗教「地球之種」。「地球之種」的信徒數量急速擴展，在第二部小說的尾聲，其中一部份的信徒甚至到外太空建立殖民地。雖然蘿倫的病症讓她引起其他人的注意，蘿倫卻也由此得以體會到諸多不同背景的人民所面臨的困境，但這種過度同理的呈現卻不同於自由派所定義的善，將暴力元素完全捨

26 在目前社會不平等被歸因為個人的失敗，而非整個系統運作過程一部分結果的當下，對於貧窮化與入罪化的諸多個體的咎責也愈來愈多。或許正是新自由主義在製造出各個文化「專家」的過程中，遮蔽了這一點，使得冷戰建構出的同情所具有的慈悲善意，得以延續。

去：「小時候我不常打架，因為我會很痛。我能感覺我打的每一拳，就好像打在我自己身上一樣。所以當我決定要打架時，多是我主動打其他人，而不是像平常小孩互相打架。我打斷了麥可·塔考特的手臂和魯賓·昆坦妮拉的鼻子，敲斷了席薇亞敦四顆牙齒……」(11)。和前述的善正好相反，蘿倫甚至在這段日誌中認定其他角色(可能包括讀者)可以理解這點。在小學時她就有了這麼多的暴力紀錄，而且全都是事前盤算過的，但卻也都是出於自我保護或保護他人，就像預言了往後大眾所熟知的莉絲·莎蘭德。²⁷ 而且這種暴力傾向還延續到成人階段：「我將他人一擊斃命，因為我覺得如果只是讓對方受傷，自己根本承受不了那種痛」(278)。此外還有一點和莎蘭德一樣，當蘿倫用過度同理的能力透視他人時，也沒有公開透明性可言。事實上，正因為這種能力會讓蘿倫相當脆弱，她才對近親以外的人隱瞞，並且習慣維持冷酷的面貌。

《比喻》將人際之間的公開透明所預設的可能性及可欲性複雜化。加之，小說運用了科幻的語彙，更拒絕了一般認識論層次上的公開透明。此外，蘿倫講求實際的宗教哲學，也直接拒斥了現下時興的「別無選擇」式新自由主義經濟現實論述。蘿倫和跟隨她的人相信「上帝是因著被人塑造而存在。一定還有我們能做的事，還有更好的命運能由我們塑造」(76)。這種共享式塑造的見解來自於她廣納百川式的哲學思維，不斷地見於書中各處：「所有你接觸的，都被你改變。所有被你改變的，也都改變了你。上帝，就是改變」(195)。這種哲學已有許多人討論過，它對於改變的著重可以連結到以往的一些哲學思想，包括從佛教到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例如，皮爾(Ellen Peel)就認為這套思想沿自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實用主義傳統。皮爾將小說哲理中的改變，讀作小說要教導讀者的觀念，也是對女性主義的貢獻。

27 蘿倫在另一件事情上也展現出她拒絕同情。當她向她往後的未婚夫透露病情時，他一開始以人文主義的方式比喻，說如果所有人都有這種病的話再好不過，試著以體貼的方式不理會病情帶來的失能結果。但蘿倫卻回應道：「我不是要聽這些恭維或安慰的話，我要你去理解體會」(278)。

這個概念當然是多種思想混雜後的表達產出。但如果將其放回全小說系列的政治綱領中——亦即從當今新自由主義的經濟與社會進程推演出的一樁故事——便可知「地球之種」系列的作品力度，在於它挑戰了自由主義所框設的解決方案。瑞迪(Chandan Reddy)曾形容這種解方的思維，是將一些持續成形又變化的情況，歸納成明確而固定的脈絡。²⁸ 而《比喻》系列阻礙了這種思維運作。在《比喻》系列中，這些情況不斷地變動，跟社群有相互形構的關係，而非將其固化成一個界定明確的社群及環境脈絡。地球之種的教義肯認了這些情況的存在，重視它們帶來的諸多可能性，即便這些情況可能難以接受或令人不安。地球之種在往後人數不停地倍增，規模超出一般的社群樣貌，而非侷限於第二部小說描繪過的定點發展型態。這種情況是必然的，也被認為是實際的，但這種實際的精神已然捨棄了私產觀念與固定的領域觀。

社會學家蔡明發(Beng-Huat Chua)曾提出「反自由的實用主義」(illiberal pragmatism)，這個概念是用來形容冷戰之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民主脫離自由主義的狀態。然而對已發展國家和英語社會學界而言，這種概念讀起來就只有在科幻小說中才會實現。他舉新加坡執政黨為例，它採行現代化、多元主義、民主選舉的同時，卻沒有行自由主義的政治態度，令人難以捉摸；蔡明發以此例說明冷戰將現代性、民主和多元主義等概念鑲嵌進自由主義(185-87)。蔡從社會文化理論闡釋：同樣在美國領導，梅拉麥德也曾討論過的自由主義冷戰軌跡中，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機構在實用性的層面上，將民主斥為是反發展的，並解釋民主是如何在這樣的景況下運作。然而，在美國新自由主義現實論的脈絡中，可能還需要一部幻設小說，從當代自由多元主義的陷阱中，將策略性而有活力的實用主義解放出來。在這個層次上，巴特勒在這部系列中所做出的新自由主義批判，對於叩問自由西方世界在冷戰中劃設世界的方式，是相當具有前瞻性的。

28 見其專書《暴力的自由》(*Freedom with Violence*)導論，尤其6-8。

四、「我寧願能仰望星辰」²⁹

地球之種的使命
便是在眾星之間生根

是在新的地球上
生活並繁衍

是化為新生
思索新的疑問

是探索廣袤無垠的天際

是探索廣袤無垠的自己 (Butler, *Parable of the Talents* 276)

地球之種——在閱讀過程中作為一種思想工程——確實提供了另一種理解的方式；正如狄蘭尼所說，科幻迫使讀者認知到他們對於被描述的世界並不全然了解：「身為地球之種／被拋置於新世／首須領會／己身一無所知」(178)。一如我在前文所述，《地球之種》系列作為一部幻設式地遭遇過往歷史的故事，在當代梅拉麥德所述的新自由多元文化主義籠罩之下，處理了種族自由主義及其殘存餘毒的歷史生產過程。同情在自由派反種族主義中之所以舉足輕重，其實是奠基於種族小說的寫實表達：即，不論歸類於何種文類的小說，其中必定包含了原汁原味的種族訊息和知識 (Melamed 63)。雖然就整個文類而言，巴特勒幾乎是以毫不掩飾的寫實手法寫就這部系列，但她的科幻書寫也消解了小說敘事固

29 出自《撒種的比喻》(Butler, *Parable of the Sower* 6)。

有的寫實元素。它拒絕了既有的知識理解、以往由國家調度提供的解方（例如企業城鎮、契約奴工），以及現有的社群及歸屬觀念。在最後這簡短的結論裡，本文將探究這部小說如何想像未來社群「被拋置於新世」，拋棄以往的知識，以及這實驗性的一步怎麼變成這部科幻小說的實際場景（而非外太空殖民地所想像的最後藍圖）。

雖然這部系列通常被認為是反烏托邦的故事，許多研究者還是將故事中的「橡實」社區³⁰ 視為一種烏托邦。³¹ 「橡實」是第一部小說中的最後，地球之種所建立起的一個社區，最後被基督教基本教義派的執政黨代理人毀滅，成年人變成奴隸，幼年人則被另置於基督教背景的關懷之家。蘿倫在創立地球之種前，當她和夥伴們前往北方時，她頭一次向他們提起創立這個宗教的構想。她曾解釋，這個宗教的最終目標是選定新的世界：「我覺得我們必須像個種子一樣，離這塊將亡之地愈走愈遠」（79）。換言之，這個宗教的「使命」就是要「於眾星之間生根」。這種對未來的圖景意味著對過去，甚至對現下（「將亡之地」）的基進否定，也並非期待最終會有一種「根深蒂固」，而是永遠移動前進（愈走愈遠）的持續性過程。斯特里比引用了詹明信的討論，並注意到在批判性的反烏托邦文本中，這種將最終目的地或最終目標往後推延，是一種「烏托邦眼界的閃爍微光」（Streeby, “Speculative Archives” 34）。對於斯特里比而言，這種閃爍微光代表持續不斷的鬥爭，去想像並建立另翼的、多種族的社群。即便勝率極低，小說本身和書中角色也都不輕言放棄這種鬥爭。

我想強調的是，除了前述提及的短暫定居於橡實社區之外，這種眼界或目標在整個故事中，並非只是一個向前標出一個最終地點，而是從一人所立之處所拉出的遙遠距離，就像故事開頭的夢境中所描繪的星星

30 名稱可能取自英文諺語「萬丈高樓平地起」：“Great oaks from little acorns grow.”

31 對於烏托邦相關說法的小說批評，參見皮爾（Peel）。皮爾自己稱其為「實用烏托邦主義」（pragmatic utopianism），並提及以往烏托邦的觀念常被設想為靜態穩定（static）的。另參見斯特里比將巴特勒視為是「空間理論家」的相關研究（“Speculative Archives” 33-34）。

一般。對詹明信而言，如同先前斯特里比談過的，啟蒙後的烏托邦也必定是一種飛地(enclave)，仰賴一體化的封閉力量，分化出內與外、「我們」與「它們」等。這些小說所再現出的飛地社區(有圍牆的羅布雷多和橡實社區)，雖然沿用了社區和歸屬的觀念，但小說除了以欲望的角度描繪，也同時將這些觀念以問題化的方式呈現：兩種東西都是「虛假安全」(false security)的來源，而羅布雷多社區也相當不智地立足於特定的倫理典範，作出人與非人、良善與邪惡、值得與不值得的人事物等等區分。然而這種烏托邦想像的基進之處，並非在於蘿倫的夥伴試圖建立一個不同於此的社區，而在於這種未來感十足，卻尚未形成的社群，在第二冊的推進中，並沒有給定一個實存的地點或領土。地球之種已然「無產」(propertyless)，因此蘿倫與其跟隨者開始建立新的「公社」，不等同也不被特定的「在地」(local)所束縛(Berlant 3)，隱約地向更遠更廣之處擴散。最後我想以一則類比作結：地球之種不基於私產，而以「公社」為模式擴散的方式，正具備了幻設小說語言所具有的運動和衝撞特質。去冷戰政治思想計劃(Chen)企圖超越自由主義認定的價值及可能性，而幻設小說的語言特質正好扮演了這樣的角色。

引用書目

- Bahng, Aimee. *Migrant Futures: Decolonizing Speculation in Financial Times*. Durham: Duke UP, 2018.
- Berlant, Lauren. "Introduction: Compassion (and Withholding)." *Compassion: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an Emotion*. Ed. Lauren Berlant. London: Routledge, 2004. 1-13.
- Bleich, Erik. *The Freedom to Be Racist?: How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Struggle to Preserve Freedom and Combat Racism*. Oxford: Oxford UP, 2011.
- Butler, Octavia E. *Parable of the Talents*. New York: Grand Central, 1998.
- . *Parable of the Sower*. 1993. New York: Grand Central, 2000.
- Chua, Beng-Huat. "Towards a Non-liberal Communitarian Democracy." *Communitarian Ideology and Democracy in Singapore*. London: Routledge, 1995. 184-202.
- Chen, Kuan-hsing. *Asia as Method: Toward Deimperialization*. Durham: Duke UP, 2010.
- Delany, Samuel. "Science Fiction and 'Literature'—or, The Conscience of the King." 1984.

- Starboard Wine: More Notes on the Language of Science Fiction*. Rev. ed.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P, 2012. 61-81.
- Gabriellsson, Eva. "There Are Things I Want You to Know" about Stieg Larsson and Me. New York: Seven Stories, 2012.
- George, Rosemary Marangoly. *The Politics of Home: Postcolonial Relocations and Twentieth-Century Fiction*. Berkeley: UC P, 1999.
- Hua, Linh U. "Reproducing Time, Reproducing History: Love and Black Feminist Sentimentality in Octavia Butler's *Kindred*."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44.3 (2011): 391-407.
- Hong, Grace Kyungwon. *Death Beyond Disavowal: The Impossibl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Minneapolis: Minnesota UP, 2015.
- . *The Ruptures of American Capital: Women of Color Feminism and the Culture of Immigrant Labor*.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06.
- Jameson, Frederic.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 Durham: Duke UP, 2005.
- Larsson, Stieg. *The Girl Who Kicked the Hornet's Nest*. Trans. Reg Keeland. London: Quercus and MacLehose, 2009.
- . *The Girl Who Played with Fire*. Trans. Reg Keeland. London: Quercus and MacLehose, 2009.
- . *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 Trans. Reg Keeland. London: Quercus and MacLehose, 2008.
- Lowe, Lisa. *Intimacies of Four Continents*. Durham: Duke UP, 2015.
- Marez, Curtis. *Farm Worker Futurism: Speculative Technologies of Resistance*.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16. Kindle.
- Melamed, Jodi. *Represent and Destroy: Rationalizing Violence in the New Racial Capitalism*.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11.
- Nilsson, Louise. "Uncovering a Cover: Marketing Swedish Crime Fiction in a Transnational Contex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American Studies* 7.1 (2016). 3 July 2017.
- Östling, Johan. *Sweden after Nazism: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e Wake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rans. Peter Graves. New York: Berghahn, 2016.
- Peel, Ellen. "'God Is Change': Persuasion and Pragmatic Utopianism in Octavia E. Butler's Earthseed Novels." *Afro-Future Females: Black Writers Chart Science Fiction's Newest New-Wave Trajectory*. Columbus: Ohio State UP, 2008. 52-74.

- Pettersson, Jan-Erik. *Stieg Larsson: The Real Story of the Man Who Played with Fire*. Trans. Tom Geddes. New York: Sterling, 2011.
- Reddy, Chandan. *Freedom with Violence: Race, Sexuality and the US State*. Durham, NC: Duke UP, 2011.
- Rich, Nathaniel. "The Mystery of the Dragon Tattoo: Stieg Larsson, the World's Bestselling—and Most Enigmatic—Author." *Rolling Stone*. 5 Jan. 2011. Web. 18 July 2018.
- Sakai, Naoki. "The West—A Dialogic Prescription or Proscription." *Social Identities* 11.3 (2005) 177-95.
- Sejersted, Francis. *The Age of Social Democracy: Norway and Swede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rans. Richard Daly. 2005.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11.
- Spade, Dean. "Demanding the Unthinkable." *feminists@law*. 1.1 (2011). Web. 23 Oct. 2014.
- Spillers, Hortense J. "Imaginative Encounters." *Afro-Future Females: Black Writers Chart Science Fiction's Newest New-Wave Trajectory*. Columbus: Ohio State UP, 2008. 3-5.
- Streeby, Shelley. *Imagining the Future of Climate Change: World-Making through Science Fiction and Activision*. Oakland: U of California P, 2018.
- . "Speculative Archives: Histories of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Pacific Coast Philology*. 49.1 (2014): 25-40. Web (Project Muse). 15 Sept. 2015.
- Suvin, Darko. "On the Poetics of the Science Fiction Genre." *College English* 34.3 (1972): 372-82.
- Uncertain Commons. *Speculate This!* Durham: Duke UP, 2013. Kindle.
- Vint, Sherryl. Introduction. *The Futures Industry*. Ed. Sherryl Vint. Spec. issue of *Paradoxa* 27 (2017). Web. 29 May 2017.
- Wolf, Mark J. P. *Building Imaginary Worlds: The Theory and History of Subcre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人外與「外人」

探究旁若文本的跨物種政治與世界構築*

洪凌**

摘要

本論文以三部幻設小說為分析對象，探討「人外－外人」的旁若書寫與文化政治：透過「時空－肉身」的詭譎構築(uncanny building)，從外部的異己視角來琢磨非正典生命的旁若屬性。

在《神聖承擔》中，我閱讀「黑貓－特製少女人偶－跨性別王子」的三重親密關係，探索這三者形成的情慾政治、性別治理與後殖民殘餘、近未來東南亞島嶼的母系氏族權力競逐、以及生命的「邊界／闕」。藉由末世為背景的酷兒科幻《漫長的冬季》，我探索色情經濟與打造異質生命實驗的雙軌敘述，耙梳這些組裝生命的激進潛能與欲求。在經營太古氏族等同於「外人」的奇幻物語《黑暗伽利黎》，則意圖從後拉岡精神分析與酷兒(非)生命來追索何謂非人的慾望政治。

關鍵詞：旁若書寫，幻設小說，人外，外人，性／別政治，跨物種，世界構築，酷兒

* 本文108年6月3日收件；108年11月21日審查通過。

**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

Extra-Humans and Other-Than-Humanity

Extrapolating Interspecies Politics and World Buildings in Paraliterary Writings

Lucifer Hu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trapolates paraliterary writings and cultural politics of “extra-humans” and “other-than-humanity” by analyzing three works of speculative fiction. My main argument aims at exploring non-human lives and uncanny world-buildings invested in and reflected by outsiders-cum-others’ perspectives. In *Divine Endurance*, the threesome formed by a super-intelligent black cat, a specially-made gynoid, and a trans-man prince is the key issue to explore extra-human sexual politics, the residue of post-colonial structure and gender governance alongside the problems of near-future east-southern Asia matriarchal power struggles and the liminality of life. In the apocalyptic novel *Winterlong*, I will explore both the sexual economy in the aftermath of normative civilization and laboratory experiments on “other” lives, articulating the conditions of radical prosthesis and what it means to be the wanton drive of excess (of regular humanity). In the dark fantasy *Galilee*, I intend to read the queer (un)lives along with post-Lacanian psychoanalysis to explore politics of desire in others-within-humanity.

Keywords: paraliterary writings, speculative fiction, extra-human, other-than-humanity, gender/sexual politics, inter-species, world-building, queer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for Gender Studies, Shih Hsin University.

airiti

人外與「外人」

探究旁若文本的跨物種政治與世界構築

洪凌

前言

在《何謂後人類？》(*What Is Posthumanism?*)這本著作中，沃爾夫(Cary Wolfe)強調，對他來說，「後人類」的意義與潛力並非意指「人類的升級或變化」的「後人類」主義(*PostHuman-ism*)，而是質疑人本中心且不以「人」為本(萬事萬物的先驗)的「後」人類主義(*Post-Humanism*)(2010)。本論文承接這個前提，試圖在科幻與奇幻作品(通稱「幻設小說」[*Speculative Fiction*])領域來處理情慾政治的「人外」(*extra-human*)，以及跨物種與有機—無機界線組裝而成的「外人」(*other than humans/humanity*)。

對我而言，「人外」的概念側重生命屬性的「非人類」(*non-human lives*)，亦即生物層次的物種他者(非人類生命)，或是集結有機體與無機物的各種組構，最明顯的例子如賽博格(*cyborg*)。「外人」則是以肉身或意識的激進改造與合成混雜，彰顯生命政治權力的競逐與文學書寫的去正典潛能。在我的界定，「外人」不盡然非得是非人類物種或經過組裝的後人類，而是意識型態層面的「不人／道」，亦是反人類(*anti-human*)的化身，它的存在揭示了人類性(*humanity*)的閾值，帶出常規人類心智無法揣摩的「其他」。¹ 同樣重要的是，在「外人」這個語境，強烈說明

1 在此，我希望能表達對兩位外審提出的建設性建議之謝意。我同意其中一位評審對「人外」與「外人」的看法：「人外指的是賽博格(*cyborg*)，去人類中心的身分政治建構及性別疆界的穿透；外人似乎是『外於人類』之物，能夠『將肉身／性別／情慾交換系統拆碎重組，零件化了原先看似不可能被拆解的主體』」。

了「非我族類」(not one of us, 更白話地說, 就是「不是自己人!」)或「局外者」(outsider), 也就是無論是本體論或知識論、肉體或心智層面的各種「人類外部性」與「外於人類者」。綜上所述, 「人外」與「外人」分別具現了兩種(後)人類生命政治迄今尚未實現、但可能設想的組裝模式與知識可能, 這兩者除了各自的殊異性質, 共同的基礎是針對西方哲學從啟蒙時代即成為濫觴的「心/靈—身/肉」二元論, 並提出強烈的批判與駁斥。心靈或意識等存在, 不可能是獨立於肉體之上(或之外)的去物質屬性, 而肉身也不可能完整無暇地外於他者。反而, 在複雜的機體之內(無論是有機肉體或無機軀殼), 纔可能滋長並綻放出交織駁雜的意識。

在巴庫曼(Scott Bukatman)與海拉崙(Donna Haraway)等學者的著作中, 如前者的《終端機/末期身分》(*Terminal Identity: The Virtual Subject in Postmodern Science Fiction*)與後者的《人猿, 賽博格, 女性》(*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後人類的森羅百態昭然若揭。巴庫曼的著作研究後現代奇觀(postmodern spectacle)與塞薄叛客(cyberpunk)創作, 激發不少研究者從事分析出現於該文類的酷兒玩家(queer player), 其進出(jack in/out)現實與終端真實迷宮(terminal real as labyrinth)情境的酷性別狀態。海拉崙的論著接合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多重端點的身體政治、零碎化主體(fragmentized subject)的「機體—動物—人」(cyborg, cybernetic organism, 市面上中譯本譯為「賽伯格」, 以下統稱「賽博格」), 著眼於邊界狀態、交織有機體與物件的後人酷兒(posthuman queer)所描繪的科技混血獸(chimera)概念, 焊接「獅子的頭顱, 羊的身軀, 蛇的尾巴」, 在不再統合單一的場域之內從事再造。大約從二十世紀末, 當代幻設作品不再侷促於約定俗成的規矩, 不順從主導文化界定的文類邊界與文體規矩, 對於歷史撰述學(historiography)密切關注, 逐漸滋養出酷異肉身意識與高度政治自覺。對於此趨勢感到強烈不安的正典文學論述, 可謂珊格爾(Kumkum Sangari)所言的「現代與後現代西方中心的同步性時間模, 也是當前不再受到好評的線性時間與

進步論的終結產物」(1990: 216-45)。這些作品大幅度駁斥專屬於「進步的」白種異性戀正典人類想像，以酷兒理論稱為敢曝(campy)的誇張華麗、反人本中心形式，寫出「外於人類常模」的政治與美學形式。

在各種意識形態的角力與扞格當中，無論在同物種內部或跨物種之間，幾乎無例外地，藉由製造(可欲且可憎的)他者來鞏固常態主體自身的優位。藉由「旁若文學」(para-literature)這個站在「人類與經典之外」(劉人鵬 2007: 161-63)的書寫模式，我將細讀人類對長久以來對異類恐懼的巨大反感與迷戀，辯證此等「人類之外」所衍生的可能爆發力。接下來，本論文將分析幾部充斥「類似超現實主義與神話[元素]，擁有某種瀕臨迷亂或夢魅的力量」(Broderick 1995: 62)的幻設作品，改寫正典文本的「標記」，思辯旁若文學創作與閱讀社群所構築、打造，並活生生地處於「異樣世界」的能耐(Delany 2005)。

至於為何選擇這幾部作品為分析對象，最主要的理由是它們共享著常態人性不可能舒適、甚至允許存在的關鍵特質：即使在乍看類似的書寫之下，這些仍被視為是極端不可欲的情色構造與情感政治。誠然，自從塞薄叛客與英國太空歌劇的復興(Revival of British Space Opera)等讚頌(廣義)後人類的次文類勃發以來，研究者絡繹不絕地見識到各種「增幅」(augmentation)與「升級」(Clarke 2003)——無論是針對原生人類的合成強化，或是各種(非)生命的超絕能耐。然而，即便再壯麗的「進化」或「超升」(transcendence)，多元豐富且不缺「光怪陸離」的描繪鮮少有批判進步主義、拒絕這些興高采烈描繪「太人類」本色的奇觀，並無意願來嚴厲檢視讓常態人本中心難以承受的負面情感與「不未來」的肉體畸零美學。本論文閱讀的這三部作品，既不託身於孤絕英雄主義來衝撞龐然的權力系統，亦不流於禮讚「後稀缺超文明體烏托邦」(Kincaid 2017)的直線史觀，而是以「非悲劇、非勵志、非母性」的「肉身－世界」詭異形變與怪奇樣貌，² 論證即將到來的、西方啟蒙思維與性別主流化不欲面對又難能承載的「難堪」與「壞毀」潛力。

2 狄蘭尼(Samuel R. Delany)這段概括塞薄叛客科幻特質的論述，就是我為何會選擇

一、告別母系社會的後人／人外叛徒：盜賊王儲的性別叛亂 與少女人偶的身心蛻變史

我的名字是「神聖承擔」，我是陰性的，我的身長從肩頭算起是二十五小型長度單位，從鼻尖到尾端則是六十二單位。我屬性獨立，所以若我對你的關愛招喚表示回應，你該感到受寵若驚。我的模樣優美輕巧，擅長以美妙的姿勢殺害生靈。在秋(Cho)出生之前，我與前代的女皇與男皇同居，當時只有我們三個……我正在記錄這個故事，我的故事，深植於我的內在。女皇認為控制者就隱身於此處，而我也認為，這些創造出我們[基因精品娃娃]後又捨棄我們的某個代表向來知道我的存在，知道我即將從事的旅程。

——瓊斯(Gwyneth Jones 1989: 2-7)

肇始於二十世紀晚期，我們的時光，神異的時光。**我們**是獅首羊身蛇尾合體的奇美拉(chimera)，機械體與有機體經由理論所編織成的混血體；簡言之，**我們全都是賽博格**。賽博格是我們的本體論，它賦予我們自身的政治。賽博格是想像與物質現實結合的濃密意象，它的雙重核心組構出歷史形變的所有可能性。

——海拉歲(Donna Haraway 1991: 150；黑體字為筆者強調)

這些神異(mythical)的時光以許多形式展現於當代的幻設小說書寫。其中的命題如同海拉歲所言，「提議了某些破解二元論迷宮的出口蹊徑，讓我們以別的方式來解釋自己的身體與自己的工具」(1991: 100-01)。動物／機體／人的三重奏(奇美拉)是後設語言神話的肉身形

這幾部作品為分析對象的主要前提：「非中產階級、對歷史感到不自在，非悲劇、非勵志、非母性、不願邁向幸福快樂……的作品文類；唯獨當它身為某種特殊的負面性——而且，其負面的特殊性必須與過去的書寫傳統與當前的科幻脈絡相互抗詰」(1988: 33)。上述的寫作政治與文類意含都充分表現於本論文閱讀的這三部小說。

象，牠混雜了機體與生命與人類性，從而顛倒玩弄並再造這三者的秩序排列。賽博格的模型讓許多科幻敘述得到著力點，可能是去人類中心的位置重構、性別疆界的穿破滲透、「種族－物種」內外的辯證。奇美拉的意象與力量也如同羅瑞提思(Teresa de Lauretis)在《性別的科技》(*Technologies of Gender*)所言，遊刃有餘地「同時處於性別意識形態的內部與外部，深切自覺於內外雙股力量的拉扯與較勁」(1987: 10)。對我而言，這些論述讓人類原本自認先於主體的固著本體性滋生異變，窺視且察覺到他者並非遙遠兩立的對象(客體)，並得以與體內的機械本色(machine nature)從事親密接觸。

在這一節，我主要投注分析的作品是英國科幻作家瓊斯(Gwyneth A. Jones)的幻設小說：《神聖承擔》(*Divine Endurance*)。藉由閱讀個中的機體／人類互動與童話風貌的跨物種－跨性別再現，我論證且探索後人類與物件(機體)之間深切的「人性無可想像」情慾關係，挖掘埋藏其中的後殖民酷兒再現。

《神聖承擔》敘述三個主角的交會與罔兩關係，這三者寓言化了「奇美拉」(混血雜種**非典型主體**的複合邊緣意識)的三個零碎化身體意識。故事情節的主要敘述者是一隻透過後基因工學改造的超高智能「後」黑貓，牠的名字就是書名「神聖承擔」(*Divine Endurance*)。黑貓深沈睿智且對於周遭的疾苦無動於衷：牠同時是祂，是遙遠「控制者／造物主」的最後直系神聖人工生命，其生涯記錄且觀察了遺留於這個散落科技奇觀殘墟的半島國度的「國／家」(national/familial)系統，檢視並品味發生於這個殊異系統內部的性別／階級鬥爭動盪。黑貓的位置如奇美拉的獅首，陪伴且指引牠自己的身軀，也就是基因工程最精緻高級階段的產物，暱稱為「天使娃娃」的鮮嫩少女生化體(gynoid，作者刻意抹除男性版本的android而改用陰性稱呼)。³ 黑貓與少女這對非／後人類伴侶

3 參照作者略帶戲謔的說法，秋這個人形娃娃(與她的同類少女玩偶)奇異地讓許多生理異性戀男性科幻評論者感到相當不安，縱使她再現了純真爛漫、客體性，以及毫無保

從宮殿般的養育廠啟程旅行，漫遊於經歷許多核戰浩劫洗禮的東南亞島嶼國度。少女的名字是她人偶特質的象徵，縮寫形式為Cho，發音為「秋」，全名是「最美麗的獲選者」(Chosen Among the Beautiful)，命名與養成儀式同時意味著基因工程精製的「人·偶」同時是藝術類人生體(art human)，亦是從汪洋無互基因銀河所挑選組合的鍛造生命。作者以童話故事的結構描述秋與黑貓的行旅與對話，包藏了諸多情慾與跨物種溝通想像。黑貓如同守護者與監督世間的精靈使者，對於深愛的少女身負之使命——找到一個特定人類，並竭盡所能讓對方快樂——牠一方面含蓄地封碼(encoded)為人偶娃娃內鍵的程式屬性，但不時暗示披露：人偶的性(sexuality of art/artificial human)奠基於尋獲並佔據(claim)她視為獨一無二對象的某個人類。

這道尋覓「人偶專屬的人類」的旅程反轉了人與非人之間位階分明的擁有性(ownership)。天使娃娃原本被設定為等候擁有者(owner)前來養育廠領取並帶走自己，但是秋的慾望與渴望讓她萌生動能與移動性(mobility)，她與黑貓將這場旅程目標命名為「尋找她的人類」(finding her human)——秋找到的人類屬於秋，而非秋屬於某個前來打包攜帶她的人類。瓊斯的童話文體風格將秋與黑貓的行旅演化為一場遭逢各種人類性的玻璃動物園生態，而她找到的獨一無二人類的確非常獨特且「出軌」：在這組三者構成的關係內，「奇美拉」的最末端身軀是狄維特(Derveet)，他像是人類伊甸園的墮落天使，化身為蛇且擾動社會秩序的叛徒。作者以充滿愛意的筆觸描述跨性別且落拓不羈的狄維特充斥黑色電影反英雄氣質，喬裝為海盜的他與天使娃娃在彼此跋涉的盡頭相遇。狄維特出身於是作者神話性建構的馬來西亞母系氏族社會的皇族，他企圖脫離並解構的正是強調女系與生殖雙重傳承的家國。這個以封閉於氏

留的奉獻。對我而言，異性戀生理男性科幻評論者並非全然毫無所感於這套故事的諷寓所在。他們或多或少地感受到這些奉獻(包括作者與秋)的所指(the signified)從未指向正典結構的男性，而是投資給外於(或逼近)臨界點的非生理男性叛逆陽剛，這才是秋與作者的慾望對象之所在(Jones 1998)。

族深處「爐灶」(hearth)的女性魔法師來統治國族與家族的女系傳承，既是作者以幻設技術(speculative technique)來試煉且擾動性別二元化的實驗場域，也是瓊斯在書寫這系列之前的殖民／性別體驗之轉譯成品。⁴此場域一方面讓性別成為另一種有別於父權異性戀正典體制的階級，也凸顯出這種新性別階級逐漸醞釀出它特異不羈且流離浪蕩的罔兩。

瓊斯將她所創造的母系氏族權力核心稱為「大胞」(Dapur)，或可意譯為「皇族宗室」，是皇室家族意義與生物血緣的薈萃聚合點。主宰此核心的人物必然是生理女性，而且必得遵守(即使是優越性別／階級的)規範，例如深居於皇族內院、捍衛女尊男卑傳承、含蓄放逐秩序擾亂者、畏懼科技所化身的任何事物。「大胞」一方面統治未來的馬來西亞半島(延伸至盡頭的新加坡)，但這個母系氏族並非毫無顧忌：皇家氏族與遙遠無名的「統治者」保持若有似無的後殖民權力關係，也因此雙方都強化了性別與科技的雙重禁制。

當天使娃娃以少女與黑貓的搭檔形式來到城市，他兩者遭遇海盜與王子雙重化身的狄維特並結締為愛侶。縱使黑貓先知般地感受到變局，狄維特與少女人偶以跨代(或夾雜戀童)隱喻的形式相愛，這則跨物種跨性別愛戀成為這故事最強烈的張力與難關。狄維特類似黑色電影的浪

4 在此引用瓊斯的網路札記(1998)。此段落以慧點且不失自我嘲弄的語氣詳盡說明，她之所以創作出這個浩劫後馬來西亞反科技母系皇族社會的經驗、敘事策略、性別政治等來龍去脈：「當我最初設想半島(馬來西亞)的在地社會時，我遵從標準的自由主義式科幻模型。也就是說，此模型設想的是第三世界的女人被他們的男人所壓迫，而這些男人被異域的統治者所壓迫：男人被超男人統治，女人在最底層。我本來設定的是這些女性擁有魔法力量，但害怕去使用它們，直到我的故事終於浮現。然後我決定，很符合流行趨勢地，我不要讓女人被描摹成受害者。就在我寫完的版本，這些女人，這些面紗遮蓋的女人鮮少出現於大眾眼前，但他們在家與國的深處爐灶殿堂掌握大權。這是個與常態性別二元性相逆反的社會結構，唯有很少數的男性——最優秀且最聰穎的——被這些女性權位者允許得以成長為成年人，但依然被禁錮於奴舍(purdah)。大多數的男性孩童維持『男孩』的形體，也就是少男奴隸，持續讓一切得以運轉的底層勞動力。(奴隸制度！這是對照於工業機器的另類途徑。它很廉價，但它可行)。」

遊偵探，他遇到了最棒的女孩，但無法也不敢擁有，這個無權力的陽剛反英雄隱約認識到女孩(人偶)象徵著最棒的願望與最慘烈的後果，既是夢中所欲的完美情人，但她的現身也終結了他先前認定的人類性與單一完整身分。⁵ 在故事的脈絡中，慘烈的後果與去生殖愛情的基礎就是後人類人偶娃娃由於天真愛意而使用體內封存的毀滅性能力，成就「她的人類」任何所欲之願；然而，狄維特的子民畏懼的就是非人科技的善意強大力量。根據作者在〈最美麗的人／物：遭逢慾望客體〉(“Chosen Among the Beautiful: Encountering the Object of Desire”)這篇文章的自述與剖析，人偶少女與酷異陽性人物的遇合具備多重性質的邊緣情慾意義。在以下引用的這兩段作者敘述，狄維特的怪胎陽性混雜了東方式的神祕主義(mysticism)與西方、第一世界模式的黑色電影冷硬男主角。再者，秋(人造天使)與陽剛黑暗人物的愛情故事既是對生殖系統(陷阱)的逃逸與逼視，也是對母系社會強調血緣、人類本位、合法陰性的反駁：

試想看看，你就是某部電影的男主角。在我的故事，這位男主角是生理女性，或可稱呼為曖昧的性別，但你可以不用在意這一點。這位主角高挑英俊充滿黑暗氣質，勇敢睿智，並且武功高強。你化身的他是個年輕的演裝者(Pretender)，某個皇室家族的最年少繼承者，你奮力戰鬥，力求讓你的祖國取得獨立地位，甩開那些異域統治者。由於這是一則現代、或甚至後現代的羅曼史，你的過去多采多姿，並擁有雙重屬性的地位，對於你的生命角色充滿譏諷式的幽默。你處於境外黑暗之處，在社會的邊緣從事自身的工作。然而，你的意識清晰良心清白，你並沒有個人野心。如同那些最高段數的戰士英雄，尤其是處於東方式的傳統，你一半的成份是個神祕

5 隨著情節的發展，我們逐漸知道狄維特與他反抗的母系氏族同樣是運作基因工程來建構身體的後人類。他們與秋與黑貓神偶的差別在於「人工化」或「基因操作」的程度多寡，而非本體性、一刀兩斷式的絕對差別。

主義者。你其實很想當個隱士，在神性的孤絕之內與萬物同在共處。然而，正義必須首先得以執行。(1998: par. 1；黑體字為筆者強調)

當秋終於了解，原來狄維特所處的文化一直致力於遠離機器，他們不想與秋這樣的東西生活在一起時，她終於崩潰落淚，因為她是錯誤的，錯誤到沒有誰會想要她。對於我[作者Jones]來說，秋所陷入的為難局面是暗喻我當時身為駐外人員妻子的內在衝突與傷痛。而秋還必須面對身為女孩必須克服的另一種難關。試想，當兩者[英雄與少女]愛上對方，英雄的生物性腦部告訴自己，首席雄性(Alpha Male)是很稀少的存在，就像是龐大兇惡的動物相當稀少。當你[指書中的黑色英雄]看到某個美麗的女孩，你的動物腦告訴你，這不是你配得上的人物。以上的情境是典型的黑色電影英雄兩難，也是第二名雄性的難關，狄維特的黑色落拓英雄難關。但我告訴你，這是非法的科幻小說書寫，正典的科幻小說英雄通常都是首席雄性，除了狄克(Philip K Dick)的男性主角。然而，即使你躋身於首席雄性位置，你必須時時處於憂患，因為老大哥總是蟄伏於陰影之內，配備著閃耀的鐮刀與險惡的嘻笑。(1998: par. 2；黑體字為筆者強調)

就我而言，狄維特的酷兒陽剛再現意義除了作者的描述與詮釋，還包括邊緣位置的「男·性」(male sexuality)：抗拒物種生殖程式，反抗老大哥的頭號叛徒，科技／人類的酷性別交媾象徵，科幻作品向來無法規避但又強烈壓抑(因為不可能讓常態生理男性來實踐這樣的位置)的「完美陽性」浪漫模本。相當重要的是，此陽剛性別的建構基礎揉合去殖民家國抗爭與酷性別意識的雙重意義。狄維特面對的母系長者是溫和神祕的「東方古老」母性，其管理手段並非血腥征服，而是漠然委婉，狀似默許。他並非身處常態父權霸權的異服跨性者，而後遇上某種救援(例如性別多元的女系氏族)。他也不是歐克葛洛夫(Artemis Oakgrove)或卡

利非亞(Patrick Califia)等跨性別作家筆下的跨性T或跨性男：這些角色散發出近未來或返祖的神怪性力量，必須以肉體與跨性別魅力為反攻器物，也就是經常性地與女神／女王化身的宰制者進行體膚交合的情慾攻守。狄維特的戰鬥不同於上述作者描寫的跨性別角色，他企圖鬆動的家國權力體制掌握於去身體性且無法經由慾望層面近身搏擊的「母上」(matriarch elders)之手；這些把關含蓄體系的母親與長姊同時禁止女跨男的陽剛，並以生物文化的雙重界面消除生理男性的性。母系制度全面地擦拭抹淨了男性可能發展的僭越反叛因子，亦即生物本位式地操控男性的身體(如荷爾蒙、性器官、甚至染色體)使之馴服柔順。處於家國宰制者與外境統治者的雙重包抄，狄維特的處境與戰略道出瓊斯所言的「黑色電影陽剛反英雄硬漢的僵局」。他化身為負面孤絕的單獨物種，同時對立於(處於性別階級高位的)女性家國與企圖微妙操縱國族的外來者。除此之外，我從中也閱讀到不只一種的單獨酷性別(物種)，例如試圖從隸屬奴役位置脫身但拒絕「男性化」的生理男皇族，⁶ 狄維特身為盜賊領袖所率領的邊緣階級少數眾等等，這些林總且各自的物／種組成了奇美拉的許多變調與同盟。

此外，作者坦承以白種異性戀女性(第一世界主導的性與情慾想像)位置描摹出她的理想陽剛慾望客體，同時以親近涉入的姿勢，經營第三世界的母系國族社群。⁷ 在瓊斯建構的「東方式」母系統治階層家國結構

-
- 6 在他從事反抗外來政權與內部母系宰制權力系統的生涯，狄維特最要好的朋友是親王安東(Atoon)這位生理男性皇族，雖然是皇族，但在性別系統嚴苛的家國系統，他選擇以婉約柔和的形式隱微地從事暗度陳倉。在此處我們可以印證維遜(Monique Wittig)在〈人並非生來就是女人〉(“One Is Not Born a Woman”)的理論：縱使性別都是建構於意識形態與文化社會的框架，弱勢的性別更容易被註定為「自然化」，並且主導霸權會將性別建構與命運、本質、自然、神話(維遜稱為「迷思」)等敘述系統相等同。安東與此系統的男性一方面接納他們的「劣等」價值，但他們從事維遜的反迷思抗爭，在唯物論的層次設想且實踐某個在性別建構尚未形成主導力量的前期(pre-date)情境。
- 7 瓊斯對於她描繪的狄維特稱呼為「我的夢中情人，身穿生理女性衣服的理想男性」(1998)。我不會以直性別的批評系統來閱讀這句話，因此指責瓊斯「拷貝」了某種男性形象到酷兒陽剛再現的範疇。我試圖將此反轉閱讀，也就是說，此理想男性非得在

與對立的黑暗陽剛群體，我讀出了相互交錯的權力博弈、物種／種族的競逐、(跨)性／別關係。它們並非純粹地反殖民或反性別二分，但在這些無法清晰二元歸屬的混雜部署之內，去殖民與跨性別酷兒的動能不時從被批評為無意識模仿的錯誤概念萌生。狄維特等角色的去殖民性別業債(karma)與業績(credit)在於他(與作者)認真確切地架構他的陽性，並非以嬉戲解構的方式，而是反其道而行。這樣的陽性(孤絕、邊緣黑道領袖、睿智入世但悲觀)典範不只是從本質性的東方母系社會之主導女性或奴化男性就地取材，必須還有相當成份是從非在地的、外來的、甚至是殖民系統(更高位階宰制機器)的文化材料輸入。

作者以西方異性戀白人的位置書寫非西方的酷兒跨性別情慾模態，既誠實批判但也不諱言這些描繪引入了自身的情感慾望模組；而且，此書寫必然透過(不可能不是)「西方」的語言文體來描摹活靈活現的東南亞反殖民(但也同時處於殖民想像的)跨性別魅力。這樣的書寫與策略符合勒瑰恩(Ursula Kroeber Le Guin)在〈變動中的王國〉(“Changing Kingdoms”)闡述，幻設小說語言對於鬆動極端的二元對立、宰制機器與反抗主體互成共構的效應：

「身穿生理女性衣服」，但同時跨性別異服為「男性」的多重換身狀態，才可能構成「他」的邊緣身體與神異魅惑。此外，瓊斯談及她設想出這個夢幻陽剛形象與人工玩伴娃娃的關鍵時期，正是她自覺身為「人偶娃娃」的去主體狀態，也就是跟隨婚姻配偶到東南亞國度，但自己沒有工作的依附居留時期。

在以下這段，作者將自己與秋部份性重疊，而她描繪的跨性別與後人類情慾則說明了瓊斯的認同並沒有她陳述的如此「異性戀」：「當時我生活於新加坡，因為我丈夫得到在地學校任職的機會。我們想要旅遊且見識這個世界，彼此同意盡量申請到國外工作的機會，遠離英格蘭。但是，我並沒有準備要擔任一個隨員出任的妻子角色。我向來是個獨立的人，我有自己的薪水與支票本，但在那段時期，突然間我變成一個無助的依附者，沒有錢，沒有找到工作的機會，只能處理家務，看上去像個裝飾品，並讓我的丈夫快樂。這樣並不算太壞，我覺得還好。最可怕的是那些國外任職人士的社群，他們充滿反挫想法且激狂擁護傳統。我被一群人士包圍，他們不認為我身為小可愛取悅機體的狀態是自主且暫時性的，他們認為這是我的自然角色，我就是被設計成這個角色。這是最震驚的部份，我想，這個關鍵點引發出我書寫秋這個人偶娃娃」(1998)。

〔某些評論者〕以為生猛的事實天生存在，而語言忠於事實且恰如其分地描述它。它們以為語言有能力道德中立：這些預設是大部份舊式科幻的基礎，與其他類型的虛構小說都有落差。虛構小說假設的是：現實是文化與心理建構的東西，語言只可能間接描述現實。

此外，道德價值與語言相互輔佐彼此。1960年代以降，這些觀念暗含於許多科幻作品，它們與早期的科幻相當不同。於是，科幻與之前「奇幻的異域」之間的樊籬得以削減。語言構築現實，而不是描述現實。(1997: 11-12)

勒瑰恩的說法囊括性證成了許多從1960年代崛起的「新浪潮」迄今的幻設作品，再度強調語言、文化與種種身分建構的蛛網相連狀態。然而，如此糾葛連座的構築必然違背「傳統」身分政治強調乾淨脫離父權意識形態、殖民帝國影響與(男性)科技幻想的三重二元性批評框架。在這套充斥不潔的幻想與「慾望客體」的故事，瓊斯的奇美拉三重體——傳達帝國之聲的優雅黑貓，混血東西方多種模式的跨性別黑暗王子，後人類人偶樣態的天使娃娃——相當嚴重地冒犯了支持二元結構的批評系統。然而，倘若我們再度從海拉歲的「賽博格」理論來檢驗這些冒犯點，我會將這些不潔的痕跡閱讀為「機體—動物—人」這三種生體在拖曳橫行於重重界線與臨界點所留下的體液或爪痕。在瓊斯的這套後人類童話科幻物語，黑貓既是過往神聖(代表預設的境外正典西方帝國)的代言，也是負擔著後人類生體與跨性別身體的守護者。牠／祂的交錯並置狀態就是既此既彼的去殖民過程，既脫離也複寫了殖民(科技)在這些抗科技轉向「魔法」的母系社會情境。天使娃娃的非女性、非人性純真「物化」美感並非純粹的顛覆或拷貝，而是性別、情慾與科技的種種複製磨蝕重疊的成品。狄維特抗衡母系宗族魔法(陰性科學)的實踐方式之一是在一個塗銷「陽剛」的地域改造裝置自己的身心，使之轉化為為遙遠國度(連結殖民帝國歷史想像與去殖民動能)的神魅男性叛徒。這三者的離經叛道同時指向隱約猶存的西方「返祖」人類性、太古時空模式的母系社會，以及

強調生殖血脈的「反科技」家國意識形態。他們化身的悖離形象認真地嘲弄了科技、性別、種族、物種的經典(canon)與常規(convention)。在此必須強調，正典性別政治若將後人類式的反(常態)主體文化再現輕易挪用為父權意識形態無所不在的證據，或許反而憑空支持了並非真正無所不在、更不可能絕對全能全知的主導文化機制。

如同白瑞梅與劉人鵬在〈「別人的失敗就是我的快樂」：真相、暴力、監控與洪凌科幻小說〉(“Schadenfreude: Truth, Violence and Surveillance in Lucifer Hung’s Science Fiction”)所提出的相關論點所言，黑貓的跨物種屬性、天使娃娃的反主體模式、狄維特的去扮演性(anti-performance)陽剛體現都是某種戳擊主流文化與正典身分政治的「暴力」。這些「暴力」再現表陳出緻密雜種的主客體連結，甚至互換狀態，它們無法清楚明白地佔據正義的反殖民位置；然而，透過這些人／物穿梭出入於童話、異域、幻想、慾念所組成的後人類／後殖民／後性別景觀，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這些景觀鮮明有別於前者(經典，帝國，父權)自認擁有的正統與起源，以及後者(常規－正典－母系)擔任的含蓄檢察官監控位置。⁸

8 在此，我必須花費篇幅來引用這兩位作者的洞見：「科幻文類可能看似比其他文類更暴力，因為不論是科幻文學、電影、動畫或漫畫，暴力或恐怖常是科幻美學的一個文類上的要素。在日常主流道德論述框架下閱讀科幻文類的『暴力』，看不見的是日常『反暴力』或『譴責暴力』的論述所可能隱藏的暴力，因為日常意識型態的『反暴力』論述所反對的，其實常常是『非主流』對於『制度化』暴力的再現，而制度化的暴力，早已鑲嵌在主流價值系統中而習以為常了。這是以制度性的暴力，反對那對於『制度性暴力』之再現。而就科幻作品而言，有時當一部作品被標誌為『暴力』，其實是因為該文本質疑現實某些自然化的面向——就洪凌的作品而言，就例如異性戀定義的性別認同、人與機器之間的二元對立等等——這些自然化了的面為特定社會主流利益所在，藉著『孝道』、『社會秩序』、『人性』等名義而維繫，在這些名義下，特定主體(如酷兒)，根本沒有位置或無法發聲。的確，不論是中文或英文脈絡，許多通俗文化包含暴力；但我們認為這些文本更明顯的『暴力』在於，它們強烈解構著主流價值，而有時正是這種強烈的解構性招致反對的聲浪，但反對的聲音只是譴責這些文本呈現暴力畫面。我們建議的是：將敘事的暴力視為一種再現策略，那麼每一個文本、甚至每一個特定個別的再現，以及結構每一種再現的政治，就可以分別被脈絡化地討論，而不必

在她自己談論《神聖承擔》與《花塵》的寫作過程中，瓊斯鉅細靡遺且坦承地說明許多敘事策略、文化再現、想像與效應、結構與文體所給予這些書寫的影響與刺激。我認為人文學院研究必須費力且開展（但不失批判）地讓每一個文本（或任何一個個別再現）得以脈絡化，而「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的意義不光是某種簡單粗率的拼湊，例如從文本挑選出關鍵字或抽樣情境來摘指或禮讚。脈絡化意味著琢磨且體會文本／再現的種種前情後續、身世淵源、敘述語境、社會條件、書寫策略、（有意或無意的）邊緣戰略，連同它已經或可能造就的政治效應與（跨）文化情感／影響（trans-cultural affect）。對於作者悉心構成的母系氏族、後人類客體、酷異陽剛這三種再現，我認為必須從文本與它周遭包圍聚攏的種種上述情狀來剖視。在描寫「爐灶」式、擬似東南亞結構的母系家國景況，瓊斯運用了狡詐（cunning）但不失詭誕真誠（uncanny earnestness）的敘述策略。

首先，她拒絕1970年代英語系統（尤其是美國自由派女性主義與女同志連續體想像）的美好烏托邦前景，但同時反向抵制著某種薩伊德（Edward Said）（1983）在〈旅行的理論〉（“Traveling Theory”）論及的西方第一世界作者姿態：要不就是將落後、化外情境想像為負面、待拯救且嗷嗷待哺的難民，否則就絕對二元跳躍，將這些在地者平面地擁戴為救世主式、美好高貴的前現代神聖野蠻。事實上，瓊斯經歷過考慮此種敘述模式的階段，也就是說，由於作者誠實的揭露，我們得以獲知，任何再現的文化資本與表述戰略都會經歷從草稿到定稿（但可能永遠無法完全底定）的細膩變遷。定稿（出版）所呈現的「大胞」氏族混血交錯著印度母神位置、伊斯蘭教的面紗陰性、中國（前現代）的世家母上威權，以及作者經驗（但未必是「實證化」或唯一的）東南亞女性家族情境。這些龐雜交織的第三世界女性文化材料組成某種特定位置的母系宰制社會，對

套在既定現成的道德系統框架中，將『暴力』與『非暴力』的現成標籤視為理所當然。那麼，這些標籤在主流再現系統中所服務的利益，也就可以被檢視」（2007: 216）。

比於「統治者」的科技或「外來者」的貿易，此社會有其運作優勢但也充滿挫敗／限制。我們從中讀到它的戰略意義與文化情境，其複雜滄沓的程度使它背離作者竭盡全力抵抗的、純粹扁平形狀的「殖民／反殖民」二元模型——只可能容許落後退步或聖潔救贖的兩種虛構空洞位置，藉以支撐普遍西方殖民主體的全有與全無。

類似上述的敘述策略，狄維特與秋的兩種後人類性／別類似沈積岩結構成的層疊交錯合成體。他們的性別形態並非理所當然、斷然性的第一世界加成第三世界秩序性組合，而是不時浮現罅隙但充滿有機(organic)的跨文體跨文化產物。狄維特反抗制衡陰性霸權的扁漢人格型(swagger stud personification)交織了東北亞洲(例如流行文化再現的中國古代、日本幕府)劍俠文類與黑道英傑典型，西方中世紀的反城邦盜賊領袖形象，與童話文體的救世王儲(明顯取材於王爾德充滿酷兒意味的〈快樂王子〉)。他與母系國族的鬥爭並非誓不兩立地各站兩極；兩者時而衝撞爭奪政治資源，時而暫時合作對付外來者，各自與不同的國族政治實體、(難以區分東西方、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異域異邦主體形成串連網絡。至於秋的人偶性，連同她反常態女性的「少女」性別與愛情模式，非成人屬性的孩童質感(childishness)，錯落複雜地涵蓋日本科幻動漫畫的去／非主體與去人類性(例如押井守等的後人類作品)，包含女同志、男同志、跨性別書寫的酷兒同人誌(slash fan-fiction)，安徒生童話(如小美人魚與白雪公主)，以及酷兒科技奇幻的世界構築——就如同狄蘭尼所建議的「非正典標註」(non-canonical markers)(1999: 218-70)。在這些人物與文化政治的結構內，穿梭其中、狀似雜蕪浩繁的意象並沒有哪一種最具主導性或最為優勢，而是以共鳴互動的「賽博格」樣式媾和於再現系統，組成一幅具備去殖民動能的跨時空畫面。它不盡然全面解構，但反覆緻密地辯證殖民／被殖民／反殖民、主體／客體／機體、母系政權／邊緣陽剛／酷兒少女性的多重位置與其矛盾。

在本節的最後，我必須重申，任何個別再現都有其獨特細微的指涉系統(referential system)。專斷粗暴地枉顧指涉所在的語言、效應、書寫

策略，不但無助於拆解文化霸權，反而隱約落入與主導文化政治同調共鳴的窘境。這些人物／再現的表現是如此藤蔓糾結地鑲嵌於多重敘述政治之內，因此拆亂了主導性與邊緣性之間的位階秩序，這需要有誠意與能力考掘其指涉系統與其複數歷史書寫的凝視來體會分析。倘若落入配備「帝國之眼」的論述視線，狄維特的酷兒陽剛仍然容易被不自覺居於二元對立的性別政治充滿喜悅地指控為「複製父權」，秋の後人類少女情慾隨時可能被張揚「主體性」但枉顧其重疊魍魎(罔兩)質地的文化政治追打，斥為過於簡單且文不對題的「物化」。⁹

倘若某種酷兒文化研究(者)認為，所有的差異都能夠被某種視線、

9 在此，我想以上述的論點回應趙彥寧在觀察1990年代台灣酷兒政治，絕對的全有(因此全無)結論：

台灣的同志運動於論述與公開儀式的層面上雖然不斷引用「酷兒」或「運動」等具挑戰性的符碼，但荒謬的是，運動參與者中卻完全不見非文化菁英的、下層階級的、或扮裝的人群，或英文中所謂的「transgender」、「cross-dressers」、「drag queens」、與「drag kings」(包括「bull dykes」與「stone bitches」)。(2001: 89)

姑且不論「點滴不漏」地全程參與並考察「台灣同志運動」的所有「公開儀式」是否可能，即使我們假設作者的確(不可能地實現了)趕赴並見證每一場「儀式」，並分毫不差地監視記錄，如此更形成了我反對的監控代言狀態。我真正想質疑並反問的重點是：是否有任何一種參照(指涉)系統，絕對且斷然地決定了「文化菁英」與多種「他者」之間的位置區隔？在主體(與非主體)的所有再現形式之內，是否有某種靈光(aura)、氣味、甚至實證帝國化(empirical imperialization)的本質屬性存在，賦予作者與類似的代表聲音權柄，讓他們得以在每一場儀式當中精確判準其中必然有或沒有「非文化菁英的、下層階級的、或扮裝」的主體／身體？我們得不厭其煩地鄭重強調：跨性別、階級、文化位置等再現各有其緊密的物質性基礎，並非每一個(每一種)跨性別、下階層、低文化主體／身體都得以矇混過關。反過來說，正因為不可能「每一種」跨性別、下階層、低文化主體再現共享某種先天必然的同質性，因此也證成了任何再現與任何場域都可能存在著異服扮裝的形體。這些形體是「同志運動專家」也無法判定何謂蘿菀何謂坑的主體與身體，例如未經醫學建構就毫無問題地「輕而易舉理所當然被視為生理男性」的跨性別T(Montgomery 2002: 243)，同樣存在的是「洋溢詹姆思狄恩(James Dean)的氣質但不會有人以Sir來稱呼他」的陰陽同體酷兒(2002: 244)，或是婆所扮演的跨性王(Femme as drag king)，為的就是嬉戲嘲諷並故意被「識破」(Halberstam and Volcano 1999: 32-58)。

某種系統、某種論述或政治位置輕而易舉地揭發，無從遁逃於寰宇，如此，可數落殆盡的差異與全體一致性的同化並無不同。例如，在某些論述，趙彥寧所設想的、堂皇宣稱(酷兒)絕對沒有「非文化菁英的、下層階級的、或扮裝」狀態，不言而喻地落入白瑞梅與劉人鵬所批判的代言性狂妄：「假設了一種『代表性』的『酷兒文化』，這種詮釋框架的問題在於：不論是什麼東西構成『代表性』，這種彷彿不言而自明的『代表性』預設，對台灣『酷兒文化』生產而言，都會變成一種未曾明說的標準，模糊掉了比較次文化的酷兒再現形式。……否認了作者有任何有意義的能動性，更遑論批判的主體性——這種否認，經常伴隨著我們已經太熟悉的指控：『抄襲(模仿、來自)西方』，或『複製主流』，即便這種指控是後結構對於語言與主體形構理解的一部分」(2007: 234)。

此種全有的普遍視線擦拭／處決了早已存在、但殘缺不全且從未「本真」的跨性別罔兩痕跡，此視線使這些罔兩從隱諱曖昧成為從不存在。不過，從不斷湧現的書寫與文化再現效應視之，任何監督機構或藉批判之名的宣稱都不可能讓罔兩(酷兒性別)被一一辨識清除或分類。這些湧現且拒絕被視為「完全不見」的低下敗壞形體總是變換裝置而持續滋生，如同下一節我將論證的「怪胎少女扮裝為少年演員扮裝為莎士比亞扮裝為少男的女性演員」的末世改造身體，其性／別怪胎的程度如此詭譎動盪，或許連莎士比亞並不會過於篤定，斷然宣佈對方究竟「是」或「不是」何物、來自何方、將成為什麼。

二、魔物生成誌：「外於人類」的末世酷兒與太古神話家族博奕

對於華曜事物的激情嚮往，遠勝過對於情人的欲求。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996: 352；黑體字為筆者強調)

在本節，我以兩部爬梳自然(世界)身為「愛的原點與受體」以及末世廢墟(命運)身為「原欲的臨現場」的幻設作品為文本，從兩者的戰役

與互動來探討身為人外與「外人」的夢幻慾望物處於象徵網絡的多重位置。後拉岡精神分析作者，諸如齊澤克(Slavoj Žižek)、考普潔珂(Joan Copjec)的「真實層與大對體構」，處理晚近科幻小說的肉身變遷、情慾與主體性的輾轉流離(diaspora)、(並不存在的)本真本體與人工拼貼化身、人類性與非人酷性別等議題。此篇章主要的閱讀作品是寒特(Elizabeth Hand)的末世科幻三部曲——《漫長的冬季》(*Winterlong*)、《滅絕之潮》(*Aestival Tide*)、《伊卡路絲的殞落》(*Icarus Descending*)。再者，我以班雅明(Walter Benjamin)闡述德國哀劇的觀點為主要施力點，處理巴爾克(Clive Barker)鋪陳不死氏族幻異情體的歌德奇幻小說《黑暗伽利黎》(*Galilee*)。我將以憂鬱、命運、自由這三者的傾軋互動，探索虛幻的死去父(副)名、母體與陰性力量的吞噬性與破疆界狀態，陽剛奇幻欲求物(the fantasmatic masculine object)的異質性與混血成份。

透過寒特鉅細靡遺的描述，人類所生產的「最詩意的病害」(the most poetic virus)註定要回報它的製作者，生殖出最可怖也最魅惑的末日景觀：「基因奴隸包括犬類外型的阿旦曼(aardmen)，臉孔類似禽鳥的女獸(argala，用為外太空基地居民的性愛玩具)，侏儒狀的沙漠蜥蜴(salamander)沒有眼睛、皮膚潮溼，設計來當作地底礦坑的勞工」(1993: 6)。在這部作品中，某部份的選民榮登天際彼端的衛星HORUS(Human Orbital Research Units in Space)，在星際間的人類聖域扮演假惺惺的救世主與奴隸販子。殘留在變形地球上的，就是劫後的慾望天使，以「人類基因工程實驗室」(Human Engineering Laboratory)充當第二度降臨的默示錄場景；身為「神經系統再造的共振感應能力者」，再現了匱乏與多出物(潰瘍)(lack and metastases)的對象，便是這套三部曲的主角。

玩弄遺傳因子、將肉身／性別／情慾等交換系統拆碎重塑，零件化了原先看似不可能被拆解的主體，「人類基因工程實驗室」生產出的是後拉岡精神分析理論會命名為「海市蜃樓／小欲求物」(phantasmagoria, objet petit a)的化身。這些逼近「精神病(psychosis)的超異能力者，如同讓對手石化的梅杜殺之眼(Eyes of Medusa)，在相互凝視的瞬間便潛入患

者(它者)的心靈禁區，被作者形容為「腦髓之間的陰影」。恰可與「人類基因工程實驗室」對照的版本，則是搖搖欲墜又頑強不屈的劫後廢墟。掌權的「系統管理員」(Curators)與經營麻藥、香料與肉身產業的「愉悅提供者」(paphian)，以彼此認可的共謀，交互建構起一個既原始又精密的交易模式——前者提供權力者的保護，而後者以沾染體液與香料的身軀，為前者執行主客體界限嚴苛殘酷的官能儀式。劫後的時間向度與歷史脈絡被置換成殘暴美感的「象徵性交易」(symbolic exchange)，那些交易同時被推衍到相當極端的情境——「愉悅提供者」又名為「抹大拉的後裔」(Children of Magdalene)，形成部族式的內部循環生態彼此交配生殖，為的是製造出更多可供消耗的客體，用以成就終結之後、圓形時間的自我封閉延續。

在《漫長的冬季》的主軸情節，可以從中閱讀到兩種「無須用上眼睛注視的自我觀視」(I as the gaze without the eyes)。其中之一是酷兒跨性別貫穿漫長的跋涉，體現於故事的敘事者，具有共振感應超異能力的主角艾蒂·汪韃絲(Wendy Wanders)。本書的重要命題之一是艾蒂與其「顧客」的(無)意識與體液交換，藉以帶出後末世科幻小說的流浪性別：如何在殘垣敗瓦的外在環境，以及同等流離的身心荒原上，洞穿並質疑自然與人工的種種建構與想像。距今約四世紀之後的華盛頓，劫後者反諷地稱呼為「綠蔭之城」(city of the trees)，在這座洪荒末日的廢墟內，艾蒂身為超心靈機構的貴重實驗對象，一方面充當「象徵秩序的化外多出物」(excess of the symbolic order)，另一方面，她的作用如同維繫象徵秩序的纜繩。這個打扮為莎士比亞劇作少男演員形貌的非(後)人類非主體將自己的病症轉化為毒與藥，治療發狂詩人、劫後生命體，以及將她一手塑造成如今模樣的浮士德式(Faust-esque)「僭越人類界限的科學家」。艾蒂的後人類性別與超感應能力同時是末世風景的原料與作品，她的多重人格／性別身軀則是共情(empathizing)無意識恐懼與慾望的收容渠道。

除了以超異能共感念場(empathy field)來回應主體的匱乏與驅力，

不以眼睛與自我為配套的注視之道，顯然讓這些觀視者體受到「遠超過愉悅的多餘猥褻享樂」(the obscene enjoyment as supplement and excessive form of pleasure)(Zizek 2009)，這等精神情慾的乖張魍魎風貌，甚至也活靈活現地展現在肉身的畸零情景與迷幻變異。在許多暴烈華美的敘述當中，寒特以毫不保留的冷酷基調，詳盡描述總是「多出或少了什麼」的「活生生瘋狂收容頻道」(walking vessels of our madness)：

瑪瑞長出果實般豐饒眾多的乳房。泰勒的眼睛從灰色轉白，繼而變成鈣化的花崗岩珍珠。吉葛的體膚彷彿一座敗壞的花園，他的氣味是蝴蝶與死屍的組合。某一天安娜醒過來，赫然發現床鋪上躺著一個皺縮的微型人體，長著她自己的面孔，以及枯萎的男體性器官。
(1990: 281)

在這些身為「他者觀照之鏡」(a kind of emotional mirror for others)的超人類後身體之內，主角與同儕行走於淋漓崩壞的劫後地域。他們經歷的情慾遊走既是象徵系統的無止境交換，也是企圖闖破主體與宰制機構之間的那些異議聲音，游離界線與(看似註定不可逆轉的)裂縫。艾蒂充滿張力的異服陽剛遊歷以雙聲道互文的形式具現：她一方面是扮裝為少男的非人(後人)實驗室產品，亦是涉入莎士比亞劇場結構的異服演員。在這些後人跨性別實踐，最酷異的情境在於艾蒂「扮演」的諸多角色既有莎士比亞劇本當中異服為女性的少男，同時搬演出莎劇場域之內的女扮男裝異服者(例如以下引用的《十二夜》)。艾蒂的沙劇雙重性別臨摹與她的浪遊者男性身分交織並陳，道出活靈活現的「海市蜃樓真體」(the mirage as real embodiment)——這些頹廢個體的扮相既是人格互補的雙重奏，也是後人類肉身踩踏兩重文本地景的酷異陽剛寫照：

「你儼然是他的雙身，長相與他如出一轍。」

這位紳士遞給我一杯翠綠色的飲料，甜美的薄荷茶，我們於米

蘭瑪(Miramar)大宅作客。廂房周圍擺設好幾台電視螢幕，數百年之久的儀器，這是他們最近經由歷史學家那邊取來的飾品。玻璃杯蕩漾著微暈燭光，房間到處都是娃娃與小人偶，這些機械肢體粧點著戒指與手環，懸掛玫瑰與河谷百合花園。

「艾蒂是個充滿超自然才能的年輕男子。」會說話的小猴子演員、深紅色小姐如此盛讚。

米蘭瑪氏族的主人回應。「我絕不懷疑這點，深紅色小姐！除了演技出色，我必須說，你們讓清純少年扮演女性角色是最棒的選角方式了！」

深紅色小姐輕哼，我必須遏止自己笑出來。這主意實在太妙了，一個少女扮裝成的少男扮裝成舞台上的少女！

「然而，您應該明白，我並非拉菲爾·米蘭瑪(Raphael Miramar)。」我再度回應。

「我明白。你的知識淵博，足證你是圖書氏族的成員，並不屬於從事床第交易的瑪大蓮氏族。然而，你是否確定自己是家族僅存的最後一人？你可有任何家人？你可有一位妹妹？」

我笑著朗誦，然而憂懼在我心靈內部翻騰，宛如一尾毒蛇：「不，先生，我並沒有妹妹——『我是我父親名下的**每一個女兒**，也是她的**每一個弟兄**。』」(1990: 208-09；黑體字是筆者的強調)

艾蒂與雙胞胎兄弟拉菲爾的交換狀態展現於許多層面，千絲萬縷地糾纏於異質性別與人／非人的辯證。前者是精神異常的天才與超能力者，後者是古老娼妓氏族的一員。艾蒂以穿刺(病患與獵物)的身心為養料，貢獻自己的肉身為他人的養料；前者的虐待性陽剛(sadistic masculinity)與後者的淫蕩陰性(slutty femininity)互為鏡面兩端。艾蒂的過度完整(超出常態人類的極限)與匱乏(必須獵食他人的精神殘缺來餵養自己)寫出某種充滿魔物魅力的孤獨酷兒陽性樣態，她追尋成為「人偶／演員」之外的漂流歷程是透過各種冒犯性的跨性別反常愛慾來進行，例如她與培育

者赫羅(Harrow)博士的跨代同性情慾，或是以少男身分勾引六歲小女孩的冒瀆性愛。如同艾蒂所述，這些攻佔他人身體的經驗讓她逐漸成為小木偶皮諾丘(實驗室產品)之外的「真正生命」，某個有別於人類與常規性／別的「不完全」生命。

在這套三部曲中，充當被奴役者的人物紛紛以異常慘烈的面貌，彰顯了同時被膜拜與貶抑的崇高客體(The Sublime Object)屬性。最觸目驚心的例子是原先是主宰系統道具、死後更被製作成只有肉身部份存活、無法不聽從製作者指令的「空白活屍」(rasa)的男性角色，瑪伽利斯(Margalis)。在此，我將瑪伽利斯的變身情狀閱讀為某種跨性男性的身世隱喻：從人的地位滑落至機械與獸的合體，從常態象徵系統的固定主體位置淪為拼湊合成的「物件」與玩具。瑪伽利斯被製作(再生產)為一具夾縫於有機肉身與無機客體的「活死人」過程，透過角色的自述，讀者感受到何謂「最純粹的欲力便是不死的零碎肢體。它〔們〕執行著非個人性的意志，枉顧主體的意願與安危」(Zizek and Schelling 1997: 81)：

地獄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破爛的肉身與扭曲的心靈，註定不斷地回歸到自己的體內。如許荒蕪，連死亡都毫無拯救的餘地。(Hand 1992: 4)

經由瑪伽利斯變身為非(男)人的純粹物件，奧辛納特世家的統治者緬茵(Shiyung)的情慾主奴模式脫離異性戀常模，進入德勒茲(gilles Deleuze)在《受虐：冷峻與殘酷》(*Masochism: Coldness and Cruelty*)界定的陰性主宰者與陽性被虐者框架。身為絕對主控者的王女主宰(dominatrix princess)讓男性生體從死者之國應召重返、將對方的肉身視為恣意擺佈的道具。緬茵以魔道科學家改寫愛人身體的敘事過程，既是生物男性變形為賽博格的跨物種與跨性比附(a trope of trans-species transsexualism)，亦是德勒茲描述的「冷酷宰制的虐慾場景」：

施虐者的冷酷純淨思緒與被虐者的心弦騷動恰為對比……幻境的成立是被虐者慾望劇場的首要元素。施虐者以思惟與操控性的衝撞為基礎，而被虐者則以想像力與辯證運動為自身的場域。(1991: 128)

至於在《伊卡路絲的殞落》被視為純粹可拋棄式的基因操作奴隸，它們或華豔或畸零的面目形貌便是宰制系統的「不可分割遺留物」(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語出齊澤克的書名)。例如，學名為「增生人」(Energumen)的量產巨大次人生體只能活到幾百天的地球日。如同某個增生人在《伊卡路絲的殞落》的自述，這樣的情境等同於共時性的無間斷生死循環：無數個自己死去，而後又有無數個相似的自我被生產出來。叛亂起義的增生人重複循環在死亡與再生之間的「怪誕不朽」(bizarre immortality)，「個體性」並不存在，基因完全同質的構造抹除了這個物種具備獨特個體性的能力，成為他們的優勢。增生人完全同質的無性別(genderless)樣貌，對比於瑪伽利斯死後被改造為活屍與機體混血的跨物種—生命臨界點狀態，形成相互對映的對照組與酷異諧擬(queer parodies)。

在此，我們可能從班雅明的《寓言與德國哀劇》(*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一書處理寓言者(說故事的人)(介於施虐者與交感共振者的中介對象)與寓言對象(失去慾望能動性的華美死寂事物)之互動，呼應此系列的兩種後人生命樣貌。無論是酷兒少年模樣的艾蒂·汪韃絲與其情慾／意識交易對象的儀式，或是緬茵與瑪伽利斯的非正典異性刑虐愛慾互動，這兩者分別寫出穿透象徵網絡的「毒性」特徵。這兩種陰陽對照的性虐待主宰主體性能夠分別生成，主要條件之一在於他們以早已不原生的身體為改造場所，拒絕「(成為)人類」：

如果憂鬱使生命從中流淌出來，給它留下死的軀殼，但卻永久地得到保障，它就無條件地暴露在寓言家的掌中。它沒有任何能力發生自身的意義，在寓言家手中，客體變成了不同的東西，透過客體，寓言家開始說一種不同的語言，它是她打開隱蔽區域的銀鑰匙。它

既是被固定的形象，又是進行固定的符號。……這是施虐師的特點：蹂躪她的客體，或用這種方式滿足他。這就是寓言家在這個浸透著經歷過的、與想像的殘酷行為的時代裡所做的一切。(1977: 183-85；黑體字為筆者強調)

另一種觀視，較諸於超異能力者的共感與鏡相化身，顯然更為殘暴，它並非外於自身的映照者，而是從主體的無意識內擠壓攪拌而出的渾沌太初「魔神」。此形象本來是集體無意識的框架與原型，透過超心靈的拿捏摹塑，在毀敗遍野的末世取得特定的身分與位格。在文本中以「空眼瞪視者」(the Gaping One)被命名。經由艾蒂所招喚出的無意識太古魔異化身，在故事的位置既是幾位主角的「我」之大對體(the Other in me)，也是後末世科幻小說、後人類、塞薄叛客等次文類所生養的超位元機體神格。¹⁰ 此位格的存在證成且取代了難以捉摸、無從定格於象徵秩序界的「真實層」(the Real)。按照拉岡的理論，存在於「真實層」的「小客體」(objet petit a)配備以下的特徵：它是無論如何，總是回到自己原點的事物；也是無法在象徵結構確切捕捉逼視，只能夠透過一層又一層的轉喻鍊，堪堪地瞥見它流動變異的形貌。猶有甚者，當主體在千載難逢的契機遭遇了「小客體」的形骸化身，所領略到的沉味，除了無比的猥褻絕爽(obscene jouissance)，亦「造成創痛體驗。此事物是如此的猥褻不堪，我無法天衣無縫地將它與自身的宇宙接合，總有一道鴻溝將我與它割裂開來」(Zizek and Schelling 1997: 25)。在卡浦潔論述吸血鬼的篇章、〈吸血鬼，胸部吸吮，以及焦慮〉(“Vampires, Breast-Feeding, and Anxiety”)，我們可以看到「真實層」以怪奇事物(the uncanny object)的形影，在象徵秩序界竄動流離，造成「匱乏本身的匱乏」(a lack of lack)：

10 自從1984年起，以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神經魔異浪漫譚》(*Neuromancer*)為起點，興起塞薄叛客的濫觴。在此類型作品之內，通常都由數位人工智能接合拼貼肉體所製成的「從位元之海誕生的數位生神」(Mega AI God)，這個對象乃是作品的母題(motif)或是原域(primary ground)。日本導演押井守該編自士郎正宗漫畫的科幻電影《攻殼機動隊》(*Ghost in the Shell*)系列，則是從「賽博格」視線為出發點的代表作。

主體與小欲求物(object a)的邂逅，將會製造出「匱乏本身的匱乏」。此物體是如許的無與倫比，它沒有本質或是確切的意念，無法與之溝通、或亦交換流通。簡言之，它並沒有所謂的客體性(objectivity)。(Copjec 1994: 119)

在《漫長的冬季》中，這個沒有客體性的小欲求物從「真實層」的異域被招引而出，到了《伊卡路絲的殞落》，它為自己佔據(竊取)了最為詭誕的物質性形式(corporeal form)，一個號召人工基因奴隸(Gene-slave)揭竿而起、與主宰系統對立激戰的「人外—外人」領袖。¹¹ 這個佇立於象徵秩序與「創痛真實層」的交界、自身即為複合生物—非生物產品的存在，體現了主體至極的驚駭：並非因為祂鮮明的非人屬性而感到失落，主體真正的失落與焦慮在於無法維繫製造且流通異化物(alienable objects)得以循環交易的系統。最後一筆龐大堂皇的失落是此(象徵與生產)系統的崩垮傾倒。正由於系統的瓦解崩潰，「匱乏」本身與其論述失去著力點，原先被型塑為匱乏(畸零)化身的各色人工基因奴隸得到微乎其微的暫時性出口。¹²

在這套三部曲中，寒特在展現枯朽與絕望的風景之餘亦以陰寒的光澤提供破局可能性。當讀者看到最後的結局，無法得知世界所面臨的下一瞬間，究竟是天火焚城也似的壯烈全滅，或是弔詭地「凍結於全向度的共時性」。在此，論述的曖昧搖擺處在於各個世代被監控、挪用，乃

11 這個角色可謂座落到象徵系統的真实層切片。在寒特的故事內，它—牠—祂以「自行取名為魔鬼化身(Metatron)」的形態，將自己化為反叛軍的領導者，與象徵秩序結構從事勢不兩立的干戈。

12 關於匱乏(客體)與重複(無關於匱乏的超額轉輪)之間的論證，齊澤克援引巴特勒(Judith Butler)與拉克勞(Ernesto Laclau)的相關辯論。巴特勒強調，無須有先天、先驗性的匱乏，主體便能夠在無數次回返的「永劫重複」施展自身的欲力與意志；拉克勞辯證性地補充，即使「匱乏」已然刻印於始初，不可能逆轉或弭合，但正由於如此，「總會出現異質元素，侵入並且造成普遍性結構的動盪。普遍性與特定性總是處於生生不息的相互病態性扭曲」(Zizek and Schelling 1997: 84)。

至於貶抑恐懼的客體(一如人工基因奴隸),究竟如何在象徵秩序之內得以(真正的)反轉逆襲?更進一步地追問,自以為操控主宰系統、無能分辨「凝視之我」(the I as the Gaze)與「肉身之眼」(the Eyes of the flesh)的主體(例如在《漫長的冬季》內,扮演宰制架構擁有者的「系統管理員」,在《滅絕之潮》構築九重天使城、扮演末世毀劫主人的奧辛納特世家,或是在《伊卡路絲的殞落》居於遠端衛星撥弄地球的HORUS)又能如何操作全面自動化的系統,反轉自身與體制的侷促與無望?或許,這兩難的議題可以從齊澤克在《自由為之深淵》(*The Abyss of Freedom*)的最後推論,得到一些線索與聯想:

倘若將慾望與欲力分別視為主體與客體,我們有了慾望主體與欲力客體。在慾望結構內,主體渴望的是(失落的)客體;然而,在欲力結構之內,主體將自身轉換為某種客體……或許這就是最高層次的自由,主動性與「被主動地操作」(being acted upon)於焉交疊並置。(1997: 85)

出身於1980年代前期且保守力量強大的英美恐怖小說陣營,巴爾克以拒絕退縮的姿態,¹³在文本宇宙編織出一個個熟諳身體政治、明顯或微妙地支持反異性戀霸權的各種情慾生態。用早期代表作的六冊短篇小說集《血之書》(*Books of Blood*)為例,巴爾克的引言鮮明強烈地呈現他處理「身體異質性」與「恐懼異色化」的主張——「每一具肉體都是一部充滿血漿的書籍。被切割開來的當下,血紅色的流體橫溢四濺」(1984: 書標引言)。

在巴爾克(1984)早期的作品,〈在山峰上,在城市裡〉(“In the Hills,

13 巴爾克在成名之後,以知名作家的身分接受同志雜誌《同盟》(*The Advocate*)的訪問。在那篇相當於公開自身非異性戀身分的訪談,他以誠懇細緻的態度,談論自身的情慾身分、寫作觀點,身分政治論述與其小說電影等創作文本的互動。

the Cities”），處理一對在政治觀點與情慾呈現上都迥然互異的(男)同性情人，旅行過東歐的某個荒城，意外目睹古老的集體瘋癲儀式(ritual of mass psychosis)，從此隨之共生化入(incorporated)兩座活生生的巨大塑像的一部份——每一具城池般巨大的塑像，竟然都是由一整座古城的居民的身體所營造而成！這篇小說以男同志的視野，呈現個部族化的再生產型態，將每一具不同的肉身視為「整體生殖」的零件，將異性戀的生殖迷信推向極端，接合父權社會對於不朽塑像的偏執，進而達到血腥瘋狂的歇斯底里高潮。在相當知名的電影《養鬼吃人》(Hellraiser)系列，以透過金屬製的魔術方塊，呼喚出生養地獄的使者，從這些使者的形態與操演生態觀之，作者(導演)將施虐與被虐者(Sado/Masochism, S/Mer)的美學風情與生命質地加以強烈化，透過鐵釘的穿透、撕皮裂體的噴爆、金屬與血肉的混體異化，鮮明呈現出肉身與情慾實踐的「由內而外」(inside/out)的反轉概念。

如同齊澤克所言，象徵秩序界被語言所建構，如同語言般構築精確的無意識被愉悅原則(pleasure principle)所掌握管理。真正超逾愉悅之外的並非象徵界面，而是「某個死結一般的創痛核心……套用佛洛伊德的辭彙，拉岡將之稱為『無與倫比之物』(das Ding, the Thing)，即為不可能絕爽的具體化身」(1989: 132)。在巴爾克的近作，《黑暗伽利黎》，向來被通俗文化與類型小說以猙獰可怖模樣所形塑的「異形它者」，卻被給予了高等位格與黑暗光華，堪稱晚近情慾身分政治論述在類型小說的燦爛逆襲。

齊澤克在《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此書論述「無與倫比之物」時，特意強調「『無與倫比之物』必須與科幻與恐怖文本領域的母性負面意象充分連結，例如在《異形》(Alien)這部電影所再現出的前象徵時期的『母體化物』(maternal Thing par excellence)」(1989: 132)：就這個分析架構而言，並不適用於巴爾克的小說，兩者出現鮮明的鴻溝與落差。首先，就故事與人物的設定而言，在某些情境內體現了渾沌原型母性(the archetypal Mother Figure，或更精確地形容為太

初母皇(Primordial Matriarch))的不死氏族主母西色利亞(Cesaria)並非後拉岡精神分析學者在某些通俗科幻恐怖文本中所閱讀到的大對體(the Big Other)，而是通曉真實層與絕爽的不可能實現性、從中爬梳命運與世界的權力者與先知。

在本書中，「無與倫比之物」有幾種層次不等的詮釋與體現(embodiment)。就不死氏族巴巴洛絲(Barbarossa)的世代讎敵、葛瑞世家(the Geary family)而言，超拔於現世(象徵秩序)之外、擁有超自然能力與近乎永生的肉身的巴巴洛絲家族，本身即是一個巨大的「夢幻物」(fantasmatic object)。對於葛瑞世家的許多世代女性(包括作者以善意戲謔語氣呈現出來的浪漫女英雄，蕾秋)而言，提供並掌握了「等同於死亡驅力的不可能絕爽」，便是與書名相同的黑色(反)英雄，被暗喻為黑暗(反)基督的男主角，伽利黎。他與大多數的男女通吃雙性戀男主角相反，並非慾望的驅動者或是慾望主體：透過巴爾克慧黠迷人的敘述，伽利黎成為「小欲求物」(objet petit a)的道地典範，也就是「純粹的空無，於焉成為慾望的客體因素」(Zizek 1989: 163)。再者，對於鏡中框架的作者(巴爾克安排在文本內充當寫作／驅動化身的後設作者)，身為魔神與人類混血兒的艾德蒙(Edmond)既是身受命運(主母西色利亞)驅策、書寫下不朽凝視下的微型世界，亦是巴爾克在文本內託身為寓言家的觀照視角。最具突破性的情節展現於艾德蒙的第二層文本(有別於第三人稱敘述的宏觀故事)——對他而言，夢幻慾望物(的化身與擁有者)並非中心主角伽利黎，而是已死的父／(性)神，以及同父異母的姊姊蔓利塔(Marietta)——後者既是浪蕩不羈的酷花花公子(queer dandy)，¹⁴也是女同性戀結構的陽性化身(a masculine dyke as phallic being)。

艾德蒙一方面處於人類(現世、象徵秩序界)與人外氏族(神異結

14 正如同伽利黎是框外文本(正式故事)的夢幻欲求物，蔓利塔成為框內文本(以及框內作者)投注大量觀視的對象。巴爾克以迷人的筆觸，鋪陳異性戀男性(艾德蒙)對於遠比自身更自在張狂、佔有酷兒陽性(queer masculinity)的蔓利塔，迷戀與羨慕交織的情愫。

構，真實層化身)的夾縫，以尷尬與迷惘的身段探索這兩者的鴻溝與對話之道。在書寫正文、也就是以第三人稱敘事觀點陳述伽利黎浪跡世界的輾轉流離生涯，艾德蒙總是回返到「嬰孩城池」(L'Enfant)這座包含典藏怪奇超生命體的古宅，正視自身無以言說的猥褻情念。在提及「幻境」與「對體」時，齊澤克在前後兩本著作，分別有著看似對比相斥的說法。第一種言說是他早期著作的重點：幻境之所以成立，並非讓主體在幻境劇場內滿足自身的慾望，而是「透過幻境的種種裝置，讓主體學習如何去慾望」(Zizek 1989: 118)；然而，更為乖張弔詭的前提，卻是「透過幻境而得以成立的慾望，為的也是要抵擋制衡它者的慾望——換言之，也就是最純粹的形銷解體，死之慾望」(1989: 118)。倘若說持續撰寫伽利黎在人世間的漂泊與情慾史，是愛德蒙(框架內作者)得以在幻境劇場內建構慾望的修行演練，在他以私密書寫的方式，注視已死父神以記憶殘相的形式達成奇幻回返(phantasmatic return)、或是傾倒於恣肆張揚風華與情慾魅力的蔓利塔，方纔驚覺自身的原欲不可能光靠著幻境劇場的拼湊搬演便得到極致的揮發。此時，便是通透幻境，更進一步地逼近齊澤克在《自由的深淵》所闡述的破局點，也就是瞥見「它者的絕爽」(jouissance of the Other)。¹⁵

在一段篇章裡，艾德蒙以炫惑的語氣描繪蔓利塔與魔神父親的魔性魅力，以及兩者之間的類似性與亂倫情慾。艾德蒙誠實地承認身為殘障(失去性能力)異性戀人類男性的自己，對這兩者同時存有強烈的愛慾與欽羨，並且被這兩種外於人類性(human-ness/humanity)的怪誕陽性所蠱惑。在這段落，我們從而看到主體「在異已至極慾樂的當下，邂逅祂真正的存在」(Zizek 1989: 25)：

15 在此，我們可以在齊澤克論述哲學家謝林(F. W. J. Von Schelling)的篇章再次印證，「不可能的絕爽」即為主體(敘事者、無性能力的異性戀男性)透過種種的折射與轉喻鍊，從中驚鴻一瞥的「異已存在性」(Zizek and Schelling 1997)。在此處的異已，並非在一般通俗小說或電影，被征服控制、並與原初的母體意象加以鏈結的異形怪物，而是讓主體震懾戀慕的「極頂對象」，像是書中描述的超拔風華陽性女同性戀，或是具備不可思議性魅力的「不朽外人」男性肉身。

「我們這個魔神家庭的父神是如此的性慾流溢，以致於他禁不住在六歲大的女兒面前，赤條條地頂著硬挺的性器晃來晃去。嘿嘿，那可真是幫你的寫作素材增色不少，是吧？」

她對著我咧嘴嘻笑，我敢發誓任何信仰上帝的人看到這等模樣，必定會說魔神就是這張面孔。她美麗邪門的五官綻放出赤裸愉悅，由於我的魂飛魄散而得意無比。(1999: 379)

以「不可能」的形貌存在於卡羅萊納北方的沼澤邊陲古宅，巴巴洛絲家族宛如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在《聲音與狂怒》(*Sound and Fury*)所鋪陳的古老頹敗南方家族的超自然魔幻版本。在此，作者顯然別有居心地設計，無論是已經崩解於空無的巴巴洛絲前家長、死去的父神，或是常駐不朽的母神，兩者皆為黑色人種的外型；就歌德恐怖小說的典型而言，超自然的黑色魔神設定藍圖絕大多數都是以「邪惡白種人貴族或教士」為原型人物，在此的膚色設計，鮮明地在以往彷彿不言自明的「邪惡高貴美學人物等於白種頹廢貴族」配套上，打上了一個成功的叉叉。至於巴巴洛絲家族與其永世對手，葛瑞世家的激烈纏鬥，也可以從幾個層次來假以觀照。以性慾身分的換喻鍊(*metonymic chain*)而言，外於象徵秩序界的巴巴洛絲家族不但以超自然位格與常態人世斷裂，更由於成員的各形各色「多元性異態」(*polymorphous perversion*)，對照於上層階級、刻板(甚至極端)異性戀生態與性別位置的葛瑞世家，於是成為「象徵秩序界內的補充物」，也就是從中支持系統運作的「內在多出物」(*inherent excess*)。

伽利黎的位置最能夠說明這兩套看似劇烈對立系統的攪纏糾葛，以及微妙的相互支持。他被葛瑞世家的男性家長所掌控，用以成為慰藉家族內空虛不滿女性成員的慾望性物。如果故事的軸線僅止於此，我們無法不悲觀地套用齊澤克在論述謝林(F. W. J. Von Schelling)時提到的「神聖系統」與「俗世系統」。身為超自然奇觀的巴巴洛絲家族(神聖系統)與駕馭現世物質與權力的葛瑞世家(俗世系統)，兩者猶如艾雪(Escher)著

名畫作的那雙手，彼此勾勒對方的輪廓，從中滋生出次要層級與細緻化的位階藍圖：

從聖神屬性的大化之洋，俗世系統從中建構自身的單獨領域；然而，當我們進入了俗世領域，聖神屬性反而成為包含在它之內的特定基地，被它所收納，也就是化為它的超結構，它內部的多出物。
(Zizek and Schelling 1997: 14)

巴爾克試圖另闢蹊徑，以兩個女性主角(分別代言了人類與「人外」)的意志與權力表現破除了「被父權體系內化的踰越反抗」，拒絕讓這則漫長的身分慾望寓言落入象徵系統的大異己之手。最主要的性別慾望母題，便是以太古女神、不死氏族母皇西色利亞為命運的代言，成為最終權力的再現。打從一開始，書寫者艾德蒙以懺情順從的告白讓讀者了然，本書「是在西色利亞·巴巴洛絲一手操控駕馭之下，逐漸成形的作品」(Barker 1999: 3)。無論是以死者形貌持續遊蕩古宅、展現「猥褻父性肉身」的尼克德瑪斯，身陷於俗世藩籬、被「大異己」驅使束縛的伽利黎，都是身為命運的西色利亞所掌握注視的「世界百態」。身處命運(欲力操控者，西色利亞)與世界(幻境劇場，伽利黎)之間，品味張力迭起交手的敘事者艾德蒙，便是班雅明在《德國哀劇的起源》中，以末世視野觀看萬物的寓言家。他使用的敘事框架如同班雅明區分的兩種時間觀，前者為「空洞、同質性的時間流程」(一如官方性的歷史紀事)，但反撲前者的力量乃是「不連續性的飽和時間」(用以再現歷史物質主義)。前者用以敷衍整納葛瑞世家數百年來的父系歷史，後者則拿來處理巴巴洛絲這個華麗頹敗不死神魔家庭的內爆、糾葛以及對立於先驗超越(transcendence)的異教情慾痕跡。

就此套論述而言，象徵秩序界的掌握者並沒有無所不在的能動性，反而在「最終審判」的逼臨籠罩之下，成為「躍向過往的猛虎」爪下的祭品。在班雅明的理論框架內，唯有身為命運代言者的寓言家，得以在一

切毀朽的情境上訴說「歷史(陽性敘事)的結局。自此,所有的事件與物件得到自身無堅不摧的意義,在普遍敘事層次取得最終的地位」(Zizek 1989: 142)。這樣的情境正是在兩大世家的拉鋸繩索即將斷裂、默示錄的最終戰役看似一觸即發,西色利亞來到葛瑞世家,對著瀕死的男性家長宣告時候已到。她(世界)以恆常不變的太古視野「看著他的死亡與湮滅」(Barker 1999: 489)。在此處,我們可以再度從德勒茲分析被虐者的框架,看到宰制歷史、傳承世界的女性(而且在性/別層次展現陰性力量[feminine power])宗主西色利亞,可被視為德勒茲受虐情慾架構形容的「引導神話向度登場的[支配]母性」化身(1991: 47-56)。

除了以西色利亞充當命運母神的角色,《黑暗伽利黎》最精彩成功的描繪,便是以蔓利塔為男主角伽利黎的對照版。在人世間流放自身的伽利黎成為現世權力者的性客體,失去了動力與欲求能力,直到女主角蕾秋登場。作者以諧擬羅曼史的語氣調侃,這段讓伽利黎重拾自我的愛情應該命名為「陷入愛河的蕾秋」(Rachel in Love)(1999: 636)。¹⁶ 相對於沈重追尋救贖與終結的伽利黎,蔓利塔長年遊走於「嬰孩城池」與外界現世,從未失去逍遙的能動性、遊戲人間的風采。被弟弟以眩惑語氣形容為「亂倫慾望撩撥者」的蔓利塔,她以收放自如的魅力與陽性能量戲謔人間,其駕馭萬物的力道便來自於非人身體與酷異陽剛的組合。蔓利塔的陽性花花公子魅力,在敘事者強烈有力的描繪下,超逾了一般以「男性化」為性別跨界生理女性的基本踰越元素。她既能夠穿得像個邋遢的卡車司機,也如同迷離夜總會的演唱歌手,套上一襲華美的燕尾禮服;更甚者,在她「幾乎什麼都不穿的時候,在曠野上恣意奔馳,新鮮如草地上的露珠」(Barker 1999: 37)。在此處,我們看到了無法以巴特勒(Judith Butler)(1990)前期運作的性別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理論框架來印證的奇拔「外人」肉體再現。若以拉岡論述性慾機制的語言來說明,蔓利塔的陽剛身分與拉子情慾正是唯一體現了無法被化約為「異性戀機制同

16 作者用類似羅曼史小說的書名作為嘲弄點,不帶惡意地比喻女主角的浪漫執著。

質性」的「真正異質情慾」(the only true hetero-sexuality)。參照齊澤克的說法：「非但不是正常，直態的異性戀機制如同結構內的多餘物，一如手帕上的污漬，將異己混淆為同質性的一部份，將同性的性伴侶妄想為生理異性。簡言之，異性戀機制才是原初的扭曲變態」(1997: 56)。

綜上所述，巴巴洛絲氏族的「外人／不人類」屬性與常態世界的互動媾和，可從伽利黎與蔓利塔這兩個主要人物的超生命刻印窺見拉岡所區分的情慾框架。前者無論與生理女性或男性的遇合，都是「鮮明純粹的〔男〕同志性慾」——以自身的男體為叛逆性的慾望客體，藉此與葛瑞家族化身的俗世／異性生產機制相對立，但不免落入相互循環共生的自動性。後者與生理女性的激情愛慾，跨越了超自然與「自然」的疆界，活生生再現了跨性別T的動能，說明何以「唯有在同女的情慾之內，情慾對象的異己性質方能夠完全被保有，主體得以直接與另一性(the Other Sex)交合」(Zizek and Schelling 1997: 56)。於是，以葛瑞家族為人類情慾範式的對照組，巴爾克的「不朽氏族」鮮明地再現後拉岡精神分析理論對於常態人類與情慾正典的批判。

三、結論

綜上所述，「人外」與「外人」的動能持續改寫生命權力政治的語言與型態，其座落的文類場域讓跨物種情慾成為可能，詰問並抗衡「種一族」(species-race)與性／別的現狀與常規。基進的旁若書寫成就了「人外－外人」的多重敘述組模(narration formats)，而非正統文學視為精神／靈魂所在的人文主義。闖關多重邊界的跨物種書寫跨越了人文主義視為必須的階序與律令(例如當前的人道人口政治與性別主流化)，實踐的是以客體為主的「肉身－機體」混雜敘述，文本(載體)不可或缺的反常規敘述就是「人外」與「外人」的曖昧燥動力量。如同波狄瑞克的說法，旁若文學揉織交合著許多雜異質素，其具備「不人類」的身(生)體組裝可視為「分享經典、符徵迴盪、充滿多餘與不一致的超文本。此種由諸多作品合成的集體互文超文本被命名為『幻設』，它賦予這些作品迷亂的

力量……」(1995: 62)。透過本論文分析的書寫干涉，這些反道統而行(形)的事物與不斷滋生的「負」作用產生巨大的搗毀能量，朝往正向未來無法窺見之處，不間斷地侵蝕含蓄言說的戒律與界線

引用書目

白瑞梅、劉人鵬(Parry, Amie Elizabeth, and Jen-Peng Liu)。2007。〈「別人的失敗就是我的快樂」：真相、暴力、監控與洪凌科幻小說〉“Bieren de shibai jiu shi wo de kuaile”: Zhenxiang, baoli, jiankong yu Hung Ling kehuan xiaoshuo” [Schadenfreude: Truth, Violence and Surveillance in Lucifer Hung’s Science Fiction]。著：丁乃非、白瑞梅、劉人鵬 [By Naifei Ding, Amie Elizabeth Parry, and Jen-Peng Liu]。《罔兩問景：酷兒閱讀攻略》*Wangliang wenjing: Kuer yuedu gonglue* [Penumbrae Query Shadow: Queer Reading Tactics]。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Zhongli: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209-45。

趙彥寧(Chao, Yen-Ning)。2001。《帶著草帽到處去旅行：性／別、權力、國家》*Daizhe caomao dao chu qu luhang: xing/bie, quanli, guojia* [Traveling around with a Straw Hat: Gender/Sexuality, Power, and the Nation]。台北：巨流 [Taipei: Juliu]。

——。1997。〈自我複製的快感——評洪凌《末日玫瑰雨》〉“Ziwo fuzhi de kuaigan —Ping Hung Ling *Mori Meigui Yu*” [The Pleasure in Self-replication: A Reading on Lucifer Hung’s *The Rain of Rose at the End*]。《聯合文學》*Lianhe wenxue* 13.4 (1997): 178-79。

劉人鵬(Liu, Jen-Peng)。2007。〈在「經典」與「人類」的旁邊：1994幼獅科幻文學獎酷兒科幻小說美麗新世界〉“Zai ‘jingdian’ yu ‘renlei’ de pangbian: 1994 You Shih kehuan wenxue jiang kuer kehuan xiaoshuo meili sin shihjieh” [Between and Apart from Canon and Humanity: The Brave New World of Queer Science Fiction of Youth Science Fiction Literary Award in 1994]。著：丁乃非、白瑞梅、劉人鵬 [By Naifei Ding, Amie Elizabeth Parry, and Jen-Peng Liu]。《罔兩問景：酷兒閱讀攻略》*Wangliang wenjing: Kuer yuedu gonglue* [Penumbrae Query Shadow: Queer Reading Tactics]。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Zhongli: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161-208。

Barker, Clive. 1984. *Books of Blood: Volume 1*. London: Sphere.

——. 1999. *Galilee*. London: HarperCollins.

Benjamin, Walter. 1977.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Trans. John Osborne. Intro.

- George Steiner. London: New Left.
- . 1996.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I*. Cambridge, MA: Belknap.
- Broderick, Damien. 1995. *Reading by Starlight: Postmodern Science Fiction*. London: Routledge.
- Butler, Judith. 1990.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 Clarke, Andy. 2003. *Natural-Born Cyborgs: Minds, Technologies, and the Future of Human Intelligence*. New York: Oxford UP. [http://dx.doi.org/10.5860/CHOICE.41-2211]
- Copjec, Joan. 1994. *Read My Desire: Lacan against the Historicists*. Cambridge: MIT P.
- Delany, Samuel R. 1999. *Shorter Views: Queer Thoughts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Paraliterary*. Hanover, NH: UP of New England.
- . 2005. “Science Fiction and ‘Literature’—or, The Conscience of the King.” *Speculations on Speculation: Theories of Science Fiction*. Ed. James E. Gunn and Matthew Candelaria. Lanham, MD: Scarecrow. 95-118.
- . 1988. “Forum on Cyberpunk.” *Mississippi Review*. Ed. Larry McCaffery. 33.
- Deleuze, Gilles. 1991. *Masochism: Coldness and Cruelty*. New York: Zone.
- de Lauretis, Teresa. 1987. *Technologies of Gender: Essays on Theory, Film, and Fiction*. London: Macmillan.
- Halberstam, J. Jack, and Del LaGrace Volcano. 1999. *The Drag King Book*. London: Serpent’s Tail.
- Hand, Elizabeth. 1990. *Winterlong*. New York: Bantam.
- . 1992. *Aestival Tide*. New York: Bantam.
- . 1993. *Icarus Descending*. New York: Bantam.
- Haraway, Donna.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 Jones, Gwyneth A. 1989. *Divine Endurance*. New York: Tom Doherty.
- . 1993. *Flowerdust*. London: Headline.
- . 1998. “About a Girl . . . : Deconstructing Divine Endurance.” “Chosen Among the Beautiful: Encountering the Object of Desire.” *Gwyneth Jones Personal Web Page*. Web. 20 Nov. 2019.
- Kincaid, Paul. 2017. *Iain M. Banks*. Champaign: U of Illinois P.
- Le Guin, Ursula K. 1997. “Changing Kingdoms.” *Trajectories of the Fantastic: Selected Essays from the Four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Fantastic in the Arts*. Ed. Michael A.

- Morris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3-12.
- Montgomery, Stacy. 2002. "Twenty Passings." *GenderQueer: Voices from Beyond the Sexual Binary*. Ed. Joan Nestle et al. Los Angeles: Alyson. 238-46.
- Said, Edward. 1983. "Traveling Theory."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Harvard UP. 226-47.
- Sangari, Kumkum. 1990. "The Politics of the Possible." *The Nature and Context of Minority Discourse*. Ed. Abdul R. JanMohamed and David Lloyd. New York: Oxford UP. 216-45.
- Wittig, Monique. 1993. "One Is Not Born a Woman." *The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Reader*. Ed. Henry Abelove et al. New York: Routledge. 103-09.
- Wolfe, Cary. 2010. *What Is Posthumanism?*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 Zizek, Slavoj. 1989.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 . 1994. *The Metastases of Enjoyment: Six Essays On Woman And Causality*. London: Verso.
- . 1996. *The Indivisible Remainder: An Essay on Schelling and Related Matters*. London: Verso.
- . 2009. "Ego Ideal and the Superego: Lacan as a Viewer of Casablanca." *LACAN DOT COM*. 5 Apr. 2009. Web. 20 Nov. 2019.
- Zizek, Slavoj, and F. W. J. Von Schelling. 1997. *The Abyss of Freedom/Ages of The World*.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http://dx.doi.org/10.3998/mpub.11193>]

控制社會中的昆蟲式反抗

以《Psycho-Pass 心靈判官》為例*

林宛瑄**

摘要

傅柯觀察十八世紀十九世紀的歐洲社會，提出了規訓社會一詞，指涉仰賴各種拘禁場所或管制場所的權力運作模式。德勒茲則指出，到了二十世紀初，因應遍布的網路與各種監控科技的發明，權力的運作已經脫離這些場所的侷限。面對鋪天蓋地的新興數位監控體系，我們是否還有反抗權力體制的可能性？可能的話又是如何發生？

不論是從數位生物科技如何組構社會或是網絡型政治組織興起的角度切入，不少當代論者都以昆蟲做為方法來探討當代社會的權力運作模式與從事反抗的可能性，也一再指出「蟲群政治」(politics of swarms)的內在矛盾或說曖昧性。本論文將從上述脈絡出發，以《Psycho-Pass 心靈判官》動畫系列為例，探討在控制社會中進行昆蟲式反抗的可能性。本人主張在昆蟲模式的曖昧性中找到驅動流變為蟲群的張力，乃是昆蟲式反抗動力迸發之處；而「無臉」昆蟲對「臉性」概念的衝擊，以及擬態所帶動的流變為不可察覺(becoming-imperceptible)邏輯，則提供了昆蟲式反抗的行動策略。

關鍵詞：《Psycho-Pass 心靈判官》，規訓社會，控制社會，蟲群政治，臉性，擬態，流變為不可察覺

* 本文108年6月3日收件；108年11月19日審查通過。

**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副教授。

Lessons of Swarm-Style Resistance i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 from the *Psycho-Pass* Series

Wan-shuan Lin*

Abstrac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witnessed the invention of digital networks and new surveillance technologies. New paradigms of control, according to Gilles Deleuze, thereafter pervade modern societies. With an all-encompassing and sophisticated digital system of surveillance immersing itself in every aspect of the society, is resistance possible at all? And how might it be possible?

A number of scholars have employed the notions of insects and swarm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iotechnology on society as well as the configuration of network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Many find the insect metaphor useful in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of resistance to power in control societies. However, since swarming can inform both modes of resistance and control, repeated references to contradictions within the so-called “politics of swarms” have been raised. This paper takes as its aim to explore applicable strategies to cultivate resistance while circumventing its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The *Psycho-pass* Series is drawn as an example to set up a swarm-style resistance in control societies. Two of the most noteworthy lessons from the series would be swarming without a face to undermine the machine of faciality and resorting to mimicry to trigger the process of becoming-imperceptible.

Keywords: *Psycho-pass* Series, disciplinary societies,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 politics of swarms, faciality, mimicry, becoming-imperceptible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Yuanpei University of Medical Technology.

控制社會中的昆蟲式反抗

以《Psycho-Pass 心靈判官》為例

林宛瑄

一、前言：從規訓社會到控制社會

在《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中，傅柯(Michel Foucault)從十八世紀歐洲的刑事與獄政變革談起，探討這些變遷反映了何種新類型權力技術的興起，進而提出規訓社會(disciplinary society)這種不同於王權機制(the sovereign)的新興權力運作模式(198)。如果說王權掌握生殺大權等壟斷式暴力，以施加於罪人肉體的酷刑嚇阻特定行為、迫使臣民絕對服從，規訓權力則著意製造「溫馴的身體」(“docile bodies”)，將各種旨在操控、形塑與控制的技術施加於身體之上，轉化之重組之使之柔馴且具備生產力(*Discipline* 47, 136)。如此對身體進行密集微型投資的政治解剖學，催生了一整套與之相輔相成的權力技術，將身體配置圈禁於各種自成一格的拘管場所(sites of confinement)，依據時間表因時因地制宜地對身體作息進行「分層、持續且功能取向」的監控與管理。正因規訓權力的作用有賴於對個人身體的持續凝視與檢查，邊沁(Jeremy Bentham)設想的全景敞視監獄(*Panopticon*)便成為傅柯心目中最完美的規訓裝置，外側透光的個別囚室環繞著位於中央的監視塔：「被配置監禁於個別囚室中的個體，都無所遁逃於監視者的目光，但囚室的牆壁卻阻斷了他與牢友們溝通的可能性。他被注視著，但卻無法回視」，個體甚而內化了監視體系的凝視，進而自我監控(*Discipline* 138, 141-43, 176, 200)。德勒茲(Gilles Deleuze)將規訓權力的運作方式稱之為塑造(mold)常規主體模型的過程，而被規訓塑造的對象即是個體(individual)，依所

謂正常生命進程在各管制場所之間移動，每個場所的管理模式同時被引為決定所謂正常個體與異常個體的判準（*Discipline* 177-84, 199；Deleuze 177-78）。

德勒茲在〈附錄：控制社會〉一文中則指出，到了二十世紀初，規訓權力賴以成立的各種拘管場所開始逐漸崩解，但不表示個體脫離權力控管得到自由，毋寧該說權力的運作因應各種數位監控科技的發明而脫離了這些場所的侷限，可以隨時隨地更加無孔不入地監視控管人們，德勒茲因此宣稱控制社會的權力運作模式已取代了規訓社會（Deleuze 178）。相對於規訓社會的運作邏輯，亦即圈禁個體並迫使其依據各場域的理想常模重新學習行為準則，即時通訊與網際網路等科技讓過去的拘禁場域質變為某種開放場域，監控的目的也不再著重於塑造理想個體；控制社會中的控制手段毋寧說是一種調控（modulation）連續體的概念，其重點在於透過遍布的網絡（distributed network），也就是所謂的資訊柵（information grid），整合種種管理監控的科技與技術，例如公共場所眾多角落中的監視器、為控管人員流動而建置的指紋資料庫、電子晶片護照以及臉部辨識系統、甚至搭乘大眾運輸所使用的智慧晶片卡等，都是監控管理網絡的一環，持續進行控制、紀錄、辨識等動作。辨識並建構出行為模式後，系統即可預測被觀察者的行動，在事件發生前就看見，進而根據種種行為模式，事先規劃出最佳路徑、最佳動線、最佳流程、最佳選擇等所謂最佳解，亦即柏格爾德（William Bogard）所謂的浮動格式（a fluid format）（Deleuze 178-80；Goodman 38；Savat 53-54；Bogard, “Deleuze and Machines” 18-19, 21-22）。藉由數位科技與網際網路進行的監控過程既不受限於一時一地，受觀察者甚而未必自覺被監控或被強制服從甚麼規定，系統在反覆觀察記錄預測的過程中也將持續成長優化，權力監控因而似乎變得雖較前隱晦但更加全面。

誠如拉斯穆森（Mikkel Bolt Rasmussen）所說，德勒茲的〈附錄：控制社會〉影響深遠，多數探討當代社會中權力去中心化／網絡化傾向的研究都會回顧這篇短文，亦即卡魯亞（Gilbert Caluya）所謂監控研究的德勒

茲轉向(626)。¹ 當然當代亦不乏主張「控制模式全面取代規訓模式」的宣稱值得商榷者。² 哈特(Michael Hardt)與內格里(Antonio Negri)的說法或可綜合雙方論爭，亦即規訓權力模式依然是驅動民眾日常實踐的重要動力之一，其常模化裝置在控制社會中變得更強化更普遍化；但無處不在的網路也讓控制社會的監控體系得以突破規訓場所的限制(*Empire* 23)。值得注意的是，德勒茲提及規訓社會中每個場域的權力運作模式都同時具有個體化(individuate)與群集化(amass)的特色，持續進行的控管改造不僅號稱是為了塑造理想個體，也是為了管理並促進群眾的生命福祉；換句話說，德勒茲顯然著眼於生命權力(biopower)與規訓權力相輔相成、並將規訓裝置轉化為生命政治治理策略的面相，也因此他在強調控制權力模式當道時，似乎暗示生命權力一併被這個新興模式取代了(Deleuze 179-80; Lilja and Vinthagen 121)。然而，哈特與內格里在延伸德勒茲的討論時指出，規訓社會過渡到控制社會時，種種新興的生命治理技術事實上讓以生產／再生產生命為目標的生命權力得以全面實踐：「通訊、媒介與資訊網路等直接組織人的神經網絡與大腦，監控系統與醫療照護系統直接作用於人的身體」(*Empire* 23-24)。我們或可進一步補充以上說法，生命權力之所以在控制權力模式中獲得新養分而發展出新的形式與策略，與當代社會中資訊科技及生物科技領域相結合的現象密切相關(Munro 685; 哈拉瑞 20)。生物識別監控系統(biometric surveillance)即是兩種科技結合後所產生的典型控制手法，其運作方式

1 本文為網路期刊文章，未編頁碼。此外，萊恩(David Lyon)主編的《監控的理論化：全景敞視監獄之外》(*Theorizing Surveillance: The Panopticon and Beyond*)可謂卡魯亞所謂德勒茲轉向的代表論述之一。

2 薩瓦特(David Savat)便認為，這兩種權力模式毋寧是同時運作於當代，甚至透過相同的工具如資料庫等共同進行多重監控(58-59)。卡魯亞則在檢視當代監控體系研究棄傅柯就德勒茲的傾向時，試圖為全景敞視模式的有效性辯護；他先是指出即使是傅柯本人也確實在《安全、領土、人口》(*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中提出「安全」的概念，以探討早期過度強調規訓模式時無法涵蓋的新監視體系，但對「安全」的追求還是有賴於規訓權力的工具與追求安全的機制來共同促成(*Security* 10; Caluya 630)。

為以特定感應器收集生理特徵或是行為型態等生物資料，藉由特定演算法將這些資料轉換為數位資訊後儲存於資料庫，供生物識別之用；例如臉部辨識軟體登錄某人面容後，即可被延伸使用以辨識該位人士，甚至已有駭客可藉由臉部照片辨識指紋(Sadowski and Pasquale 8-10)。³ 如前所述，這些生物識別系統可搭載於原已遍布於生活環境中的監視器上，尤其是被重新想像並建構為資訊溝通網絡之任一平台或節點的智慧城市(the smart city)中；居民往往鮮少察覺這些系統的存在，更遑論對同意被採取生物資訊與否加以置喙(Sadowski and Pasquale 2)。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也在《21世紀的21堂課》中設想，當人們與數種或數層生物資訊回饋系統連線，感官知覺情緒變化都轉化為指數受到管理調控時，「大數據演算法就有可能比我更能監測和理解我的感受」；哈拉瑞更進一步設想，如果金正恩掌握了必要的相關新技術，可能會造就怎樣的新型態數位獨裁政權：「可能所有北韓公民都會被勒令配戴生物統計手環，不僅監控他們的一言一行，還掌握他們的血壓和大腦活動……如果你看到一張金正恩的照片，而生物統計感測器發現你出現憤怒的跡象(血壓升高、杏仁體活動增加)，大概早就已經被抓進勞改營」(66, 84)。換言之，哈拉瑞認為生物資訊科技的進展讓生命權力與控制權力相結合，並由此演化出更隱微細密的監控系統與難以遁逃的權力網絡；他甚至悲觀表示，如此一來演算法終將成為獨裁者自身，人類則變成退化而馴化的資訊牛(90-91)。

面對鋪天蓋地的新興監控體系，我們是否還有反抗權力體制的可能性？可能的話又是如何發生？內格里以〈控制與流變〉(“Control and Becoming”)為題訪談德勒茲時，便提出了類似的疑問。德勒茲則表示，雖然控制社會對生活樣態的箝制較諸王權社會與規訓社會更為全面，連溝通與想像力都不能倖免，但任何特異性任何少數也更可能在控制

3 生理特徵如臉部、指紋、虹膜、基因等，行為型態如聲紋、字跡、步伐等(Sadowski and Pasquale 10)。

社會中找到獲致較多自由的抗爭途徑。而既然溝通已被綁架，我們已無法期盼藉由讓弱勢發聲的方式進行對權力的反抗；因此應該著眼於與控制社會相對應的機器類型，亦即資訊科技與電腦網絡，想辦法讓不同於溝通的創造發生，因此新型態反抗的重點可能在於「創造非溝通的液泡(vacuoles)與電路阻斷器，讓我們得以逃離控制」，期能「生產出新時空，不論其表面積或體積有多微小」(Deleuze 174-76, 180)。⁴ 夏維若(Steven Shaviro)呼應德勒茲的說法，並進一步指出，以資訊迴圈機制運作的社會即是一種昆蟲社會；更精確來說，是如同蜂巢或蟻窩那樣尊崇某種同質群體意志的社會：蟻群藉由費洛蒙調節行動，資訊回饋控制御機制即是費洛蒙的人類版本，也即是後現代社會中權力的展現方式。夏維若主張，反抗新型態監控的新武器即是某種另類昆蟲政治的模式，亦即蚊蠅等飛蟲之成群(swarm)；不同於蜂與蟻等社會性昆蟲，無論其所成之群如何漫漶無邊，都不會形成同質性團體或僵固的社會階級(51)。事實上不論是從生物資訊科技如何組構社會或是網絡型政治組織興起的角度切入，不少當代論者都以昆蟲做為方法來探討當代社會的權力運作模式與從事反抗的可能性，也不約而同關注所謂昆蟲／蟲群政治雖具備反抗潛能，但也可能讓控制手法更無微不至的內在矛盾或說曖昧性。⁵ 這

-
- 4 必須補充說明的是，內格里提問時尤其關切的是共產主義在所謂「溝通社會」(communication society)中是否還可能發揮適切的作用。由於共產主義聚焦於資本家加諸經濟壓迫的權力形式，主張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目的發起革命，當代原就不乏評論者針對此套路發出警語，認為過度強調階級與陣線概念的反抗模型往往反過來框限住革命實踐的方向；應該問題化對階級問題的過度執著，才能如實逼視我們所處的生存情狀，讓能回應當代問題的新型態反抗得以發生(Newman, "War on the State" 4-5; Raunig 183-84)。隱形委員會(The Invisible Committee)因而主張，革命視野應從檢視政治機構如何組織社會，轉向探討構築生活環境或世界樣貌的物質科技組構(95-98)。德勒茲回覆內格里提提及的我們已無法藉由讓弱勢發聲來反抗權力，即是出於上述敦促超越階級抗爭的思維；而從與特定社會相應的機器為起點思考反抗形式的呼籲，可說呼應了隱形委員會從社會的科技組構層面切入思考革命的主張。
- 5 除夏維若之外，其他論者與其主張如布瑞多提(Rosi Braidotti)引述海拉威(Donna Haraway)指出的分子生物學「昆蟲典範」(insect paradigm)以及與資訊控制社會的連

種曖昧性或可理解為某種權力與反抗之間的共構：既有權力關係形塑了反抗的形式，而反抗形式也可能弔詭地強化既有權力關係，或是產生新的權力關係(Lijia and Vinthagen 111)。本文想進一步指出的是，從昆蟲模式的殊異性來看，這種曖昧性則可說源於夏維若口中社會性昆蟲與蟲群動能的對比，或說「以昆蟲做為資訊調控模式的靈感來源」與「以昆蟲做為衝撞控制權力的行動策略」這兩個面向之間的差異。⁶ 若要探討以昆蟲模式反抗控制社會中權力壓迫的可能性，我們便須釐清：衍生自昆蟲模式中的哪些行動策略有助於生產得以逃離控制的新時空。

本論文將從上述脈絡出發，以《Psycho-Pass 心靈判官》動畫系列為例（以下稱《心靈判官》），探討在控制社會中進行昆蟲式反抗的可能性。《心靈判官》在巴哈姆特板被譽為神作，第一季與第二季電視動畫分別於2012年及2014年問世，2015年推出全新劇場版，改編或新創的漫畫與小說也都已發行。⁷ 本文以兩季電視動畫為主要分析對象，故事背景設定在一個全面連線的社會，監控社會大眾的希貝兒(Sibyl)先知系統（以下簡稱希貝兒），是由複數人腦與資訊系統連結而成的智慧網絡。在這個社會中，監控系統無孔不入，民眾隨時隨地被資訊碰觸，隨時被檢

結，柴克爾(Eugene Thacker)對蟲群去中心複雜網絡模型如何影響計算機科學發展與現代政體(body politic)演變的觀察，哈特與內格里口中已取代無產階級成為反抗力量的諸眾(multitude)與黃蜂的連結等等。關於昆蟲模式的曖昧性則可見柴克爾、佩瑞卡(Jussi Parikka)、科林格南(Fabienne Collignon)與坎帕納(Joseph Campana)等人的觀察。相關討論皆詳見後文。

- 6 必須注意的是，相關文獻未必都以同樣的詮釋角度探討昆蟲／蟲群意象或比喻，例如柴克爾不同意把蜂群蟻群的組織方式視為控制社會的縮影（詳見後文），抑或如斯帝帕諾維克(Andre Stipanovic)所指出，即使同樣被歸為社會性昆蟲，維吉爾也同時援引兩者來譬喻政治，但卻是採兩者相互對照的方式，以蜂群譬喻勤於自行生產者／羅馬人，蟻群譬喻收割他人成果者／非羅馬人(Stipanovic 14-19)。篇幅所限，本文無法爬梳比較各種昆蟲／蟲群意象的詮釋角度，也無意羅列特定昆蟲所可能衍生出的各種譬喻方式，僅聚焦於在控制社會脈絡中，「蟲窩做為同質團體」與「蟲群做為衝撞動能」兩種想像之間的張力對反抗行動策略的啟發。
- 7 各版本發行資料可見維基百科*Psycho-pass*條目。本系列並於2019年持續推出三部全新劇場版，相關資訊可見〈Psycho-pass《心靈判官》3部劇場版2019年接連公開〉報導。

測被定位；而監視器對市民進行所謂聲像掃描後所得的心靈指數，基本用途之一是決定市民可否自由出入各場所的資訊碼，亦即動畫片名之由來。⁸ 綜言之，《心靈判官》描繪了一個由生物資訊科技組構而成的控制社會。⁹ 兩季動畫情節皆環繞由所謂犯罪團體針對希貝兒所發起的反抗行動，且反抗團體所採取的策略與手法都展現出昆蟲式反抗的特色。本論文將從前述昆蟲／蟲群政治的曖昧性出發，探討如何在昆蟲模式的曖昧性中找到驅動流變為蟲群的張力，進而檢視《心靈判官》中各種反抗策略的作用機制，以辨識昆蟲式反抗動力迸發之處；本文主張，除了前述夏維若所提及的蟲群動能之外，「無臉」昆蟲帶給「臉」此一概念的衝擊，以及擬態所觸發的不可察覺（becoming-imperceptible）邏輯，也提供了《心靈判官》中昆蟲式反抗的行動原則與策略。¹⁰

二、昆蟲典範與蟲群智慧

以昆蟲為方法的理論思考或相關研究，可追溯到十九世紀時的昆蟲

-
- 8 國內討論《心靈判官》的文獻有黃璽宇的〈以多瑪斯論《心靈判官》中人之自由與該追求的幸福〉與廖勇超的〈裸命、暴力、怪物性：談《心靈判官》中的生命政治與倫理〉。進一步的文獻探討見後文，此處想先指出的是，黃璽宇與廖勇超對劇中先知系統的翻譯不同，前者譯為希貝兒，後者則譯為希伯爾（黃璽宇 48；廖勇超 101）。有鑒於 Sibil 源出希臘神話中的女先知或女預言家，本文採取與黃璽宇相同的譯法。
- 9 必須說明的是，《心靈判官》製作群顯然有意援引全景敞視監獄與規訓模式的概念，第一季藉本季犯罪集團首腦槓島聖護之口宣稱，希貝兒主宰的社會如同一座全景敞視監獄。第二季心理醫生雜賀讓二審訊犯罪集團成員升奇醫生時也提到，經濟部為了與希貝兒爭奪控制社會的權力，曾想推出另一套名為 Panopticon 的資訊系統，其運作方式是透過系統觀察記錄市民的經濟活動等日常行為；但雜賀醫生和升奇醫生都同意，Panopticon 系統跟希貝兒本質上沒甚麼兩樣。由此看來，《心靈判官》製作群似乎認為希貝兒主宰的社會應該是規訓社會的例證；但希貝兒所賴以運作的生物資訊科技，以及運用心靈指數的各種方式，在在顯示由其主導的社會基本上可以說是一個規訓模式與控制模式相互結合的社會。相關討論詳見後文。
- 10 此處所援引的臉性概念出自《千高台》（*A Thousand Plateaus*）第七章（167-91）；不可辨識概念則出自第十章（279-82）。相關討論詳見後文。

狂熱，以及後現代／後人類學者從昆蟲研究或受昆蟲啟發的研究中看到的理論潛力。佩瑞卡在《昆蟲媒介》(*Insect Media*)一書中指出，昆蟲學之父克爾比(William Kirby)與史賓斯(William Spence)主張，雖然多數人把昆蟲視為有害又噁心的生物，但昆蟲擬態事實上展現了完美的力量與技術，例如把樹葉加工成擬態翅膀，換句話說，克爾比和史賓斯認為昆蟲可以說是自然界中的工程師(3)。此外，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向海外開疆拓土的渴望讓社會樂於開拓不同的視野，昆蟲的複眼被當成一種有助於探索新世界的另類視野，對於這類探索的想像往往與當時的新興科技與新興學門相結合。¹¹ 科學家們經常將昆蟲的非人視野／感知視為昆蟲運用技術的結果，把昆蟲的生理構造類比為或甚至視為科技產物。¹² 後現代／後人類論者則進一步開發昆蟲生理特徵的理論潛力，著眼於昆蟲體節的反覆構造；¹³ 重複增生的體節可以相互融合也可以變化形態，促成昆蟲快速頻繁的自體變異，且能與多種異質元素相互連結，部分昆蟲因此得以進行多種擬態(Shaviro 48；Braidotti, *Metamorphosis* 149)。¹⁴ 連續變異體以及跨種連結的現象，都不是強調穩固個體以及固定品種想像的傳統生物學能夠處理的，而需從雜多(multiplicities)、多重特異性(multiple singularities)與群(swarms)的角度來考量才能彰顯出其意義(Braidotti, *Metamorphosis* 149)。

11 例如1898年某位不知名作者提出透過蒼蠅的複眼攝影的點子；佩瑞卡並援引萊瑟科(Jean-Lacques Lecercle)的主張，指出《愛麗絲夢遊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中對探索列述奇異非人世界的描寫，展現了當代帝國主義對新世界進行分類學建檔的狂熱，而這種狂熱與維多利亞時期對昆蟲學的狂熱高度相關，因為他們認為昆蟲的非人視野與非人感知有助於看見並探索新世界(*Insect Media* 7-8)。

12 科學家們最稱道的「昆蟲技能」包括製造各種聲響以及快速震動的技術、不受地心引力限制在各種水平垂直面上任意爬行的能力、高速運轉的生命節奏(例如24小時內完成生命週期)以及與同類或異類都能連結的能力(Braidotti, *Metamorphoses* 153)。

13 佩瑞卡指出，十九世紀的人們雖然對昆蟲感知模式感到興趣，但當時的生物學還是尊崇脊椎動物的身體圖式(*Insect Media* xvii)。

14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即是以希臘文中的分節／分段(en-toma, segmentation/fragmentation)為昆蟲命名(Brown 29；Campana 67)。

昆蟲的生理構造既挑戰生物學預設又同時被視為科技產物，論者咸認跨越了有機／無機、生物／科技、生命／非生命以及人類／機器之間的界線。當代科幻小說與電影中出現大量混雜有機／無機組織體的昆蟲想像，而除前述媒體科技研究借鏡昆蟲感知模式之外，後現代社會中生物與資訊科技領域也常從昆蟲模式汲取靈感（Braidotti, *Metamorphoses* 152；Bukatman 133；Parrika, *Insect Media* 11；Wilcox 27）。布瑞多提與夏維若都引述海拉崙，強調後現代生物學／分子生物學轉向某種昆蟲典範，研究者不再執著於古典生物學中「生命」與「機械」的對比，任何物體或身體組成都不再被視為神聖不可改變的整體，取而代之的是以昆蟲體節的序列反覆（serial repetition）為思考起點，探索當身體被拆解為可一再重新組構的部位時，看似異質的部位之間藉由何種共通基準（例如資訊碼）來進行連結與創新；換言之，後現代生物學著眼於雜多與特殊性，不再訴諸於單一認同以及統攝一切的結構（Braidotti, *Metamorphoses* 152；Shaviro 48-51）。¹⁵ 資訊科技方面，計算機科學日益倚重所謂蟲群智慧系統（swarm intelligence）。柴克爾檢視蟻群蜂群做為複雜網絡的概念與蟲群智慧之間的連結，主張蜂群蟻群等社會性昆蟲的集結方式並非高度階級化、基因決定、個體須無條件為群體利益犧牲的封閉僵化治理系統，其結構生成於蟲群內部各種局部資訊的持續交換以及隨之而生的互動，任何細微的變化都會影響到蟲群的動態。換言之，柴克爾認為蟻群與蜂群看似以蟻后與蜂后為中心而行動，但毋寧都應被視為在各種去中心的局部變化中生成的複雜網絡。蟲群智慧系統的發想即是取鏡蟲群優化在網絡中傳遞訊息效率的行動能力，發展出以去中心網絡解決複雜問題的演算法（Thacker, “Swarming” 163-64；Hardt and Negri, *Multitude* 91-92）。¹⁶

15 具體的例子如布瑞多提援引凱勒（Fox Keller）指出，分子生物學著眼於果蠅分子結構與生殖週期的變動速度，以之進行大量實驗（*Metamorphoses* 152）。

16 其他從昆蟲汲取靈感的思考方向如借鏡果蠅等昆蟲在極快速的生命週期內處理無數生物資訊、希冀在短時間內處理大量數位資訊的相關研究，以及馮歐丹堡（Helene von

三、昆蟲／蟲群政治的曖昧性

綜前所述，昆蟲典範與蟲群智慧分別展演了去個體化與去中心化的自體變異過程，論者也多肯定其解放多重特異性以鬆動僵固結構／界線、進而創造新溝通模式與新連結的潛力。昆蟲／蟲群模式的效應也反映在對社會政治的想像與實踐上，佩瑞卡便指出，相對於政治學說過去對昆蟲意象的蔑視或無視，二十世紀初討論昆蟲政治的熱潮則是方興未艾(“Politics of Swarm” 112)。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說昆蟲典範似乎應許了解放的可能性，昆蟲／蟲群政治則展現出某種曖昧性。如前所述，夏維若雖然將社會性昆蟲的組織方式視為控制社會的權力運作模型，卻同時主張非社會性昆蟲鬆散的集結方式是後現代社會性得以逸出國家控制的動能所在。他認為群體流變為昆蟲群時，其輪廓與組成不斷變動，隨機散佈於廣袤的地域；所謂「個體」在集結成群的過程中都因遭逢彼此而經歷一連串變化，如同德勒茲與瓜達希(Felix Guattari)所說，牠們之間的距離變化構成彼此之間的關係，進行的是布朗寧式運動，也就是連續時間中的隨機運動，因此並不能切割成獨立的個體或是密合成一同質性的高階整體(Shaviro 52; Deleuze and Guattari 33)。¹⁷ 柴克爾也提出「蟲群中的生命」(life in the swarm)與「蟲群的生命」(life of the swarm)的區別來凸顯蟲群的不可切分，亦即蟲群不應被視為個別蟲體的總和；「蟲群中的生命」指的是被視為器官組織活體的個別昆蟲，例如一

Oldenberg)取徑與蜘蛛相關的科學來探討資訊社會演化情形的主張(qtd. in Braidotti, *Metamorphoses* 152)。補充說明的是，蜘蛛與昆蟲在生物學分類上都屬於節肢動物門，但前者被歸為蛛形綱，後者則是昆蟲綱，因此在一般認知中蜘蛛不是昆蟲。但法瑞特(Colin Favret)等人注意到，以寫《昆蟲記》聞名的法布爾(Jean-Henri Casimir Fabre)便不贊同這種區分，顯見生物學門對蜘蛛是否為昆蟲的看法還是頗有歧異；例如萊佛士(Hugh Raffles)在《昆蟲誌》中討論高空昆蟲學時，便舉了蜘蛛藉信風環遊世界的例子，並不刻意區分蜘蛛與昆蟲，與馮歐丹堡的看法類似(Favret 46; 萊佛士 88; 14-16)。

17 坎帕納亦援引博卡斯(Samuel Purchas)的說法，直指單一隻蜜蜂不是蜜蜂(one bee is no bee)(67)。

隻螞蟻一隻蝗蟲；「蟲群的生命」則是指蟲群本身形成的生命形式，成群繁衍，成群擴散(167-68)。夏維若認為「成群」同時動搖個體概念以及以隸屬同質性團體為依歸的身分定義，是在控制社會裡鑽尋自由可能之道；而另類昆蟲政治的行動形式則可能是讓群體輪廓持續產生變異，或如蝗蟲群般發動大規模游牧式衝撞(52)。

以蟲群行動為本的反抗行動想像之一，是由蟲群集結與蟲群智慧等概念延伸變化而來的「分散的異議網絡」(distributed dissent)、諸眾運動(multitudes)、網戰(netwars)或所謂智慧聚眾(smarmobs)，亦即眾多小群體以手機或無線科技進行協調的抗爭方式，1999年西雅圖WTO會議期間的街頭抗議行動即為知名例證(Thacker, “Swarming” 165-66; Hardt and Negri, *Multitude* 91-92; Wiedemann 309)。哈特與內格里描述這種反抗行動的運作方式是在「對付敵人時如蟲群般一擁而上：在某個時間點上，無數各自獨立的力量彷彿自四面八方湧現，然後又消散退回環境之中」(*Multitude* 92)。柏格爾德與路易斯(Tyson E. Lewis)等論者指出，控制社會或許是個監控科技全面入侵生活層面的噩夢，但這些科技也可能被劫奪為反抗控制的工具；藉助溝通網路運作的分散異議網絡可說暫時或局部劫奪轉化了控制社會中遍布的網路，由此製造了失控的空隙與瞬間(“Surveillance Assemblages” 110; Lewis 226)。哈特與內格里進一步主張，由此來看，全球監控系統可說催生了超越各種既定分類的新共群(a new common)或說全球諸眾，形成各種特異性不斷生成與相互溝通的開放性網絡，如同黃蜂與蘭花的異質連結(*Multitude* 128-29; *Commonwealth* 186-88)。然而持悲觀論調者則強調，國家或權力機制也能夠反過來挪用異議網絡的蟲群運作模式。阿其拉(John Arquilla)與朗費爾德(David Ronfeldt)便指出，以分佈各處、相互連結且即時溝通的小單位重整美國軍事組織，將有助於發展更全面更有效率的新型攻擊策略，亦即他們所謂戰鬥蟲群(Battleswarm)的軍事行動(Arquilla and Ronfeldt 4; Thacker, “Swarming” 166-67; Wilcox 26)。科林格南(Fabienne Collignon)也以一九七零年代設置在北達科他州名為

防護罩(Safeguard)的反導彈裝置以及延用防護罩運作邏輯的連線無人機(drones)為例，檢視同類型軍事裝置的蟲眼美學(the aesthetics of the “fly eye”)，如何讓美國操控他國政治的軍事行動產生更大的效用(235, 247-48)。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畫署(DARPA)亦仍持續研發所謂昆蟲賽伯格(insect-cyborgs)，以利建立更嚴密的軍事監控網(Wilcox 26-27)。佩瑞卡更援引蓋洛威(Alex Galloway)與柴克爾等人的網路理論，強調蟲群網絡這類結合生物與資訊科技的仿生／活性網絡，在成為滋養諸眾內在差異性的溫床之前，就會催生各種生物監控手段(“Politics of Swarms” 112)。綜言之，蟲群意象可說同時支撐著烏托邦與反烏托邦的想像，「蟲群政治」(politics of swarms)似乎無可避免地有著某種內在矛盾，端看論者以何種角度著眼(Wilcox 41; Parrika, *Insect Media* xiii; Parrika, “Politics of Swarms” 122)。

四、昆蟲式反抗的行動策略

面對蟲群政治的曖昧性，我們能做的或許不是捨棄已深入生活肌理的蟲群網絡，而是在警惕其反烏托邦傾向之餘，力求將蟲群在時間中「擴散、繁衍、佔領、感染與成眾」的活性，轉化為控制社會中的昆蟲式反抗(Thacker, “Swarming” 172; Deleuze and Guattari 239)。我們該思考的是，怎樣的行動策略可能激發或強化蟲群政治反抗控制權力的面向？紐曼(Saul Newman)對2003年反全球化運動的分析或可做為思考的起點。他觀察到當時的參與者來自各種異質性族群，原本抱持的意識型態可能南轅北轍，但因應情勢轉變隨機組成各種新的聚合；換言之，參與者並不是因為某種既有的共同點凝聚而成的同質性團體，而是以所謂純粹匿名狀態暫時聚合。這種聚合與哈特與內格里提出的諸眾相類似，但紐曼著眼於匿名暫時聚合展現的去辨識(disidentification)特質，剖析既然控制社會以程式碼調控來辨識並監控公民，所以或許最激進的體制衝撞姿態正在於保持匿名、拒絕被系統辨識，在不以既有身分定位為基礎的聚合中摸索鬆動控制權力網絡的溝通可能與社群形式(119)。紐

曼認為這種匿名暫時聚合即是阿岡本(Giorgio Agamben)提出的「將至社群」(the coming community)，無視各種既有身分認同、單憑某種對民主的模糊訴求而集結後又視情況一哄而散，而將至社群亦是夏維若心目中蟲群反抗行動的展現方式(Newman, "Politics" 119; Agamben 86; Shaviro 52)。¹⁸ 綜言之，去辨識是蟲群反抗行動得以開展的關鍵，也是其與昆蟲調控模式的分殊點。柏格爾德亦指出，控制社會中國家／公司以安全為名，藉由能夠辨識／確認身分的科技監控公民／消費者，因此反抗之道在於拒絕被權力單位資訊庫化，而常見的反抗手法即包括身分盜用及以代理伺服器確保匿名等擾亂辨識的策略。權力單位自然也可能採用看似雷同的手段，但運用的方向是阻止資訊到處流竄，以確保獨佔資訊控制權；反抗者的運用方向則是創造免於被辨識定位的空間，進一步讓逃逸路線失控蔓生("Surveillance Assemblages" 100-01)。換言之，柏格爾德同樣肯定去辨識之於在控制社會中展開反抗、劫奪控制網絡以鑽尋新時空的重要性。

須進一步指出的是，去辨識不僅意味著與既有的身分認同與社會角色脫鉤，如紐曼在反全球化運動中所觀察到的匿名聚合，更意味著從控制網絡中的個人資料檔案脫鉤，如柏格爾德提及的國家／公司資料庫，或是如索倫森(Bent Meier Sorensen)所觀察在控制權力系統中決定我們

18 審查人指出，哈特與內格里等論者倡議「諸眾」以補傳統階級概念之不足，但卻落入極端人文本質論的窠臼，無法涵蓋人外特異性，因此其政治效力似乎有待商榷。審查人的疑問呼應了路易斯的看法，後者認為哈特與內格里以「人文／本後人類主義」(humanist posthumanism)取代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的企圖未竟全功(227-28)。但路易斯也提及，出於哈特與內格里以「未成形且不受控的怪物血肉」對抗帝國的訴求，「諸眾」理當蘊含非人怪物性，問題只在於兩人的談法不夠怪物，因此我們或可試著提出讓「諸眾」的怪物潛力得以發揮的論述修正之(Hardt and Negri, *Multitude* 194-96; Lewis 223-24)。路易斯認為可能的作法之一是借鏡德勒茲與瓜達希的「橫截式溝通」(transversal communications)，讓所謂自然與文明形成各種複雜聯結，「以利所謂有機與無機的溝通系統相互內捲、汙染與挪用」；具體而言是要將動物等非人溝通系統納入考量，以迫近「諸眾」的怪物性門檻(*Thousand Plateaus* 11; Lewis 229-30)。本文以昆蟲邏輯鬆動臉性機制的嘗試即為一例，詳見下文。

是否可被認證為「社會人」的數位資料檔(74)。控制社會中種種控制、紀錄與辨識等監控管理的動作所產生的資料，除匯聚於複數資料庫中之外，並構成關於個人生活各種層次面相的資料檔案。其中，臉部不僅是最容易取得的生物辨識資訊，也被視為個人檔案中最關鍵的資料，進而被優化為身體與數據之間的連結，透過臉部辨識可進而取得其他檔案資料：「……不管移動到哪裡，每個人的前額上似乎都標示著姓名、地址、生日以及其他敏感個資」(Edkins 99-102)。德金(Jenny Edkins)及蓋茨(Kelly Gates)以2011年倫敦暴動後，英國警方「敬告」暴民「我們有你長相的資料」(“We have your face”)，並公布CCTV等監視器拍到的畫面為例，指出臉如何被生產為權力裝置的一環，或說一種具備選擇功能的電路，篩選願意配合權力體系自我治理的公民進入合法社群，同時拒絕不合格者通過(Edkins 96-99; Gates 47)。索倫森因此指出，把身體去臉化(to deface your body)或許是一種鬆動控制的有效策略(72)。值得注意的是，柴克爾在檢視蟲群意象如何影響政治學上定義的敵我關係時，也提及蟲群揭示的去臉化現象(defacement)問題化了諸多政治倫理學的預設，可串連從王權相對於雜多乃至控制相對於生發的相關探討(Thacker, “Swarming” 180-81)。為細究去臉化在控制社會中所能發揮的反抗潛力，我們需要簡單回顧昆蟲／蟲群意象為何能夠連結到去臉化作用；必須先釐清的是，在西方政治學與倫理學的脈絡中，「臉」經常是權力與生命之間各種關係得以顯現之處，本文無法也無意窮究所有的討論，僅聚焦於「臉」在本文所關心的昆蟲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以「有沒有臉」、「給不給臉」以及「要不要臉」這三個問題或說三種彼此交疊的層次，來分析昆蟲與「臉」的關係，進而發掘去臉化做為一種昆蟲式反抗，在控制社會中如何引發以及引發怎樣的反抗動能，並可能實踐為怎樣的行動策略。首先，對西方傳統政治學論者來說，蟲群意象構成了「有沒有臉」的問題。事實上，夏維若以飛蟲漫漶成群之鬆散集結抵抗控制權力的主張，翻轉的正是政治學關於昆蟲／蟲群無能形成適切政治組織的一貫論調；不論是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將昆蟲置於政治動物之對立面的論證，或是霍

布斯(Thomas Hobbes)關於昆蟲無能形成王權的主張等，都強調鬆散蟲群與政體秩序互成對比，前者是政治組織的負面教材，甚而對後者構成威脅(Galloway and Thacker 67; Parikka, "Politics of Swarms" 113)。坎帕納(Joseph Campana)呼應其他論者的觀察，指出昆蟲／蟲群對掌權者來說是一種必須馴服的威脅，憂懼前者體節的可切分性與成群時的漫漶無邊會侵蝕其獨特性，並將所謂烏合之眾貶抑為非人蟲群；而既然十七世紀時即有論者主張「臉」的有無對應理性溝通能力的有無，進而將「有臉」視為「人」之異於蟲魚鳥獸之處，近代更出現「有臉」是成為合乎律法定義公民之必要條件的聲音，非人蟲群／烏合之眾自可說是無臉之群(60, 73-74)。¹⁹

與律法、人以及公民概念的連結，在在強調「臉」的個體性，坎帕納因此指出，考究蟲群有沒有臉以及是否可被納入律法等問題，勢必會將臉的定義逼至極限(74)。事實上，即使探究不成群的昆蟲究竟有臉與否，都構成令「人」困擾的問題。例如昆蟲界唯一能夠轉動頭部調整凝視方向的螳螂，可說跟人類及大部分哺乳類一樣具備(或至少是看似具備)審視外界物體的能力；但庫茨(Nicky Coutts)指出，根據法布爾的說法，螳螂最多只能說是「幾乎有臉」(298)。他補充說明，螳螂的「頭臉」雖然似乎與人有相似之處，但其三角形頭部、間距極寬的巨大眼部以及口顎部，跟電影中常見的異形或外星人幾乎如出一轍。因此庫茨主張，誠如布斐爾(E. L. Bouvier)所說，螳螂越看似與人有相似之處，當這點相似處與其讓人感到陌生不安之處相混合之後，反而讓昆蟲更顯詭秘殊異(Coutts 299)，夏維若亦援引威爾斯(Christopher Wills)宣稱，昆蟲最令人厭憎卻又執迷之處在於它們沒有人類熟悉的表情，因此對人類來說可說是一種無法吸納之絕對他者般的異質性存在(Shaviro 47, 53; Braidotti, *Metamorphosis* 149)。關於如何面對這種異質性的進一步思考，

19 在坎帕納文中，在主權概念之對立面的無臉之群除蟲群外亦包括獸群(60)。但本文主張，昆蟲的體節特徵讓蟲群更具顛覆獨特個體性的潛力。

帶出了「給不給臉」的政治與倫理等議題。坎帕納觀察到，在早期現代世界中，掌權者以賦予面容或說「給臉」的方式來馴化蟲魚鳥獸，希冀藉此將被視為威脅的蟲群等納入可治理的範圍，試圖在此「過度人性化」(over-humanization)的過程中取消其異質性，「『給臉』相當於使成為『人』／公民」的等式由此建立(73-74)。「給臉」牽涉到如何給不同的動物臉等複雜細節，且未必真能產生含納蟲群等的效應；²⁰ 然而此一等式的反面，亦即「不給臉」意味剝奪「人」／公民的地位，使之成為可謀殺的非人對象，卻不乏應用於排除異己的例子。萊佛士即指出藉昆蟲意象「去人性化」的作用機制：「一方面必須讓某個被鎖定的族群與一種特定的非人類生物產生關聯，另一方面則是要讓那種生物具備某些適當的負面特色」；被選取為標的非人類生物經常是所謂有害蟲群，如猶太人像蟲子般被消滅或圖西族被視為螳螂屠殺的例子所示(174-75)。²¹ 萊佛士並提及，華沙猶太隔離區的猶太反抗組織指揮官艾德曼(Marek Edelman)在華沙起義失敗、猶太平民區遭到肅清之後，從藏身的下水道現身時，在亞利安人街區看到一張海報，其上「有一隻巨大蟲子正爬上一張充滿『猶太味』的畸形醜臉」；艾德曼的「反應驚慌失措，這也驗證了蟲子的形象符合他」，他心中甚且浮現了一個念頭：「真希望自己是個沒有臉的人」(183-84)。海報上與蟲子合而為一的猶太人形象，是將猶太人去人性化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不給臉」的結果；因此艾德曼不想要擁有的臉，其意義事實上不同於「人」／公民的臉，而是變成蟲子的非人面目，如同前述螳螂似人非人的異形頭臉。昆蟲／蟲群之異質性與猶太人「令人不安的異己性」疊合，被援引來為「不給臉」的剝奪／排除機制背書，

20 相關討論詳見下文。

21 布朗(Eric C. Brown)指出，昆蟲的攝食與消化器官佔了三分之一的體節，且有多種昆蟲不是靠人類的糧食維生就是靠人類維生，因此常被認為對人類有害(xii)。換言之，萊佛士此處的討論適用範圍事實上可擴及各種昆蟲／蟲群。荷林維爾斯(Christopher Hollingsworth)亦指出，貼上去人性化標籤是鼓動種族屠殺的重要戰略，而將人類比喻為昆蟲的作法是最常見也最有效的方法之一(262-63)。

除暗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外，亦隱含「非人(昆蟲／蟲群)不配像『人』／公民那樣活著」的意涵；於是當猶太人與昆蟲不再有區隔時，便可以任意撲殺(萊佛士 187)。

在「有沒有臉」與「給不給臉」這兩個層次中，權力基本上透過所謂「人」／公民的臉來進行政治部署或形成倫理判準；更精確地說，「給不給臉」的層次已帶出某種決定並分配「『人』／公民的臉」的機制。柴克爾在探討蟲群意象如何影響關乎敵我關係的政治決定以及自我與他者關係的倫理決定時，提及不管哪一種決定都涉及「面／對」的問題，而「面／對」預設了決定怎樣的線條孔洞可組合成一張可辨識的臉，以及遭遇或面臨他者後如何定位彼此關係的機制運作；簡言之，柴克爾在此也指出了「面／對」的政治倫理決定預設一套組構配置「臉」的機制，以德勒茲與瓜達希的語言來說即是臉性機器(faciality machine)(Thacker, “Swarming” 180; Deleuze and Guattari 181)。²² 柴克爾認為蟲群嗡嗡飛盤旋於這套機制的極限之處，沒有臉也無法被賦予臉，凸顯了每個「面／對」決定之下必然洶湧的去臉化(defacement)脈動(Thacker, “Swarming” 180-81)。坎帕納細究前述如何給臉以及給臉會產生那些效應等相關議題

22 德勒茲與瓜達希引用雷若谷翰(Andre Leroi-Gourhan)的說法，指出人類開始以雙腳直立後，不但得以騰出雙手與手臂來製造工具，原本捕捉獵物所需的長鼻型臉部也日趨平坦，唇舌喉嚨的結構也演化為適合說話的樣態，因此可以說臉與語言有某種內在關聯(Deleuze and Guattari 60-62; Bogue 81-82)。而既然語言的本質是將世界編碼而非以利溝通，語言與其發動的編碼系統必須被視為一種權力結構；在兩種統攝基督教以降的西方世界的權力關係中，臉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在符號系統的運作、主體的形以及權力關係的部署等過程中，都發揮關鍵的作用(Deleuze and Guattari 75, 178; Bogue 79)。承上所述，臉性機器或臉性的抽象機器(the abstract machine of faciality)指的是生產「臉」、將身體、事物與地景臉化的社會權力體制。特定權力體制在組構部署過程中啟動臉性抽象機器，進而安裝並組織表意系統及主體樣態。因此德勒茲與瓜達希宣稱臉即政治，並著意檢視臉性抽象機器與其所生產的臉的關係，以及臉的生產機制與其所支撐的權力體制之間的關係(Deleuze and Guattari 181)。但如同德勒茲與瓜達希的提醒，「臉並非普遍現象」，亦即臉在每種社會與權力體制中的角色與分量都不同，拆解臉性機器當可帶動政治組構的變革(Deleuze and Guattari 176, 216)。

時，則帶出了昆蟲／蟲群「要不要臉」的問題層次，進而開啟鬆動臉性機制的可能性。如前所述，對蟲魚鳥獸等不同動物而言，給臉牽涉到的各層面問題不盡相同；其中，賦予昆蟲／蟲群面貌不僅會導致臉的定義被逼至極限，更可能凸顯出一個可怕的事實：昆蟲／蟲群既能在過境時展現出無視於人類社會與政體的食慾，對於人類社會所試圖賦予的「臉」以及相應的社群位置，也可能根本無動於衷(74-75)；換言之，昆蟲／蟲群可能根本不要「臉」。綜合柴克爾與坎帕納的說法，我們可以說昆蟲／蟲群不只是沒有臉或無法被賦予臉，牠們甚至不要臉：不要「人」／公民的臉，也不要作出「人」／公民的臉這類政治倫理決定的臉性機器組構臉的方式。將「要不要臉」的層次納入考量後，不要臉／去臉化彰顯的終極意義是拆解特定社會中「臉」被組構並分配的方式；如果昆蟲／蟲群被認為體現了另類政體的可能性，或許正因其揭示了某種去臉化反抗，擾亂了臉性機器的作用(Campana 66, 74-75)。²³ 置身於「臉」在每個通道關卡「反覆內爆繁殖」的控制社會，索倫森宣稱，放眼望去盡是護照、履歷等「社會人」資料中的檔案照，相應的反抗之道應該是針對其後的臉性機器發動攻擊；我們該做的不再是砍掉國王的頭，而是「以衝浪板打爛他的臉」，以各種換臉與去臉的實驗，截擊擾亂臉性機器，使其暴走或重構，藉此製造從數位檔案資料脫鉤的可能性，打開新政治新倫理萌生的空間(77, 80)。本文想補充的是，不同類型的社會中，所謂「人」或公民

23 黃宗慧在〈不可能悅納(寄生)昆蟲?：動物倫理的蟲蟲危機〉一文中從昆蟲在動物研究的邊陲位置出發，援引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等的面貌之說等倫理哲學思考，探究辨識昆蟲倫理面貌、將其納入倫理考量的可能途徑。本文則側重昆蟲／蟲群意象如何問題化「臉」以及相應的臉性機器與政治倫理決定及權力運作模式的連結，以探討在控制社會中鑽尋反抗路徑的可能性，因此除所援引的理論資源不同於黃宗慧之外，相對於黃宗慧辨識昆蟲面貌的嘗試，本文則試圖探討去臉化做為一種昆蟲式反抗的力量。誠如審查人所言，本文或許並未著意探討真實世界的昆蟲生命；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如本文論述發展的脈絡所示，蟲群意象介入政治倫理思考的效力，必然如李宜澤所說，來自真實昆蟲的感官、行動以及時空經驗所可能揭櫫的另類非人現實(474)。

的內涵定義不盡相同，決定待查驗者是否符合「人」或公民定義的機制之運作方式也會有相應的演變，與權力機制所作的政治倫理決定顛顛的行動策略自也不能一概而論；然而在數位檔案資料充斥的今日，一直以來都在各種層次問題化「臉」的定義的昆蟲／蟲群，或許更適合做為想像與實踐去臉化反抗的行動資源，雖然我們必須打爛的已不是國王的臉，毋寧該說是在政府／跨國公司複合體主導的社會佈局中不斷增生的臉。²⁴ 接下來本文將以《心靈判官》為例，探討劇中依去臉去辨識行動策略進行的昆蟲式反抗，以及流變為昆蟲所啟動的革命力量。

五、《心靈判官》中的生物資訊監控

如前所述，《心靈判官》設定了一個生物科技資訊組構的監控社會，劇中角色自認置身於全景敞視監獄式的環境，但希貝兒的運作模式頗多採用控制社會運作邏輯之處，例如持續連線、型態辨識、行動預測與流程規劃等，對社會居民感官知覺情緒的監管調控也與哈拉瑞等人所描述的生物監控雷同，人人在系統的調控之下各安其位以打造大同世界的理想更形同夏維若指出的昆蟲社會。劇中藉由複數人腦與超級電腦組成的平行演算系統建置了一個無所不資訊化的環境，透過無處不在的監視器對路過市民進行所謂的聲像掃描，以檢測其精神狀態是否良好，測量結果以心靈潔淨指數和色相來呈現，前者數值越低會被判定為越健康，色相則以各種顏色代表心靈潔淨與否。心靈指數既是決定你是否可以出入關卡的資訊碼，也是用來追蹤某人行蹤定出某人位置的工具，更是進一步檢測犯罪係數的指標，除做為實際執法的參考之外，更常被引為判定潛在犯及預測犯罪風險的基準。例如第一季開場，系列女主角公安局刑事課第一分隊監視官常守朱剛上任就接到追捕潛在犯的案件，當時還是

24 夏維若早已敏銳察覺，控制社會中的藉由各種晶片卡或密碼系統被追蹤紀錄的我們的個資、行蹤、消費習慣等資訊，起初由政府官僚配置掌控，後來被私有化成為跨國公司的所有物(51)。

第一分隊前輩監視官的宜野座伸元簡報案情時，便提及某位路人沒通過街頭色相掃描，預測具有強烈攻擊性與強迫觀念，建議須作處置，而希貝兒主宰的社會也設置了各種調控心靈指數的辦法與機構。此外，希貝兒也把心靈指數納入幫人們分配職種規劃職涯與婚配的參考指標之一，如第一季第十二集潛在犯療養設施每天早上的廣播內容所示：「職業適性考核能夠徹底發揮個人能力，保障個人生活安定，人類將活得更像個人，人人皆能享受藝術、自然與和平」。換言之，劇中社會標榜只要與希貝兒這個生物資訊回饋系統持續連線並接受系統的判斷，系統會根據持續收集並管理的心靈指數，辨識各人的特性與嗜好，隨時調控各人的身心狀況，並規劃最適合各人的人生藍圖。²⁵ 希貝兒本身做為一種生物資訊網絡，除了藉由部署於各處的網路系統進行前述科林格南或威爾克絲(Lauren Wilcox)所關注的蟲眼式監控之外，也高度仰賴類似戰鬥蟲群的裝置，亦即多隆(drones)與西瓜蟲。²⁶ 前者是勞動機器人的總稱，因應負責的任務類型而有不同外觀與性能，公安局大量使用多隆協助巡邏、辨識潛在犯、或維持事故現場秩序，各類型多隆也遍布於日常生活中各種公共場所。後者事實上是一種有四隻腳但外型類似蜘蛛或水黽的

25 希貝兒如此深入掌控人的知覺情緒以及生命歷程，自然是生命權力與控制權力結合的例證，廖勇超即以第一季為分析對象，著眼於主要「反派」槓島聖護如何以其怪物生命的獨特性衝撞生命權力的掌控(118)。本文除一併檢視第二季之外，另闢蹊徑討論控制權力的面向，尤其聚焦於第二季的鹿矛圍桐人如何以昆蟲模式製造新時空。黃璽宇則引用多瑪斯(St. Thomas Aquinas)的哲學觀點，批判希貝兒所定義的系統工具人缺乏自主價值而落得與動物無異，而希貝兒的組成既包括複數人腦，其所應許的幸福則缺乏形而上基礎(50, 57, 98)。本文同意劇中由監控系統決定的「幸福人生」內涵值得商榷，但認為當人機複合體隨生物資訊科技的發達成為生活現實時，我們或許需要發展超越訴諸人類完整體性的批判角度，方能更適切地回應新型態現實中萌生的問題；因此將聚焦於控制社會的討論脈絡，探討流變為昆蟲的反抗潛力。

26 劇中只有少數特殊場所沒有網路連線，例如第一季第三集發生三次死亡事件的多隆製造工廠自動檢測區，公安局前往調查時從廠長口中得知，由於多隆負責眾多社會任務，為了防止駭客入侵擾亂製程，工廠沒有安裝網路，甚至隔離電波。但即使在這樣的場所中工作，員工還是必須接受色相掃描確認心靈指數無虞。

迷你多隆，經常性用途是在事故現場協助公安局蒐集微量跡證，常守則在2015劇場版中，將西瓜蟲群當成前述DARPA所欲開發的昆蟲賽伯格使用，在導入希貝兒系統的外國蒐集當地軍閥情報，日本希貝兒母系統則以蒐集到的情報為由，派遣整個公安局團隊到外國消滅軍閥，暗中接管當地政府。綜言之，希貝兒運用了蟲群運作模式遂行擴張權力的目的。

六、去辨識、去臉化的行動策略

在希貝兒主導的社會中，所謂良好公民必須隨時與系統連線，同時維持色相潔淨，確保心靈指數低於規定數值。若系統調閱不到與某人相關的資料數據，或檢視資料數據時發現可疑之處，則某人立即會被列為可能需要處理甚至排除的嫌疑犯；而所謂的資料數據除了眾人皆高度重視的心靈指數之外，還包括各種日常生活與經濟活動的相關紀錄。²⁷ 換言之，數位檔案是決定某人是否可被視為社會的一份子、可否在社會各種有形無形的關卡之間通行自如的關鍵。須指出的是，雖然心靈指數是精神構造與心理活動等數值化的結果，但要取得計算指數所需的數據時則需要以聲像掃描的技術掃描頭臉部位。第一季第三集第一分隊奉派調查多隆工廠品保人員連續死亡事件，執行官征陸智也向還是新人監視官的常守解釋交付希貝兒判讀心靈指數之重要性時搭配的腦部透視畫面，似乎暗示腦部活動決定了精神構造的狀況；但第二季第五集時又提及，臟器移植形同移植心靈指數，亦即表示心靈指數應該涵括了其他生物辨識資料。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季第十五集中，槇島與其手下散發一

27 例如第一季第四集第五集中，管理公司進行安檢時，發現一位葉山公彥家中的馬桶已故障兩個月卻未報修，因而報警處理。公安局介入調查後發現葉山也已兩個月沒有銀行提款紀錄以及外出紀錄（外出紀錄乃由特定時期內被街頭色相掃描器辨識出的狀況判定），但其虛擬分身塔利斯曼仍在網路上大肆活躍，因而判定塔利斯曼非常可疑。討論葉山案情時，公安局監視官與執行官紛紛表示，在這個社會被殺掉比失蹤簡單得多，正是因為與系統保持連線以紀錄各種數位蹤跡，是做為希貝兒主導的社會一份子的必要條件。

種密閉式頭盔，戴上後可阻止希貝兒讀取心靈指數，並能拷貝附近未超標的心靈指數後偽裝為配戴者的指數，擾亂希貝兒的運作，因而在多處引發暴動。如果頭盔的作用是阻擋掃描器探測腦部活動狀況，則採用類似半罩式安全帽的設計即可，密閉式頭盔的設計顯然是為了遮住臉部。由此可見，受掃描者的臉部暴露在外，是掃描成功的必要條件；而從前述第二季第五集雜賀醫生審訊升奇醫生時搭配的畫面可看出，鹿矛圍為首的反抗集團利用臟器移植擾亂心靈指數偵測時，還是需要為受移植者準備變臉用的臉部移植面膜，才能因應聲像掃描的運作原理成功欺瞞系統。換言之，臉部在劇中可說扮演著某種身體與數據之間的連結，以聲像掃描的必要條件及公安局辦案時調閱的檔案照等形式，整合數位檔案，做為權力介入生命的起點。在兩季出場人物中，被朋友戲稱為「心靈美女」的常守，不管面對怎樣的衝擊，色相都能保持在系統定義的潔淨狀態，因而看似最符合希貝兒主導之社會中的理想公民形象；然而常守雖認同相對於分崩離析民不聊生的世界，希貝兒的存在確實可讓一般人過著比較像樣的生活，不用擔心隨時可能橫死街頭，對希貝兒的判斷產生疑問時卻也無懼於挑戰其存在基礎與運作方式。²⁸ 希貝兒無法百分百預測並掌控常守的想法與行動，因此常守可說是希貝兒無法吸納的異端，而非理想公民。第二季加入第一分隊的新人監視官霜月美佳，時刻擔憂自己的色相變混濁，因而「無條件接納一切社會認可事物」(第二季第九集)，因為「最喜歡這個社會」而甘願成為希貝兒的「新奴隸」(第二季第十一集)，是希貝兒認可的最佳公民形象。

如同霜月全盤接受社會的安排，雖然每天受到嚴密監控，大部分市民都頗認同甚至感激希貝兒。但因為被希貝兒判定為不適合擔任社會菁英職務而懷恨在心的市民也不在少數，自認被系統過度保護或是消除壓力的藥物不適用而逐漸喪失生命力的市民也對希貝兒心存疑慮，這些

28 從第一季第十九集所提到的外國難民以及2015劇場版輸入希貝兒先知系統的外國國情可以看出，《心靈判官》系列預設了一個混亂崩毀的世界，日本在建立希貝兒系統後才開始恢復為一般人不至於隨時橫死的社會。

不滿的情緒在兩季動畫中都催生了對希貝兒的反抗行動。²⁹ 如前所述，一二季發起反抗行動的分別是槇島與鹿矛圍，而他們之所以可以展開行動，是因為他們在控制社會中找到各種逃避或擾亂希貝兒系統追蹤控制的空隙；否則由於他們從事的是反社會行為，在籌畫的過程中，心靈指數就會升高而被系統偵測出來並進行處理。槇島從一開始就籌畫了許多藉由所謂顯像，也就是模擬影像進行的犯罪事件，這些模擬影像能夠發揮欺敵效果，擾亂主宰者的監測功能；另一種干擾手法則是讓市民戴上前述的特製頭盔，這樣即使佩戴頭盔者正在進行犯罪行為，主宰者也無法依據偵測到的心靈指數來制裁他們。而始終藏身幕後的槇島終於現身時，公安局更發現他是所謂免罪體質者，希貝兒無法計算具備這類體質者的心靈指數，因此即使他在常守面前動手殺人，一般在殺人時的心靈指數勢必會超過犯罪指數的臨界值，主宰者即可介入進行制裁，但卻無法制裁槇島；常守後來更驚異地發現，組成希貝兒系統的人腦全都來自免罪者。第二季的鹿矛圍則是希貝兒無法辨識定位的所謂透明人。公安局其他同事都認為不可能有這種事，但常守獨排眾議執意調查後發現，鹿矛圍還是小學生時是一起飛機失事的唯一倖存者。他與同學因為參加戶外教學搭上這班飛機，飛機因政治鬥爭導致交通管制出問題而墜機後，傷重的他被送到東金財團控制的醫院動手術；院長東金美沙子，後來加入希貝兒系統的免罪者之一，趁機實驗財團開發的複數腦部移植手術，把飛機上其餘 184 名死者留下的器官與局部腦部拼湊移植到鹿矛圍身上。鹿矛圍康復後漸漸發現，希貝兒再也無法測量自己的心靈指數，無法辨識出自己，因為他已不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群集。³⁰ 執行

29 廖勇超即由希貝兒的治理手法導致生命力或說生命獨特性喪失的角度切入，探討《心靈判官》第一季中的生命政治與倫理(111, 118)。

30 當年為鹿矛圍動手術的升高醫生在接受雜賀醫生盤問時指出：「他原本就不是一個人，使用 184 具遺體完成的結合手術，然後移植到某位少年的身體上；包含 7 個人的大腦、184 個人的肉體與人格的存在，就是他這個人的組成……[他]成為一個完全無法被偵測心靈指數的存在……隨著移植部位越來越融入他的身體，他被掃描器偵測到的次數就越來越少」(《心靈判官》第二季第七集)。

顛覆希貝兒計畫的過程中，鹿矛圍也運用了顯像技術以偽扮他人，而他所使用的顯像都是模擬罹難同學長大後的模樣製作而成，不在希貝兒的市民資料庫之內。另外他還利用其他技術來擾亂系統的辨識功能，例如移植並複製酒井監視官的視網膜到自己和另外七個同夥的眼珠上，讓系統將他們誤認為監視官，得以通過系統檢測得到使用主宰者的權限。³¹為了報復在系統動手腳害飛機失事的經濟部官員們，鹿矛圍找了一些同謀取代其中幾位官員，而取代的方式就是將官員的臟器移植到同謀體內，混淆系統的辨識功能。常守帶領第一分隊跟第三分隊一起破獲鹿矛圍在港口邊的藏身之處時，也看到倉庫裡收藏著可替換的臉部移植面膜、臟器與手腳義肢。

綜上所述，《心靈判官》第一二季的反抗集團都採用了去辨識去臉化的行動策略，在希貝兒主宰的控制社會中鑽尋縫隙，而他們的多數攻擊計畫都帶有蟲群運動的特性。第一季第十五集中，前述的特殊頭盔配戴者四處流竄為非作歹，一般民眾之後也開始反擊自保，因而引發幾百起暴動事件，讓公安局疲於奔命，此即運用無臉蟲群運動模式之一例；第一季第四集中，槓島的同謀崔九聖也循類似的模式，在發現六本木網聚是公安局設下的陷阱，第一分隊也已派人來到現場預備逮捕盜用葉山虛擬分身塔利斯曼的可疑人物時，駭入系統把現場所有人的顯像裝扮都改成塔利斯曼的樣子；當群眾如蟲群般驚慌亂竄時，警察根本無法分辨誰是誰，嫌疑犯因而成功逃逸。第二季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則是第五六集中，鹿矛圍集團駭入名為「空腹雞」的線上遊戲，玩家自認為在遊戲介面操縱角色進行射擊任務時所進行的每個動作，實際上都是在遙控多隆攻擊公安局人員及一般市民；分散各處的玩家不自知地遙控著為數眾多的多隆四處追擊路人，如同一擁而上後又哄散的蟲群，讓執勤中的霜月忍不住抱怨這樣下去簡直沒完沒了。一如前述昆蟲政治的曖昧性，希貝兒運用蟲群模式強化控制權力，反抗者則試圖劫奪權力網絡，進而從中

31 主宰者是公安局監視官與執行官配備的武器，與希貝兒連線時可讀取瞄準對象的心靈指數，並視心靈指數超標情形決定鎮壓模式。

逃脫。但《心靈判官》中的反抗集團除了藉由顯像系統、特殊頭盔等裝置以及駭入系統的手段進行去辨識行動，讓行動者暫時從希貝兒分派的社會角色與個人資料檔案脫鉤，以進一步爭取反抗權力的籌碼與能動性之外，更充分探索了去臉化反抗撼動臉性機器的可能性，也正是對去臉化的詮釋差異讓槓島與鹿矛圍走上全然不同的道路。

如前所述，槓島是所謂免罪者，希貝兒無法計算其心靈指數，「免罪」特殊頭盔的靈感顯然得自槓島的特殊體質；構成希貝兒的複數人腦全數來自其他免罪者，因此希貝兒試圖暗中拉攏槓島加入其行列，槓島不僅拒絕，更試圖藉由破壞日本糧食自給系統，動搖希貝兒統治的根基。槓島對希貝兒的質疑在於其剝奪了人的自主思考能力與生命獨特性，憑藉免罪體質希望迫使常守等人放棄依賴做為希貝兒眼睛的主宰者，自行決定如何面對他的作為。綜上所述，槓島的訴求是徹底摧毀希貝兒與其控制的社會，巴哈姆特版上不乏盛讚其企圖宏大的聲音（漆黑的狼煙），但常守的指控點出了槓島式去臉行動的可能問題。槓島與常守初遇時，挾持常守的好友船原雪，逼迫常守在無法依賴希貝兒的情況下，自行決定是否要制裁自己，並在她遲遲無法動手之際殺了船原，並聲稱船原的人生原本就沒有價值，因為她處於「如家畜般的昏睡中」，從來不問自己的意志是甚麼，理想生活型態是「既好玩又輕鬆，根本不用吃甚麼苦，全部交給別人決定就好了，到底甚麼才是重要的，我根本想都沒想過」；常守因此對槓島大吼：「怎麼會沒有〔價值〕？難道是由你來決定價值嗎？毀了別人的家庭、別人的朋友，毀了你所不知道的幸福！」（《心靈判官》第一季第十四集；第二十集）。換言之，常守看出槓島式去臉化指向的，是以自己認定的有資格與否做為決定新選民的準則；其作法是以某種暴君的臉來代替希貝兒形成支配秩序，處於其對立面的則是如船原這般可被任意斥逐甚至殺害的無臉羔羊（Deleuze and Guattari 116）。³² 槓島確然凸顯了希貝兒為確保社會安全以斷傷生命力

32 對德勒茲與瓜達希來說，暴君的臉所支撐的是所謂表意專制體制（signifying despotic regime），專制君王成為符號系統的起源與歸結，朝臣、教士與地方官員被配置於漸次

為代價的問題，但除了常守的觀察之外，或許希貝兒希望延攬他進入系統而非試圖排除他（如同試圖排除鹿矛圍那樣）這點更可讓我們察覺，槇島想望的社會本質上與希貝兒主宰的社會有共通之處，都建立在斥逐不合格者的基礎上，只是對不合格者的定義在所謂生命力強弱的光譜上正好互為對反；若沒有被狡獪慎也射殺，槇島或許可以破壞希貝兒的安全體系，但卻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希貝兒。³³

七、昆蟲擬態與蟲群動能

相較於如天神般君臨天下的槇島，鹿矛圍的形象似乎軟弱許多，其策劃反抗行動的動機，似乎也只是希望為自己在體制內創造一個容身之處；然而在常守的協助下，鹿矛圍卻成功地迫使希貝兒做出改變，進而鬆動其控制權力的基礎。³⁴ 本文認為，鹿矛圍的行動在希貝兒的臉性機器中引進了某種流變為昆蟲的活性，展開如同德勒茲與瓜達希所說的探針針頭（probe head）實驗，亦即拆解臉被權力結構化的空間組構，讓身體與生命的多樣性得以生發，打開通往新政治的門（Deleuze and Guattari 190-91）。如前所述，鹿矛圍因為複數臟器移植而成為一個群集，亦即一種相當於蟲群般的存在，對以身分辨識為運作基礎的希貝兒來說是一

擴展的權力圈中，雖位置不同但都以詮釋君王臉上所顯示的符碼為職志，也因此被君王的臉所監控（Deleuze and Guattari 115-16）。

33 審查人指出，槇島的人物設定指向日本執著於神格化人物的集體意識，而此集體意識發動自日本以神權／皇權思想為養分的法西斯主義。根據丁未的觀察，日本法西斯主義在幕末時期融合了低階武士的「豪俠」傳統，發展成一種政治暴力；並在金融資本主義宰制的近代日本社會中，以獨裁軍閥的面貌出現，終於導致侵略戰爭與戰敗崩潰的局面，然而只要「……天皇制度存在一天，日本的法西斯主義就不會死滅」（14）。在此感謝審查人提出此一有趣的觀察，值得日後專章討論。

34 第二季第八集中，鹿矛圍借升奇醫生之口道出其憂慮不甘：「最後我終於變成被排除於社會之外的透明人……不只是希貝兒而已，連仰賴希貝兒生活的全人類，都否定了我的存在。為什麼沒有人肯承認我的存在？我必須就這麼消失嗎？」。

個絕對異質的他者或說他群。³⁵ 鹿矛圍的去臉化行動策略充分運用蟲群動能的特性，除了前述劫奪多隆的奇襲行動之外，在此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其如何以昆蟲擬態的邏輯進入流變為不可察覺，讓蟲群的騷動流湧鑽透控制權力體制。如前所述，公安局在調查鹿矛圍主導的案件過程中，注意到鹿矛圍利用臟器移植以及顯像的方法偽扮他人，亦即使用相當於昆蟲擬態的手法達到去辨識的目的。一般的看法是，昆蟲擬態可能是為了欺瞞或嚇退掠食者，鹿矛圍集團假冒身分或以顯像欺敵的行動也確實達到類似目的；然而有趣的是，集團所使用的顯像超乎必要的精緻，負責追查影像的執行官甚至覺得已經到了異常的程度，對鹿矛圍來說擬態似乎已不只是為了欺敵(Callois 18)。值得注意的是，顯像即是希貝兒社會大量運用的全像投影之一例，通常這種技術的目的是將令人心靈愉悅的影像投射覆蓋於整個城市環境、公私空間陳設、以及人們的衣物等之上，為市民提供個人化身心管理的居家人工智慧也是全像投影技術的應用。使用顯像的同時可說與希貝兒產生了某種連結，刻意使用精緻的顯像則似乎點出了某種創造連結的想望，指向昆蟲擬態的另一層涵義。凱羅斯(Roger Caillois)主張，與其說擬態是昆蟲為混淆天敵視聽的生存策略，不如說是昆蟲受到外在空間的誘惑、與外在空間變為一體的過程；此時擬態不是為了個體的存活，反而讓個體性隨著內外界線模糊而消弭(28)。凱羅斯進一步指出，精神分裂者或精神耗弱者的空間經驗近似於擬態：「……空間似乎是一種吞噬的力量，糾纏包圍著他們，像巨噬細胞一樣把他們消化掉……他〔們〕自覺變成了空間」(29)。與背景同化是一種去個人化(depersonalization)的過程，左哈爾(Ayelet Zohar)將去個人化的過程視為引發流變為不可察覺的一種方法，並強調偽裝(camouflage)與流變為不可察覺所欲達成的並非視覺上的不被看見，而是因為觀者的錯誤預設難以被解讀、因此視而不見的效果(176)。

35 第二季第七集中，常守與希貝兒談到如何面對鹿矛圍時，希貝兒便提及連主宰者都無法偵測到的存在不同於免罪者，是應該不可能存在的例外。

鹿矛圍的顯像偽裝確實可做為左哈爾解讀的佐證，然而本文更欲強調的是，如果凱羅斯的去個人化著眼於昆蟲／患者因無法劃分出身體與空間之間的界線而單方面被空間吞噬，流變為不可察覺則點出去個人化的終極意義在於流變為每個人／每種事物，創生新世界(Deleuze and Guattari 279-80)。名為鹿矛圍的蟲群存在，本就可說總在流變為他人，例如調查過程中監視官與執行官才發現，鹿矛圍早已不知不覺地以各種面貌出現在他們身邊了，如同德勒茲與瓜達希所說的「不被注意」、「即使對門房或鄰居來說都像陌生人」(279)。鹿矛圍集團進一步發揮變為「透明人」條件要素的各項策略，創造與所偽扮的他人以及希貝兒塑造的社會環境間的接合點，如同擬態的動物般「與岩石、沙以及植物的線條共同形成世界，流變為不可察覺」(Deleuze and Guattari 280)。刻意追求與希貝兒之間的接合點，並不是為了變得跟希貝兒一樣，而是要在流變為不可察覺的過程中，透過肯定各種可能的連結(而非排除特定事物或特定連結)，啟動改寫世界的可能性。所謂的自我會在這過程中消失，但與環境間的創造性連結會生成新世界，「像透明的膜，覆蓋於原有的世界之上」(Braidotti, *Transposition* 261; Deleuze and Guattari 280)。除了自希貝兒的身分辨識系統脫鉤之外，鹿矛圍式的擬態更讓希貝兒與自身脫鉤；希貝兒在與鹿矛圍的連結中也產生蛻變，將群集式的心靈指數納入系統之中，制裁了鹿矛圍。鹿矛圍的反抗看似歸結於希貝兒的強化，但將蟲群動能納入自身，事實上就是納入變異與雜多的不可確定性，在原有的控制網絡中製造了新時空。出於對「失控」的疑慮，希貝兒描繪了一個混亂血腥的未來，常守則給了一個看似回到人文主義的回應：「我不會把事情想得這麼悲觀，或許最後來臨的是正確的法律和秩序、還有和平與自由也說不定，不作出選擇還是無法實現。這個世界不是由社會來選擇人的未來，而是由人類選擇社會的未來」(《心靈判官》第二季第十一集)³⁶。但必須注意的是，在希貝兒蛻變的同時，其所必須承認的

36 希貝兒警告常守的一番話道盡其疑慮：「在不久的將來，以集團為基準的社會就會到來。就算自己是潔淨的，但做為集團卻不一定；這種疑神疑鬼的狀況會招致混亂，前

「人」已是蟲群存在；相對於嚴密控制的蟲窩社會，常守決定相信肯定的，是蟲群所衝撞出的新時空。

八、結語

兩季《心靈判官》所描繪的日本，為了有效計算轄區內所有人口的心靈指數，雖不至於鎖國，但傾向維持自給自足的狀態；希貝兒似乎也處於實驗階段，在2015年劇場版輸出到外國，也是實驗自身控制能力的一環。換句話說，《心靈判官》中的控制社會，在規格與成熟度上或許不能與現實中的情況相比。然而爬梳主要角色們對去臉去辨識策略的各種實驗，依然有助於將昆蟲式反抗的相關論述推進一步，提供一種方法思考如何在控制社會的蟲窩部署中找到蟲群動能得以迸發之處。對控制權力的反抗當然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控制權力賴以運作的工具也日新月異，昆蟲政治的曖昧性或許也讓控制與反抗的界線時而模糊難辨。如同伯格爾德所說，在控制社會中從事反抗，並不是推翻控制網絡即可，因為「網路的民主解放潛能內在於控制系統之中。網路不是公司或國家的工具。資訊……『想要自由』」；控制遂行之處也是可能逃逸之處，重要的是在每一種權力部署中尋找內在其中、因應此特定部署而生的反抗之道（“Deleuze and the Machines” 28）。《心靈判官》的反抗集團為了從數位檔案脫鉤，進行了種種去辨識去臉化的實驗；其中，鹿矛圍開發與控制系統的創造性連結、進而流變為不可察覺的擬態策略，正可說展演了上述內在性反抗；而這種內在於權力部署中的反抗，其實就是我們必須如蟲群般持續鑽尋的，小小的新時空。

所未有的獵巫社會將會來臨，最後……制裁可能會變成一種大量虐殺。是你打開了通往這種未來的大門」（《心靈判官》第二季第十一集）。

引用書目

- 〈Psycho-pass《心靈判官》3部劇場版2019年接連公開〉。“*Psycho-pass Xin Ling Pan Guan sanbu juchang ban 2019 nien jielien gongkai*” [3 *Psycho-Pass* Movies Are to Be Released in 2019]。《ETtoday遊戲雲》*ETtoday Game Cloud*。2018年3月9日。網路。2019年4月20日 [9 Mar. 2018. Web. 20 Apr. 2019]。
- 丁未(Ding, Wei)。〈日本的幽靈——美帝縱容包庇下的日寇法西斯〉“*Riben de youling—Meidi zongrong baobi xia de rikou faxisi*” [Specters of Japan: Japanese Fascism Tacitly Supported by an Imperialist America]。《世界知識》*World Knowledge* 22 (1950): 14-15。網路。2019年10月13日 [Web. 13 Oct. 2019]。
- 本広克行、塩古直義・導(Motohiro, Katsuyuki, and Naoyoshi Shiotani, Dir.)。《心靈判官》劇場版 *Xin Ling Pan Guan juchang ban* [*Psycho-Pass* Movie]。Production I.G, 2015。You Tube, cindy327384上傳 [Upload. cindy327384]。2017年5月24日。網路。2019年3月22日 [24 May 2017. Web. 22 Mar. 2019]。
- 李宜澤(Li, Yi-ze)。〈後記——昆蟲化身的吟遊詩人：修·萊佛士的「一昆蟲一世界」〉。“*Hou ji—Kungchong huashen de yinyou shiren: Xiu Laifoshi de 'yi kungchong yi shijie'*” [Afterwords—Insects Morphing into Bards: What Hugh Raffles Says about “Seeing a World in an Insect”]。萊佛士 [Raffles] 467-75。
- 哈拉瑞(Harari, Yuval Noani)。《21世紀的21堂課》*Ersihyi shiji de ershiyi tang ke* [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譯：林俊宏 [Trans. Junhong Lin]。臺北：天下文化 [Taipei: Bookzone]，2018。
- 萊佛士(Raffles, Hugh)。《昆蟲誌：人類學家觀看蟲蟲的26種方式》*Kungchong zhi: Renlei xue jia guankan chongchong de 26 zong fangshi* [Insectopedia]。譯：陳榮彬 [Trans. Rongbin Chen]。新北市：左岸文化 [New Taipei City: Rive Gauche]，2018。
- 黃宗慧(Huang, Tsung-huei)。〈不可能悅納(寄生)昆蟲？：動物倫理的蟲蟲危機〉。“*Bukenen yuena (jisheng) kungchong? Dongwu lunli de chongchong weiji*” [The Limits of Hospitality?: Repositioning the Status of (Parasitic) Insects in Animal Ethics]。《中外文學》*Chun Wai Literary Quarterly* 47.2 (2018): 9-46。[http://dx.doi.org/10.6637/CWLQ.201806_47(2).0001]
- 黃璽宇(Huang, Xiyu)。〈以多瑪斯論《心靈判官》中人之自由與該追求的幸福〉“*Yi duomasi lun Xin Ling Pan Guan zhong ren zhi ziyou yu gai zhuiqiu de xingfu*” [Rethinking Freedom and Happiness in *Psycho-Pa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omas Aquina]。《漫活著：第五屆御宅文化研討會暨巴哈姆特論文獎文集(下)》*Man*

- huo zhe: *Di wu jie yuzhai wenhua yantao hui ji bamute lunwen jiang wenji (xia)* ["Mandering" and Living: A Symposium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CG Studies and Bahamut Distinguished Papers Award II]. 編：梁世佑 [Ed. Shiyou Liang]. 新竹：交大 [Hsinchu: NCTUP], 2017. 44-73。
- 塩古直義，導、本広克行，總導演 (Shiotani, Naoyoshi, and Katsuyuki Motohiro, Dir.)。《心靈判官》第一季 [*Psycho-Pass Season 1*]。Production I.G, 2012。Netflix。網路。2019年3月20日 [Web. 20 Mar. 2019]。
- 塩古直義，導 (Shiotani, Naoyoshi, Dir.)。《心靈判官》第二季 [*Psycho-Pass Season II*]。Production I.G, 2014。Netflix。網路。2019年3月22日 [Web. 22 Mar. 2019]。
- 漆黑的狼煙 (Chihei de langyen)。〈力不從心的正義——*Psycho-Pass* 心靈判官第1、2季與劇場版〉“Li bu tsong xin de zhenyi—*Psycho-Pass Xin Ling Pan Guan yu juchang ban*” [Imperfect Justice—The *Psycho-Pass* Series and Movie]。《巴哈姆特》*Bamute*。2019年7月8日。網路。2019年10月13日 [8 July 2019. Web. 13 Oct. 2019]。
- 廖勇超 (Liao, Yonchao)。〈裸命、暴力、怪物性：談《心靈判官》中的生命政治與倫理〉“Luoming, baoli, guiwu xin: Tan *Xin Ling Pan Guan zhong de shengming zhengzhi yu lunli*” [Bare Life, Violence, Montrosity: Biopolitics and Ethics in *Psycho-Pass*]。《後人文轉向》*Hou renwen zhua xiang* [The Posthuman Turn]。編：楊乃女、林建光 [Ed. Nainu Yang and Jianguang Lin]。臺中：興大 [Taichung: NCHUP], 2018. 99-120。
- Agamben, Giorgio. *The Coming Community*.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3.
- Arquilla, John, and David Ronfeldt. *Swarming and the Future of Conflict*. Santa Monica: RAND, 2000. Web. 23 Apr. 2019.
- Bogard, William. “Deleuze and Machines: A Politics of Technology.” Poster and Savat 15-31. [http://dx.doi.org/10.3366/edinburgh/9780748633364.003.0002]
- . “Surveillance Assemblages and Lines of Flight.” *Theorizing Surveillance: The Panopticon and Beyond*. Ed. David Lyon. London: Routledge, 2011. 97-122.
- Bogue, Ronald. *Deleuze on Music, Painting, and the Arts*.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Braidotti, Rosi. *Metamorphosis: Towards a Materialist Theory of Becoming*. Cambridge: Polity, 2002.
- . *Transpositions: On Nomadic Ethics*. Cambridge: Polity, 2006.
- Brown, Eric C., ed. *Insect Poetics*.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06.
- . “Performing Insects in Shakespeare’s *Coriolanus*.” Brown, *Insect Poetics* 29-57.
- Bukatman, Scott. *Terminal Identity: The Virtual Subject in Post-modern Science Fiction*.

- Durham: Duke UP, 1993.
- Caillois, Roger. "Mimicry and Legendary Psychasthenia." Trans. Johan Shepley. *October* 31 (1984): 16-32. Web. 15 May 2019. [<http://dx.doi.org/10.2307/778354>]
- Caluya, Gilbert. "The Post-panoptic Society?—Reassessing Foucault in Surveillance Studies." *Social Identities* 16.5 (2010): 621-33. Web. 15 May 2019. [<http://dx.doi.org/10.1080/13504630.2010.509565>]
- Campana, Joseph. "The Bee and the Sovereign (II): Segments, Swarms, and the Shakespearean Multitude." *The Return of Theory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Studies II*. Ed. Paul Cefalu, Gary Kuchar, and Bryan Reynold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59-78. Web. 15 May 2019.
- Collignon, Fabienne. "Insect Technics: War Vision Machines." *Cold War Legacies: Legacy, Theory, Aesthetics*. Ed. John Beck and Ryan Bishop.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16. 234-51. Web. 15 May 2019. [<http://dx.doi.org/10.3366/edinburgh/9781474409483.003.0013>]
- Coutts, Nicky. "Portraits of the Nonhuman: Visualizations of the Malevolent Insect." Brown, *Insect Poetics* 298-318.
- Deleuze, Gilles. *Negotiations 1972-1990*. Trans. Martin Joughin.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5.
- Deleuze, Gilles, and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Brian Massumi. London: Minnesota, 1987.
- Edkins, Jenny. *Face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2015.
- Favret, Colin. "Jean Henri-Fabre: His Life Experiences and Predisposition Against Darwinism." *American Entomologist* 45.1 (1999): 38-48. Web. 15 May 2019. [<http://dx.doi.org/10.1093/ae/45.1.38>]
-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1977.
- . *Security, Territory, and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7-1978*. Trans. Graham Burchell. Ed. Michel Senellar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Galloway, Alex, and Eugene Thacker. *The Exploit: A Theory of Networks*.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07.
- Gates, Kelly A. *Our Biometric Future: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ulture of Surveillance*. New York: New York UP, 2011.
- Goodman, Marc. *Future Crimes: Inside the Digital Underground and the Battle for Our Connected World*. London: Corgi, 2015.

- Haraway, Donna.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1990.
-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London: Cambridge, 2000.
- .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2004.
- . *Commonwealth*. New York: Cambridge, 2009.
- Hollingsworth, Cristopher. “The Force of the Entomological Other: Insects as Instruments of Intolerant Thought and Oppressive Action.” Brown, *Insect Poetics* 262-80.
- Lewis, Tyson E. “Swarm Intelligence: Rethinking the Multitude from within the Transversal Commons.” *Culture, Theory and Culture* 51.3 (2010): 223-38. Web. 15 May 2019. [http://dx.doi.org/10.1080/14735784.2010.515399]
- Lijia, Mona, and Stellan Vinthagen. “Sovereign Power, Disciplinary Power and Biopower: Resisting What Power with What Resist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Power* 7.1 (2014): 107-26. Web. 15 May 2019. [http://dx.doi.org/10.1080/2158379X.2014.889403]
- Munro, Iain. “Non-disciplinary Power and the Network Society.” *Organization* 7.4 (2000): 679-95. Web. 15 May 2019. [http://dx.doi.org/10.1177/135050840074010]
- Newman, Saul. “Politics in the Age of Control.” Poster and Savat 104-24. [http://dx.doi.org/10.3366/edinburgh/9780748633364.003.0007]
- . “War on the State: Stirner and Deleuze’s Anarchism.” *The Anarchist Library*. Web. 15 May 2019.
- Parrika, Jussi. “Politics of Swarm: Translations between Entomology and Biopolitics.” *Parallax* 14.3 (2008): 112-24. Web. 15 May 2019. [http://dx.doi.org/10.1080/13534640802159187]
- . *Insect Media: An Archaeology of Animals and Technology*.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10. [http://dx.doi.org/10.3366/edinburgh/9780748633364.001.0001]
- Poster, Mark, and David Savat, eds. *Deleuze and New Technology*.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09. [http://dx.doi.org/10.3366/edinburgh/9780748633364.001.0001]
- “Psycho-pass.”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Wikimedia Foundation, Inc. 13 May 2019. Web. 31 May 2019.
- Rasmussen, Mikkel Bolt. “The Control Society After 9/11.” *Public Interfaces* 1.1 (2011). Web. 15 May 2019.
- Raunig, Gerald. *A Thousand Machines: A Concise Philosophy of the Machine as Social Movement*. Trans. Aileen Derieg. Cambridge: Semiotext(e), 2010.
- Sadowski, Jathan, and Frank Pasquale. “The Spectrum of Control: A Theory of the Smart City.” *First Monday* 20.7 (2015): 1-22. Web. 15 May 2019. [http://dx.doi.org/

10.5210/fm.v20i7.5903]

Savat, David. "Deleuze's Objectile: From Discipline to Modulation." Poster and Savat 45-62. [<http://dx.doi.org/10.3366/edinburgh/9780748633364.003.0004>]

Shaviro, Steven. "Two Lessons from Burroughs." *Posthuman Bodies*. Ed. Judith Halberstam and Ira Livingston.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95. 38-56.

Sorenson, Bent Meier. "How to Surf: Technologies at Work i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 Poster and Savat 63-81. [<http://dx.doi.org/10.3366/edinburgh/9780748633364.003.0005>]

Stipanovic, Andre. "Bees and Ants: Perceptions of Imperialism in Vergil's *Aeneid* and *Georgics*." Brown, *Insect Poetics* 13-28.

Thacker, Eugene. "Networks, Swarms, Multitudes Part I." *Ctheory* (2004). Web. 15 May 2019.

———. "Networks, Swarms, Multitudes Part II." *Ctheory* (2004). Web. 15 May 2019.

———. "Swarming: Number versus Animal?" Poster and Savat 161-84. [<http://dx.doi.org/10.3366/edinburgh/9780748633364.003.0010>]

The Invisible Committee. *To Our Friends*. Trans. Robert Hurley. Cambridge: Semiotext(e), 2014.

Weidemann, Carolin. "Between Swarm, Network, and Multitude: Anonymous and the Infrastructures of the Common." *Distinkt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5.3 (2014): 309-26. Web. 15 May 2019. [<http://dx.doi.org/10.1080/1600910X.2014.895768>]

Wilcox, Lauren. "Drones, Swarms and Becoming-insects: Feminist Utopias and Posthuman Politics." *Feminist Review* (2017): 25-45. Web. 15 May 2019. [<http://dx.doi.org/10.1057/s41305-017-0071-x>]

Zohar, Ayelet. "Strategies of Camouflage: Depersonalization, Schizoanalysis and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 *Deleuze and the Schizoanalysis of Visual Art*. Ed. Ian Buchanan and Lorna Collins. London: Bloomsbury, 2014. 173-202. [<http://dx.doi.org/10.5040/9781472594303.ch-008>]

airiti

旁若的多重宇宙／語奏

洪凌*、廖勇超**

時間：2019年10月5日，晚間六點至八點半

地點：台北市大安區 聞山咖啡

編輯與撰稿：呂東昱***

一、文類中的旁若，旁若中的文類：邊緣、寄生與旁若域

編按：對談人洪凌與廖勇超以此次「旁若專題」的問題意識起頭。在本節中，兩人首先把「旁若」(para)的概念放置在過去英美科幻場域傾向將「文類」(genre)分門別類的傳統中，試圖梳理「旁若」如何回應與置疑「文類」這概念。接著兩人自狄蘭尼(Samuel Delany)在《短小觀點：酷異思考與旁若的政治性》(*Shorter Views: Queer Thoughts & the Politics of the Paraliterary*)中的“parasite”一詞，提出兩個雖在使用脈絡上有些許差異，但不斷相互指涉、形構的中文意涵：「寄生」與「旁若域」。由“parasite”的雙重概念延伸，兩人進一步討論了「旁若」的出版、書寫，甚至是閱讀實踐，這些都讓「旁若」指向一種在人之「外」的「非人」潛能。

*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

**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暨《中外文學》總編輯。

*** 國立陽明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洪凌(以下簡稱「洪」):我想先從啟發這個專題的問題意識開始。有關「旁若」在文學層次上的探討,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莫過於狄蘭尼的《短小觀點》。這本書雖然談論的主軸是文學書寫,同時也特別強調旁若的範疇絕非僅是文學,更會進一步體現在漫畫及影視等跨媒介場域。狄蘭尼一方面看到了英美科幻文壇、學界等場域對「旁若」定義的大論戰,一方面也不耐煩於這樣的大論戰不斷強調要去定義不同類型的文類:像是科幻(science fiction)、奇幻(fantasy)、恐怖(horror),或那些更次等、更不受學界青睞的類型。因此,狄蘭尼在這本書轉而強調寫作與出版的形式更是構成旁若的重要元素。他在自己1995年的小說《霍革》(Hogg)中,除了向讀者揭示「旁若」其實是各種不同文類元素的混雜:這本書有一點科幻、也有一點恐怖;更重要的是,此書亦是在寫一個有關男孩與被/姦淫(rape)的故事。他建構一個全知敘述的孩童視角,並用一種「非人」(inhuman)、「冷漠」(indifferent)與「反同理」(dis-empathy, antipathy)的視線看待近未來社會的暴亂、燒殺擄掠與被/姦淫。當狄蘭尼談到此本小說的寫作時,表明他是蓄意安排這樣的主題;因為他時常會被主流進步的身份政治視為集結三種「邊緣位置」的代表:一個美國男同志/黑人/女性主義作家,而他正是要主張即便他身上有此三重身份,也可以(或更應該)寫一個關於姦淫男童而且男童成為共謀者的末世色情故事。

廖勇超(以下簡稱「廖」):所以狄蘭尼「旁若文學」(paraliterature)的概念是從這本小說發展出來的嗎?

洪:不是。他並不是透過這個書寫才想到「旁若文學」的概念,而是他認為許多文類其實彼此都是對方的寄生物(parasite)。此處的“parasite”除了是英文字面上寄生蟲的意思,“para”與“site”兩字之結合更意味著(文類)場域之間相互的轉動:過去學界之所以時常會定義一個科幻作品不好,是因為它不夠「科」、不夠「幻」,或在狄蘭尼的例子裡就是過於色情。然而“parasite”一詞重要的意義在於(文類)場域之間早就是互相競逐(contested)而且轉動的。舉例來說,《霍革》的出版就十分符合「寄生」

與「場域轉動」的雙重意義。這本書在出版之初其實一直面對的是無法出版的狀態：長達二十五年不斷有出版人告訴他可以出版，可是又因害怕而作罷。後來這本書就變成一種非常小眾的狂熱(cult)讀者間流傳的手稿。直到一次他外出活動才正好遇到一位讀者向他分享有這本手稿的存在。他為了交朋友所以隱匿了自己作者的身份，只告訴那位讀者如果他們一起讀必定會激發彼此的情慾。因此，此時閱讀也就變成了一種構築「旁若域」(parasite)的實踐：¹ 正因為小說的內容太過色情、暴力與反政治進步，最後因為它的不／延後出版，反而得以形成三層重要的意義。一、它寄生在不出版但是口耳相傳的狀態；二、它也並置了二十五年後出版版本與口耳相傳版本間相互激發的可能；三、它有時候又如打羽毛球般，被拋在不同的場域，讓讀者「接不住」。所以我覺得這本書正好讓不同讀者從中都可以找到不同種文類些微的影子、它不但揉合了「色情的科幻」與「科幻的色情」，而且政治意味濃厚(非僅為了寫色情)，更讓人因此「不忍卒讀」。尤其它並非是以不忍卒讀的方式鞏固人性，而是人性至少要涵蓋那些讓人不忍卒讀的種種。例如，男童作為全知視角，不但親身參與了各式姦淫與暴力，還非常享受其中。除此之外，他介於人與非人的狀態(即將是成人、合法公民，同時又不是)，也是讓美國讀者不忍卒讀的重要面向。

廖：這讓我想到愛特伍(Margaret Atwood)的《末世男女》(*Oryx and Crake*)中的奧麗克絲(Oryx)，她從小就是個性工作者，但並不是主流女性主義所認知的那種被性剝削或一定過得很悲慘的性工作者。愛特伍再現她的方式就是透過你剛剛說的疏離或者無感。

洪：有一點像呢，因為其實愛特伍是另一種顛倒過來的典型。如果說她和狄蘭尼在性的議題上有彼此交集的話，她並不喜歡被稱作科幻作家，也不喜歡被標籤為女性主義作家，可是她也不是要當一位完全沒

1 編按：為方便讀者理解，以下對談中若涉及用「場域」之概念來思考“parasite”的部分，會以此「旁若域」的譯稱來取代原有「寄生」之翻譯，以便清楚區別兩者在意義使用上的脈絡。

有這些要素的作家。但她寫的《末世男女》主題就很簡單，就是克雷科(Crake)要造出無慾望的新人類。我最喜歡的反而是小說裡其實早就無慾望的小女孩奧麗克絲。她從小就進入了色情工業，成為被慾望的客體(object of desire)。而男性敘事者吉米(Jimmy)就一直被奧麗克絲的凝視(gaze)所影響，吉米一直覺得影片中的奧麗克絲在注視他。

廖：我覺得奧麗克絲的凝視很有趣。吉米一直覺得奧麗克絲的經歷一定讓她身心受到很大的創傷，尤其是當吉米把她想成是被性剝削或被父權體制壓迫的受害者。但是奧麗克絲根本不這樣認為。這兩人在想法上一直沒有產生真正的連結，這樣情感的錯置可能也是導致最後結尾克雷科暴力地殺掉奧麗克絲的原因，或是說，兩個視角或位置的不均等產生了最後男性的暴力。

洪：小說中有兩個主要的男性人物，一個是天才但較沒「人性」的克雷科，另一個是看似較有「人性」的吉米。所以小說也呈現了兩種非人(inhuman)的情感位置，一個是色情的化身，但從來不覺得自己是不妥的奧麗克絲；另一個則是和吉米一樣同為男性，卻不斷地嘲笑吉米的克雷科。

二、旁與若、似與非、內與外 I：旁若文學的語法

編按：延續第一部分，兩人繼續在本節探討「旁若」在意義上的延伸。廖勇超延續了洪凌談到的寄生與場域，論及「旁若」如何體現在實驗性文學書寫的語法(syntax)中，並進而開啟擾動表意系統裡符碼編排的可能性。洪則承接廖的論點，論及「旁若」所能啟發的字義變化，可能伴隨的不盡然是基進性，反而可能是一種集體情感上的排「外」性，一種肇因於引入外部符碼而產生的主客(宿主與寄生物)易位。兩位對談者以現下台灣的妖怪研究熱為例，認為這些研究中的妖怪，看似展現某種「旁若性」，實則早已剔除了「外部」它者(可能是書寫語法、時空構築，或是妖怪特質)。洪認為，這些外部

它者所體現的威脅性以及當此威脅性與內部混雜後，而產生之似不像的物質性，才可能讓「旁若」的基進性如「罔兩」般惘惘浮現。最後，兩人分別以看似符合正典文學範疇的喬伊斯(James Joyce)與十九世紀英美怪譚中的怪物書寫為例，論其語言分子化後的散亂，或是語言的過多／溢出。這些語言的獨特性不但彰顯了「旁若書寫」如怪物般似不像的特質，也能進而由內而外裂解文類的既有意義。

廖：好，那我想要把焦點先拉回「旁若」的部分。因為剛剛你談到了「旁若」概念中「場域」變化的問題，也談到文學文類本身也與場域的構築與轉動有關。我自己是觀察到“para”這個字首幾個有趣的意義：第一個是“side by side”，也就是在某一個「正典」或是「宿主」的旁邊。第二個是“beyond”或“pass”的意思，也就是一種擦邊球、從旁側飄過的概念。而我自己比較關注的是所謂「字序的顛倒性」(the transpositionality of words)之問題。這牽涉的是當「旁若」作為文字、符號、影像，甚至聲音之表意系統時，它開啟了將表意系統重新排列組合的潛能。同時這也連結到「旁若」其實可以殊異化正典的文法系統；也就是說它在排列組合的過程中，其實會組構成獨樹一格，卻又同時貼近、寄宿在原宿主旁側的「非(正典)文法系統」。不知道你有沒有想到一些關於此概念的例子？

洪：其實講到字的置換的時候，我倒是想到我們在寫中文科幻小說的時候，常常會置入不管是廣泛「台灣」想像的「台」或是「中文」想像的「中」。而這之中，到底何為宿主、何為寄生者呢？有一種我稱為「後殖民進步主義」的思維認為，由於要解殖所以我們不容於任何「外來物」的侵入，不能讓外來物進入這個場域。一旦進入之後，你與你所引介的物種或是你提到的文法想像，可能會讓原來的「字義感」產生變化。這可以回應到你剛剛談到「字序顛倒性」的問題，譬如，假如有一天我們讓寄生蟲成功變成一個宛如俯視眾生的邪神，或是成功地讓酷兒(queer)因為翻譯而有了「可談性」(讓它在華文的可談性變得不一樣)，連帶形成的是一種對字的意識性轉換。而這種後殖民進步主義也就伴隨著此種意識性

的轉換，而產生強烈的不安感。它不斷強調我們引介那些外來物種、文法的後果會讓這些外來物「由外而內地」成為了宿主，「我族」反倒成為了宿主之下受支配的寄生蟲。我認為此種後殖民意識很有趣，因為它代表一種台灣當前所想像的「台灣本位主義」：必須剔除一切外來物，除了原生物種，其他什麼都不要有最好。就像我與你討論過近年的「台灣妖怪」出版熱潮，就是試圖在想像到底什麼是屬於「我們」島嶼內部的妖怪，什麼是不應該收錄的「外部」它者：我們不應該讓這些它者置放到我們的文化界線內，以免讓屬於「台灣」原生的妖怪研究混合成「似不像」的狀態。這種狀態也呼應著為何狄蘭尼在《短小觀點》中不願談那些被認為最符合「科幻」的作品，他反而去談那些在書寫形式上橫跨於不同場域，並存在持續翻動可能的作品。他的用意就是要去彰顯何為「旁若書寫」(paraliterary writing)的政治性。

至於談到“para”的中文翻譯「旁若」，最一開始是出現在清大中文系劉人鵬的一篇論著〈在「經典」與「人類」的旁邊：1994 幼獅科幻文學獎酷兒科幻小說美麗新世界〉。起初我聽她說應該如何翻譯“para”的概念時，本是思考是否採用類似將“cyborg”翻譯為「賽伯格」的音譯法。但是後來她用一種中文系的敏感度指出「旁若」的翻譯不只是音譯而已，更隱含既是在旁邊卻又只是「彷彿」(也就是「若」的意思)、似是似非(almost yes and almost not)的意譯。而我認為，台灣在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其實至少是還願意接納一些不太屬於「原生種」的外部成份。所以，在那個時候對一位中文系做科幻的學者來說，她(劉人鵬)處理的到底是純粹的「中文」而已嗎？是「中文」裡面的何種中文呢？她在〈在「經典」與「人類」的旁邊〉裡除了分析一些科幻作品，也向莊子《齊物論》中「罔兩問景」篇取材。我認為「罔兩」的概念就蠻符合你剛剛提到「旁若」作為「擦邊球」式的概念。它不是昇華的，而是一直幽微地在那邊從事嘲諷政治進步的姿態……

廖：又或者是存在著威脅性，在身邊就有種很可怕的感覺，一種惘惘的存在。

洪：對，而且它也不用說太多話。比較可能是進步政治一說話，它就涼涼地拋出一兩句。這就是你講的一種雖在旁邊卻具有威脅的力量。

廖：或者是僅存在於背景，無以名狀，類似張愛玲所說的時代中「惘惘的威脅」……

洪：對啊，就是你不知道是什麼，可是它就一直幽幽地繚繞在周圍。這不僅呼應了美國洛夫克拉夫特(H. P. Lovecraft)的想像，我覺得在華文界也有一種類似「巨大威脅」指涉。這感覺有點類似《駭客任務二 重裝上陣》(*The Matrix: Reloaded*)中，真實的啟蒙後人類認為自己一定成功擺脫了母體(Matrix)控制的美好想像。這些可能都是關於「旁若」的諸多想像，至於它到底會被放在何種意識形態的場域中，端看操控者如何去使用它。所以引介「外來物」的相關書寫或想像，可能會更激化什麼是「科幻」小說的論戰。回觀在籌備這個專題的時候，我們其實有意識避開了去明確界定我們要談的是何種「科幻」小說的命題，而單純選擇用「旁若」代替，其原因在於有些人會堅持特定形式的書寫才屬於「科幻」小說。比方說，海拉歲(Donna Haraway)在《與麻煩共處：「怪物世」中的關係連結》(*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一書中將克蘇魯(Cthulhu)的字母“h”抽換成“Chthulu”與「人類世」(Anthropocene)的字尾「世」(-cene)相結合而「引介」的新拼貼字「觸生世」(Chthulucene)、舊怪譚(Old Weird Tale)、新怪譚(New Weird Tale)，或是這幾種書寫類型之間場域的轉換等。這幾種主題都未必會被肯認為毫無置疑的「科幻」。

廖：提到旁若文學特異的語法，讓我想到喬伊斯的作品，尤其是他的《芬尼根的守靈夜》(*Finnegans Wake*)。當然他在《尤利西斯》(*Ulysses*)就有在嘗試這種實驗性的書寫。但是在《芬尼根的守靈夜》中，一個句子可能組構了法文、英文、梵文、甚至中文，並且在不同層次都能表達不同的意義。對我來說，這也是一種非常有趣的旁若書寫嘗試。這種旁若文學的寫法其實四散於各種書寫中，所以有些學術寫作會非常的有文學性或有詩意，或是有些小說看起來像學術論文一樣，這些當然都是旁若

文學的實踐。但我自己會覺得喬伊斯那種書寫好像更往前一步：他不只並置了不同的文類，而是把各種語言的文字「分子化」到自己的系統中。所以有些字第一眼完全看不懂，但這些字可能就是一種「旁若」，看起來是英文，但是念起來卻又不是，或是用法文看的時候又變成了另一種文字。我覺得這種文字、詞素、聲素的微分子化運動非常有趣。

剛剛你也提到「旁若」這概念有接納外物的意涵，剛好和我最近在想的「似不像」的問題有關，不是「四不像」，因為「四不像」只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旁若」則是很類似卻又不相像，剛好符合了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對於怪物的定義。當然旁若文學不一定有怪物性，如果有，這樣的怪物性就會建立在「似」但卻又不像的概念上。這就可以和很多當代理論家，比如你剛剛提到的海拉歲的概念做出連結。如果旁若文學有一種形式上的基進或怪物性，我們也許可以思考這個層次上的諸多變形。

洪：對，既然我們提到怪物性，我想到最近幾場在比較文學學會「媒介研讀班」中，我們都會談回去十九世紀以降怪譚文類的怪物。這些怪物雖然在外形上可能只有些微妙的毫釐之別，其實有著千里之差。「毫釐」跟「千里」之間就有點類似你剛才講到的亞里斯多德，他認為真的東西與差了一點、壞掉的東西之間有一種「似與不似」，在模仿(mimicry)上的差異。這個問題在華文界談科幻中有一個例子：劉人鵬在她〈在「經典」與「人類」的旁邊〉中提到學院與科幻文學獎的評審們在面對一些他們看不懂的作品時，會認為「科幻」不應該這樣寫。而「科幻」應該「如何寫」就涉及到你剛剛提到有關文學書寫之間界線的問題。當有些異己物被引介進來了，評審們頓時就分成守舊派(old guard)與先鋒派(new frontier)。而先鋒派的青壯世代評審就會嘲諷守舊派的長老(如張系國)，完全把科幻設想成代表陽剛文化的「科」與陰性文化的「幻」之結合。但是我們無論如何用「過時」批評張系國，他永遠會與時代形成惘惘的連結，不會因為我們稱一聲「過時」就會消失不見。這個「惘惘然」尤其彰顯於評審在面對「科幻」書寫中所「引介」(meditated)的新元素時，會弔詭地不能理解何以這些「前衛科幻小說」要書寫那些在寫實小說中根

本寫不出來的色情場景。依這邏輯來看，如果說寫實小說寫不出來那些性愛場面，應該就正符合「科幻」非寫實的定義、很「科幻」才對。換言之，就是因為「性的科幻化」過於「科幻」、溢出「科幻」而成為「後設科幻」(meta-sci-fi)，不僅讓他們產生種種的不適，更讓他們無法自圓其說這些作品不「科幻」，導致他們一時之間不知道如何評價這些作品——他們一再強調：「這些算是一篇好的小說，可是……」，這裡的「可是」其實就凸顯了這些作品「過多了」、「超出了」他們心目中真正「好的科幻作品」。但有趣的是，這些評審還是同時選入了「好的」作品與那些比較「不應該的」作品，讓我覺得兩者其實在文類場域中都在相互競逐何為「科幻」。

三、旁與若、似與非、內與外II：旁若文學的內容

編按：在本節裡，廖勇超持續向洪凌提問是否還有除了語法之外，在內容上亦彰顯「旁若」能夠突破文類限制的基進特質。洪舉出莫爾(Catherine Moore)的最經典怪譚小說(the Weird fiction)〈殺怖洛〉(“Shambleau”)為例，指出該小說內容裡的世界構築以及怪物性再現並非是建立在一種內／外之分的邏輯上；相反地，莫爾所形構的世界與物種想像是內／外混雜為既是一整體，卻也是各種黏稠異物揉成一團，混亂不堪的狀態。廖亦承接了〈殺怖洛〉的討論，認為這樣的內容呈現亦呼應了前一節討論之「旁若」的分子化力量，進而翻轉了人／怪物、寄主／寄生物之分。洪更重點補充道，這種逆轉內／外、不內也不外之概念，並不能用「介於」的概念看待，而是以一種「似此非彼」的「雙非」姿態包覆又裂解各種身份、物種與場域之間的界線。

廖：我覺得蠻有趣的是你剛剛提到狄蘭尼寫了一些非正統的情慾書寫，以及你稍早例子裡提到的「情慾科幻化」或「科幻情慾化」，其實是

取消了科幻這個文類的有效性。就像在科幻小說中，當情慾被提及到一定的程度時，科幻便變得不再似「科幻」。除了剛剛提及的形式之外，是否還有能夠突破文類定義的內容、要素或內在於旁若文學的能量？比如說，當這些要素被放在科幻中，便會讓「科幻」不像「科幻」；放在寫實中會讓「寫實」也不再「寫實」。

洪：對啊，這種「不再……」就是超出了。而這種文類的超出(excess)不但不會被讚許，反而不是被視若無睹，就是被認為不該如此。有個例子，我們以前在看哥德式小說(gothic novel)時，有一個很小的文類叫做「低俗恐怖」(penny dreadful)，它的廉價主要來自它的驚悚感好像不及那種正典的恐怖小說，也同時來自它有點灑狗血。美國在三、四〇年代無論再怎麼把「怪譚」放入學院的殿堂，只會把這類小說歸入「低俗小說」(pulp fiction)一類，即使它有多「科」或有多「幻」，因為它很廉價、不夠高貴。在這類型當中，有一篇後來被視為「怪譚」很重要的著作是莫爾的〈殺怖洛〉。莫爾在裡頭改寫了蛇髮女妖的故事。這位蛇髮妖在故事中被一個來自星際駛來的、具有黑色電影(film noir)非正典英雄式的走私者——男主角西北史密斯(Northwest Smith)撿回去。本來看似是一種強者救援弱者的權力關係，然而那個「強」在故事中卻不斷受到「高熱夢」(fever dream)侵襲，以至於最後當他進入蛇髮妖視線所製造的「旁若」地景(para-landscape)，並向蛇髮妖俯首稱臣的一剎那，就出現了文類之間不該有的成份：假設你寫的是正統的「科幻」時，那照理說「強」的角色應該是比較「外」的，但事實上最彰顯「強」的反而是那個蛇髮妖，因為它看似粗而鮮紅的頭髮，其實是一條條又滑又會流動的觸鬚(tentacles)。這些觸鬚到最後滑入了那位冷硬男主角的毛孔裡。這種冷硬被異物的黏滑性觸動的情狀，就類似「旁若」的「寄生蟲——旁若域」意義：它侵入且控制、主宰了被侵入者。

廖：我之前剛好發表了一篇討論〈殺怖洛〉的文章，裡頭蛇髮妖的形象非常有趣，因為它的觸鬚才是本體，外在反而是假象。

洪：剛才在講到「旁若」的特殊造字時，你原先提的是屬於正典文學

場域的喬伊斯。在這個例子，殺怖洛(Shambleau)的造字法也是作者獨創的「怪物分子」，似乎也凸顯了莫爾想要「字造字」的企圖。也就是說，她沒有直接拿既有的戈爾貢(Gorgon)和梅杜莎(Medusa)來用，也不是把蛇髮妖視為一種神話中獨立存在的超自然虛幻，反而把「殺怖洛」當成了一種物種(species)——那些在「我們」之內的它者都可能是殺怖洛，而不是主角西北史密斯這個硬派星際牛仔認為的邊緣化非／生命體。不管它是什麼樣的非／生命想像，它都是一個整體或「共同體」，不是個體單獨的存在。

廖：我覺得〈殺怖洛〉很有趣是它「旁若」了梅杜莎的原型，把殺怖洛當成了比梅杜莎更早期的東西。其中跟「旁若」有關係的是其中的微分子化：改變主／客體、男／女、陽剛／陰柔。它是整個被觸手包在裡面，一種內外翻轉，打破了內在與外在，外層打開就是一堆紅蟲般的東西。

洪：對！也就是說，一般而言，科幻讀者都認為後人類談的是「接合」(用什麼接什麼必須清楚區隔)，但這個故事(或是其他早期的怪譚)所想像的是一種分不開裡與外、內核與外觀，一旦掀開是一整團黏在一起的狀態，而這一團東西可能會長出一個美少女；如果它也有一個寄生與被寄生的關係，那個類似美少女的生命是寄生在這一團蠕動紅蟲的客體。因此，看似是美少女的軀殼(外層，主體)其實是寄生物，裡面看似是怪物性的東西還比較像是宿主。

廖：我自己的認知是那個女性的外貌已經有點像外星人的樣子。它一開始是綁著一個頭巾，但後來就知道那個外貌其實就是由觸手構成。最後西北史密斯的好友亞羅(Yarol)來救他。亞羅來的時候發現西北史密斯被包在整堆無以名狀的東西內。再次說明殺怖洛其實是沒有本體跟客體、內在與外在的區別。

洪：或是更進一步思考，也許史密斯只是幸運。裡面那一團到底包了多少個殺怖洛呢？裡面到底只是單個，還是複數個？會不會殺怖洛這個物種集體都是藉由不斷吸納不同的物種而長成的？

廖：就是單一與複數(物種)共同之存有(being singular plural)。

洪：這裡或許還可以套用在現實時局上：我們看似不斷讓新的詞彙寄生到我們的文本，加上我們在做的理論實踐不時會被主流女性主義視為不良物，或是你剛提的似不像(not so much like, but sort of like)。例如，我在教「同志研究」這門課時，這兩年的課綱會有收錄在耐澀(Joan Nestle)《性別怪》(*Gender Queer*)這本書的一篇文章〈二十種蒙混過關〉(“Twenty Passings”)。我們可以把裡面介紹的諸種介於雄、雌之間的性／別主體，用「似雄非雌」或「彷彿雌雄」的說法形容他們——看似像雄，卻不是雄，或是反過來。但是你又不能因為他不是雄，就叫他是正典的「雌」。這時我們就看到了「非雄非雌」的「雙非」概念，而這兩種「非」不但不會相互抵消，反而形成了一種「不內不外」的「旁若」場域。有趣的是，我們不能用「介於」A與B的兩種整齊空間「之間」去理解這樣的「雙非」，這樣的「似」與「非」混合物是用更奇怪的方式去包覆、侵襲A與B兩個二分領域。就像剛剛提到的怪譚這種「低俗」文類，它就可能用一種不入流的方式包裹了那些正典、寫實，甚至是自身所屬的「低俗」等文類場域。可喜的是，我們這個專題的諸篇都觸及了這樣的分析，也符合了我們在籌劃這個專題的理念。

四、旁若的多重宇宙：文類的博弈、競逐與裂解

承前一節的尾端洪凌談及此次「旁若專題」的在文類與政治場域的核心關懷。廖勇超則請洪以自身論文處理的幾篇小說為例，闡釋自己是如何處理文本裡的「旁若性」。洪摘取了〈人外與「外人」〉裡分析之巴爾克(Clive Barker)的《黑暗伽利黎》(*Galilee*)，並分析該小說是如何呈現了怪物性與人性的相互隱喻，也以此構築出一種異質的時空地景。接著洪回憶起將近十年前主辦的一場「旁若」圓桌論壇「地盤解離與非正典領域重構：台灣脈絡下的旁若文學干涉與罔兩眾所有權」，當時有兩位與談人對於看似位於相異的兩端，卻殊途同歸地在競逐何種書寫符合「科幻」的兩種論述，提出「旁若」的多重宇

宙(multiverse)特質：不同的書寫形式與內容皆同時處於對抗常態性，以及相互博弈的動態辯證之中。廖更以前文「寄生生物」的概念為連結提出了自身的觀察，認為「旁若」其實是與各式文類共生演化的概念，根據寄生場域的不同而能夠生長出不同的面貌。廖的說法也讓洪進而詰問在「旁若」的多重攀附性之「外」，是否有異／溢於當前「旁若」書寫的其他可能性。

廖：我想請你談一下你在此次專題論文所分析的幾篇小說。

洪：我分析的其中一個文本，作者本來是寫怪物性的恐怖起家的，是赫赫有名的巴爾克。他最知名且改編成系列電影的作品是《養鬼吃人》(Hellraiser)。這個系列電影塑造的怪物性是往外擴張的，以至於每一個地獄使者儘管都很猙獰，但都是很具體且清晰。但當他寫到我在專題論文分析的《黑暗伽利黎》時，我讀到他意圖處理兩個氏族(clan)若即若離、相生相負的怪誕：一個是被整合到極端異性戀資本主義系統的葛瑞族(The Geary)；另一個是無時間性、居於太初式(primordial)時空的巴巴洛絲族(The Barbarossa)。然而，後者也是與時間流動並存，所以彼此之間有一種時間性的平行(para-llel)對照。這兩個「人外－外人」氏族帶出的是微妙的怪物性與成功「成『人』」的兩種隱喻。貫穿全書是不死的主角伽利黎(Galilee)(也是源自《聖經》裡的同名人物)，他所屬的氏族(巴巴洛絲族)發源地被巧妙地設定在介於非洲與中東之間，而他成為「超現代性」(meta-modernity)的葛瑞氏族女性之間的性慰藉(慰安夫?)。至於巴巴洛絲族居住的時空，彷彿與世界的其餘(the rest of the world)，或跟稱作現代世界(the modern world)的場所很不一樣。

回過頭來，我認為值得慶幸的地方在於，我們一開始不盡然會預設這次的專題會收到何種作品跟何種關懷的取徑，但收錄在專題的這幾篇論文都以不同的方式，探討何謂無意識裡「文類的政治」，或稱政治裡「文類的裂解」，而不是在說「我們是在談哪種類型的科幻小說」。

如果不提其他期刊，就講《中外文學》好了，《中外》在九〇年代製作

了一期很經典的「科幻」介紹，用一種很「學院」、很「正統」的方式介紹所謂「黃金時代」中「男性」大師科學／實證主義式的作品。

廖：中外曾經有一、兩期在談論科幻。

洪：尤其是1995跟1998的兩期。第一期的主旨像是引介已經被學院建制化過後的「科幻」定義與綱領。說到這，我聯想到2011年在中興大學規劃了一個有關「旁若」的小型會議，最後一場是論壇——「地盤解離與非正典領域重構：台灣脈絡下的旁若文學干涉與罔兩眾所有權」。在這論壇中，與談者之一的推理評論人以含蓄和善的方式，告訴我與另外一位主辦人林建光（以及聽眾與講者們）說，他很高興他被「包括」進去了，他自己清楚知道在座大部分的各位其實都是做「科幻」的。我原先並沒有這個「包含」的意思，我只是想找一些像非創作者，也非學院內的評論者來參與這個論壇，進行交涉或辯論。結果看似形成了兩種在競逐何謂「旁若」的發言出現。推理評論者的提問預設了科幻的核心要素，如果用身體做比喻，就是「頭」最重要，其他部分都可以被替換。換言之，這種提問似乎想表達的是：「說穿了，科幻研究覺得其他的類型都可以是其餘的器官，但只有『科幻』才能是「頭」吧。」至於另外一種，也是來自一位非學院的評論者。他的說法就剛好倒過來：用一種非常謙虛的方式表達他只是個碩士，但是碩士學位是最正統的「科幻研究」，也就是比起學院搞旁若的人更是「行內的粉絲評論者」(fan critic insider)。我自己偏好用「幻設小說」(speculative fiction)一詞。這個詞彙來自美國七〇年代新浪潮的科幻作家（兼雜誌主編）——梅若爾(Judith Merril)的提議，當時一些自認排斥實證科學主義的雜誌主編選擇用「幻設小說」(speculative fiction)取代「科幻」。在某個時間之後，我傾向於選擇用包容性更大的「幻設」來包覆「旁若」與「文學」的概念，試圖把那些看似卡在學院跟評論界之間的很多不夠「科幻」或不夠「奇幻」，但可能是從這兩造之間突變出來的作品都包裹進去。剛才提到的兩個與談人的這兩種說法，從「旁邊與彷彿」的視線看來，是不約而同地在搶奪何謂「真正的科幻」，或是對文類定義的主導權。

當我們在談「旁若」時，有些類似戰國時代的「各擁其主」，在各個「主(導)」範式之間，代表的是各種由不同文類組成的軍隊。這些軍隊不斷地試圖與主流位置做拮抗與鬥爭，彼此也認為自身在「旁若」多重宇宙中所分配到的資源並不均等。我承認在舉辦那個圓桌會議時，我們也忽略了可以姑且用「各種文類」的說法來包裹進去的論題，像是武俠、羅曼史的論述等等。所以「旁若」一定會依照不同寫作者的想像，而有不同的轉換。這時候我們要問的就是：「他們所再現的是哪種『旁若』」，而非「何謂旁若」。

廖：我這樣聽下來，「旁若」好像是一種範式而沒有什麼實質的內容。像是電影《異形》系列(*Alien Series*)所呈現的共生演化，寄宿在外星生物上、在人身上、在《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的「工程師」(engineer)就會分別長出不同的東西，「旁若」可以寄生在不同的文類上。它不會是一個既定的內容，不一定是既定的文類，科幻或是武俠。

洪：我甚至有種感覺是，用我們在《異形》的前四集看到的內容比喻，就如同我們必須要像是「科幻」才有能力去創造出自身的「旁若」書寫，但是到了《普羅米修斯》裡面就變得不太一樣了，就好像是說我也可以跟各種「非人類」的怪物結合。但我目前還不知道「結合性」是否可以完全取消文類框架，或是何種結合比較有「旁若」的可能性。我們目前在論文的書寫中還是有一些偏好。作為旁若研究者，可能越會著迷於那些與既定常態性(normativity)做出區別與拮抗的，或是非常態性(non-normativity)變成如殺怖洛一樣，把常態性包裹成一團的混亂書寫，但也並不代表在這些之外就並不存在「旁若」的可能，它們呈現的可能是更加複雜的物種或關係樣態，這些都有待我們發掘。

五、當代台灣(類)旁若書寫中的外部想像及其侷限：以妖怪書寫與《返校》為例

編按：兩位與談人在本節將「旁若」書寫的焦點放回當代台灣的時

空脈絡裡，進而探究當前諸多的妖怪地方誌研究是否具有前文論及之「旁若性」。兩人指出這些妖怪書寫過於仿效日本妖怪研究的方法學與視覺修辭，較缺乏對於內於方法學的日本民族主義有反省，且在台灣內嫁接了當前許多進步份子亟欲建構的「台灣性」(Taiwan-ness)想像。兩人亦由妖怪書寫連結到近期熱映的恐怖電影《返校》，不謀而合地認為不論是台灣妖怪學還是《返校》，都僅想像了一種排除「外」(此時國民黨與共產黨被當成了「外部大異己」的同義詞)的內部性。洪引介了巴特勒(Octavia Butler)的小說《模式者》系列(*Patternist Series*)與《莉莉絲的後種》(*Lilith's Brood*)作為對照，指出巴特勒的書寫價值在於她並不急於將任何「惡」推向任何外部物種，反而以「旁若」的世界構築(world-building)的方式，涵括了混雜異質的生命樣態。

廖：我有點想問一個可能會讓討論變得有點政治不正確的問題，你覺得台灣當代有沒有人在做這種文學的實驗性？

洪：我剛剛好像有稍微提到，就如同那種民間的台灣百年妖怪書寫，我認為他們好像想要從短篇怪譚小說的方式(比《聊齋》還短)去介紹那些屬於台灣本地的妖怪……

廖：他們現在處理台灣妖怪的模式，不管是民族學的模式或是漫畫，似乎都來自地方誌或是日本人來台灣收集的一些資料。

洪：所謂「美好的」1930年代。

廖：對。但是整個行銷和寫作模式都和我最近收集到的日本相關妖怪的研究書籍或出版品很相像。它們不管是在行銷、印刷、呈現模式上都非常相像。在很多層次上，這些台灣本土化的妖怪書寫(有人甚至用台灣的妖怪做出台灣地圖)採用和日本雷同的模式可能會有很多的問題。事實上，日本從明治時期開始，井上園了就開啟了民俗學式(folklore)的妖怪研究，一直到後來的柳田國男，甚至是現在的小松和彥都還是走這種民俗學的模式。

洪：對，他們不想把妖怪拉到與寫實的「臺灣民間性」有斷裂的狀態……

廖：在日本，這樣的民俗學研究其實和日本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的建立息息相關。這些民俗學研究統合了日本各地的民俗和怪物傳說，並用這些資料建立日本的國家想像。這樣的做法和明治時期，日本試圖去建立自己現代國家的形象有關。不只是日本，西方民俗學的建置也和西方民族國家的建立有關。所以當妖怪書寫和研究被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收編後，其實就失去了作為「旁若」該有的政治批判力道。

洪：我覺得與其說是政治批判，不如說是讓它重新鞏固國家獨一無二的民族性。而且日本的野心更大，無論它的左翼或右翼都想像了一種日本與「泛亞洲」(Pan-Asia)的政治集體性。所以，剛才你提到為何現在的妖怪研究都想建立一種地方誌式的「台灣性」，我看到有些漫畫特地選擇台灣本地的傳說，但都是以1895年開始的日本殖民(或稱文明治理)為基礎，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空與物質條件下，才有這些志怪傳說的出現。而且在畫法上，他們也使用某種復古又日式的少女人物風格。我目前想到的幾個出過一系列台灣妖怪專書(創作、研究或漫畫)的出版社有：原動力、奇異果、逗點、海穹，還有台北地方異聞工作室。那些想要塑造一種台灣特有的幻異地景的作者，大致都在這幾間出版社。他們所想像的「地方性」是有時間條件的：雖然是身處二十一世紀的繪畫者或創作者，但一定得選擇二十世紀的上半葉，而且不能是國民黨來台之後的時空。就是說，他們想像的幻異世界是不存在國民黨台的時刻。這也就與剛剛談到的「裡外不分」概念脫離了。

廖：這段時間之後才出現的妖怪沒有很多。反而是類似《返校》的鬼、怨靈和冤孽題材比較盛行。

洪：對，而且是「非物質性」的存在。比如說一種惘惘的，未被物質化的存在。既然說到《返校》，不知道你記不記得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在寫《馬克思的幽靈》(*Specters of Marx*)時提到意識形態(不管是我們所支持的，還是敵對的)時常會無形中召喚出幽魂般的存在：那種

既不是在物質界，又不是反現實的陰森魅影。《返校》的命題就是只要做了什麼反國民黨的實踐，就會被處決，然後變成幽魂。對我來說，這種想像是非常反唯物主義的，也無法與白色恐怖的歷史從事對話。這個命題（幽魂與國族建構）也許是「旁若文化政治」應該直面看待和回應的，也就是說，我不認為這部電影挪用了「冤死鬼魂」的元素，就具有「旁若」的基進性。

廖：所以你覺得這部電影沒有「旁若」的批判力道？

洪：這部作品想像的鬼魂是很直線公式的想像：因為是冤，所以有冤孽（the wronged people will turn into wronged ghosts），而且處決也必須是「冤」的、「錯」的，所以這些冤魂不能是「對」的，也就是他們全都不是共產黨，都是委屈的臺灣良民。按照那時候的意識形態是「共產黨就該被處死」；如果挪用馬克思幽魂的比喻，真正死於白色恐怖的共產黨員連幽魂都無法成為，也不值得存在，因為他們都不是「真正的」幽魂。照現下台派的邏輯，他們認為不可能有誰真正嚮往跟中國共產黨從事同一志業，所以這些被處死者必然都是冤的、假的、錯的。可是這些「冤」取消的正是 1946 到 1947 國共戰爭的歷史和物質基礎，以及之後的所有台共。因為這些東西都不是台灣人（的）。外來的馬克思或是中國共產黨都不值得用幽靈的形式存在。

我們好像突然間講到「台灣因素」了……還是回到這個專題。

你剛剛說到政治不正確，我想到的是，有些旁若文學是命題與內容的拒絕政治正確。我從大學就開始喜歡的非裔科幻作家巴特勒，就是顯例。我剛接觸到巴特勒時衝擊很大，那時候是讀她的第一個系列小說：《模式者》系列。一開始讀她的小說時，我還想找出「去殖民」的可能。因此，那時候雖然知道黑人當然是複雜的，不該被溫良刻版化，但我很震驚於黑膚色者被再現為「渾然天生的偉大惡」。巴特勒卻反倒在《模式者》系列寫出了一個非洲男性的大惡者斗羅（Doro），一個不死者與暴君，不在常規時間內的存在，還有另外一個主角是安恩胡（Anyanwu），與斗羅成為抵抗／平衡模式的卓絕非洲女性巫師。整個《模式者》系列都在談論

這兩者世界觀的衝突。這系列小說刻意不管所謂的政治正確的反／去殖民，反而聚焦於處理非洲式的世界構築(African world-building)，我猜想作者認為不需要為了反抗殖民主，就把外來的、複雜且深刻的「惡」的化身投注為白膚角色。巴特勒的另一個系列《莉莉絲的後種》裡和人類交換基因的外星人翁卡利(Oankali)也是類似的異質／溢出物。翁卡利不斷地與其他物種進行基因交易，而這些林林總總的混成逐漸都變成「似不像」，後來所生產出的構種(construct)也是似人但又不像／是人的混合生命(compound life)。翁卡利的家庭形式是五個家長：人類雙親、翁卡利雙親以及第三種性別的烏洛伊所構成(ooloi)。烏洛伊相當迷人，它是不斷地在蒐集且變化，非此非彼，是擁有「不可名狀」可能性的存在。當烏洛伊接近了不同的環境或不同的人就會不斷地變化，同時它和環境的互動也會造成環境的改變和動盪。可是烏洛伊是否就是所謂的「後人類」呢？它並不像是現在典型的賽伯格或是海爾斯(Nancy Katherine Hayles)所論證的後人類(posthuman)。巴特勒更強調的是肉身性(carnal, material)。《莉莉絲的後種》這套小說有兩個名字，一開始是取作《異種創生》(Xenogenesis)，因為小說描寫了外來者的到來，因而「創生」了各種新的生命樣態。後來的名字《莉莉絲的後種》則強調了主角莉莉絲的重要性與她名字的意義。莉莉絲(Lilith)這個名字又有很多的指涉。同時“Brood”(種巢)也是一種非常去人類的說法。回到你剛剛談到的台灣妖怪學，至少以我粗淺的認識，我覺得你的批評很對，這些作品所形構的「怪」與「談」，很難不跟作者的國族偏好、時代性與治理模式接合在一起。

廖：我自己的想法是，這些妖怪研究不是不能這樣做。但不應該這樣硬接，例如台灣妖怪加日本畫風。我還是比較希望看到「旁若」的微分子層次出現在不管是美學或在外顯的輪廓上，目前的研究讓我覺得都還不具備「旁若」的潛能。

六、重思連結主義的限制與「人無關緊要」(Humans Don't Matter)的世界

編按：在末節將「旁若」的討論接合至學界最近對「連結主義」(correlationism)的反思。廖提到若古典的「旁若」怪物書寫已經再現了連結主義的失效，能否思考一種並不建立於「旁若」與宿主產生若即若離關聯的可能。兩人接續著薩克爾(Eugene Thacker)對思維的討論，分別提出脫離人類理解而能夠自我演算的人工智能(AI)以及班克斯(Iain Banks)「文明體」系列小說中自我增生且操作玩弄人類的「心智」(Mind)。接著，洪亦以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短篇小說〈比帝國緩慢且遼闊〉(“Vaster than Empires and More Slow”)舉例，人類／動物性心智其實無法相互共情，以致於只可能倚靠其他媒介與系統來進行心智交換，回過頭來置疑是否真的能有全然斷開所有關係性的一刻。洪更以黑洞作為比喻，認為「旁若」得以保有一些「對關係的拒斥」的同時，也能讓我們重新想像一種仍以壞連結為前提的敗、爛、腐等可能。廖則回應這樣的壞、爛、腐的連結性在以創造為目標的德勒茲(Gilles Deleuze)理論中比較是負面的例子，雖然這種腐壞連結可能具發展潛能，但也可能會產生倫理問題，因此對這種腐敗連結是否還能稱為一種關係仍有所保留。最後兩人以此為切面，重新對齊澤克(Slavoj Žižek)談及「崇高意識形態」(sublime ideology)時認定的一種不斷且早已成為活死狀(the always already un-dead)之怪物性，與近來在性／別研究領域興起一股熱潮的「腐文化」進行商榷，試圖開啟自身對此次對談，甚至是「旁若」的警惕與期許。

廖：最後我想把「旁若」的討論放在連結主義的限制。因為最近學界中常常提到連結主義的問題，梅亞蘇(Quentin Meillassoux)或是薩克爾等人的理論似乎可以讓我們反省「旁若」這概念的限制。梅亞蘇他們這一

派強調反連結主義，不想要關係上的連結。他們的說法可以讓我們想到比較古典的怪物呈現，比如洛夫克拉夫特或是馬欽 (Arthur Machen) 的小說。在這些人的小說中，以人為中心，想要和非人世界做連結的舉動通常都會失敗：這些角色到最後不是死了就是瘋了，不然就是角色們會在小說結尾表達他們因為受不了非人世界的恐怖，所以等一下就要去自殺。這些小說其實就是在講連結的不可能。

洪：我記得這就在我們第三場「媒介研讀班」中談到的問題。在這些小說中，雖然敘事的人類常常用一種看似人類本位的方式嚮往著「蔓漶恐怖」(cosmic horror)，但最後的結局也再現了一種非關係 (non-relation)。尤其，這些角色體悟到當他們把故事寫完之後，他們就要自殺了。這有點像是連文體形式也表達了一種非關係性，整個文本就像墓誌銘般；就像是即將成為屍體的敘述(者)是長在無能為力連結邪神與無法言喻的恐怖之上。

廖：但我後來發現很多人都和洛夫克拉夫特的寫法十分相像，像是《德古拉》(Dracula) 也是，有許多情節都發生了角色交了自己的故事後，就表達自己要跳下懸崖或要自殺。姑且先不把這種寫法視為那個時代的寫作範式，我們或許可以看到這些小說裡所提出的連結主義限制。我們可以談回剛剛的問題，如果「旁若」仍建立一個和宿主若即若離的關係上，那我們如何去思考「旁若」中是否存在著關係斷裂的可能性，也就是外於「旁若域」的「旁若」；又或者換個方式問，如果「旁若」可以不建立在關係上，那又會是怎樣的「旁若」；沒有關係的「旁若」會不會就解構了「旁若」自身的立基點？

洪：應該說，「旁若域」會長出「超旁若」(meta-para)。它以各種形式將自身拔除，外於看似必須有關的「宿體」，突然不知道 (unlearn) 自己原先的生長源頭，然後無法以物理時間與空間的常態定義解釋，「超旁若」可能在「旁若之前」或「旁若之後」莫名就出現了。另外一種講法是說，「旁若」的思維 (thought) 到底是什麼。如果依據薩克爾所言，是否沒有這個所謂的「思維」？我其實對薩克爾講的東西大致沒什麼反對，但

換個角度想，他是否也無形中把「思維」視為是一種以人為本的概念呢？這樣就讓我無法百分之百贊成了。難道思維就只能是單數的嗎，又或者思維就一定沒有它的「旁若域」嗎。連我稍早提到以梅若爾等為主導的美國新浪潮科幻作家，雖然常批評科幻小說在過去將實證科學主義視為一種文類的書寫典範，但至少不會去否決「科幻」可能突變出它的「旁若域」之潛能。那為何會有一種純淨的、只屬於「智能人」的想像緊黏在「思維的界限」這概念呢？

廖：我想到最近的一些議題，比如說人工智能。如果人工智能是一種建立在演算法(algorithm)的「旁若」，它也就會有自己的思維。最近就有個新聞：馬斯克(Elon Mask)最近成立了一間公司叫「神經結」(暫譯)(Neuralink)，這個公司想要做的事有些類似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希望用微創的手術在人腦的表面上形成網絡。這作法等於把人腦罩住之後，用很細的光纖去接觸腦神經元，這樣就能透過晶片將大腦連結到3C產品中或與AI結合。當然這個和人腦仍有些關聯性。但如果是提到人工智能的思維過程，我一直覺得最終人工智能的思考與創作會脫離人類。也就是說，不管是哪種演算法，我們可能都不會知道有什麼事正在演算的過程中發生。

洪：大概就是人類極限所抵達不到的維度，演算的過程發展出特異性(singularity)。

廖：對，我們沒辦法知道，因為我們只是把它當成一種工具在使用，我們只能看到結果。可是它裡面演算的過程，比如說電腦中1010或手機的電流怎樣去運作，我們根本不可能會知道。

洪：那就是到達所謂「寫程式」的盡頭，也就是當程式自己增生(proliferate)、長出觸手的時候，程式設計師就跟不上程式了。我講一個類似的例子，蘇格蘭小說家班克斯在他的系列小說《文化體》(The Culture Series)，設定了一個物質豐沛到讓分配早就不是問題的超宇宙，其中最大主宰的力量是一群「心智」(Minds)，而且，牠們不是單獨的個體，而是大寫心智，其中黏附了很多小寫的心智(minds)。這些心智包括原

生有機生命，以及只有第一個可能是人造的數位生命，後來增殖的都是第一階段心智們所增生出來的。在這系列，這些單一有機生命無法想像其「森羅萬象」的心智，號稱是生命(包括各種物種)的「照顧者」(caretaker)，而且這裡的「照顧」不是那種人類主義想像的呵護撫育，而是腹黑愛玩，充滿反諷地玩弄人類(在這個超宇宙甚至不是最高等有機生物)於股掌之間。所以對班克斯來說，程式不會只是被人類創造的心智，更是很多外來物混雜與四處接合的結果。這可能可以回應到你講到當人工智能成群之後的現象。

廖：所以就有可能當「旁若」到達一個層次之後，就可能產生關係的裂解。就像你說的，到了一種「特異性」之後，它可能就和原先的宿主產生斷裂。

洪：這個時候就可以講回我們這期專題其中一篇論文處理的小說，同樣是巴特勒的小說，但是她的《寓言》(Parable)系列(《撒種的寓言》(Parable of the Sower)與《才幹的寓言》(Parable of Talents))。這系列也在講一種「即將到來」(to come)的狀況，因為主角是一個不斷在過多的、人道主義者所稱許的共感／同理心(empathy)受苦的異人，這種過剩的共情非但不正面，而是已經成為一種疾病。這也讓我想起最近重讀勒瑰恩的一篇故事〈比帝國緩慢且遼闊〉。在這篇小說裡，擁有巨大共感能力的超能力者歐思登(Osden)，認為人類的心智與自己的心智是不相容的，而且他人的心智對他而言就如同「穢物」(噁心的異己)一般難以忍受。由於此種超能力，他不想沉浸在這些穢物都不可能！在勒瑰恩的描繪下，那個被同儕視為不值得同情的超能力者找尋人類／動物性以外的心智(例如，植物性的)作為自身心智的歸宿。回到剛剛你講到，最終會不會「旁若」之間變得無法相互理解。我倒覺得與其說是無法理解，不如要問的是：他們是以哪裡為出發點，或者說，各種「旁若一域」之間會不會劃定某種界線呢？譬如你提到，有些反連結主義的論點就是覺得「連結」會陷於常態的人類慾望……

廖：對，就是一種很常聽見的說法：「人跟人還是要互相扶持」。

洪：我覺得人與其他物種也會有類似的問題。像我常自己騙自己，我一定很懂我的貓伴侶，其實應該並沒有，而且即便我自認最愛的對象是他，但他與我的連結(rapport)程度可能只比常態人類之間要多出一點點額外的不可言喻物。不過，當我聽到黃宗慧等學者倡議跨物種生發(inter-species sympoiesis)的可能性時，還是會蠻動容的。動容之餘，我也會吐槽自己，不是說我非常討厭任何「悅納他者」的狀態嗎？我自認只能達到有限的「綁定」(bonding)，但換個角度來說，又有誰可以百分百的敞開呢；跨物種之間接合之後，就可以順暢無阻乃至合而為一嗎？或許最極致的共生發，只是物種之間些微的「知道有個誰在他方」。話雖如此，我不覺得要完全拒斥連結，只是我的解釋是很淡的：「可以偶爾接觸一下就好啊。」但我也知道，對於梅亞蘇或薩爾克那一派來說，這樣就已經是一種必須斬斷的連結了。

廖：我覺得他們批評連結主義的時候，不會太強調強度的問題……

洪：他們比較強調「有或是沒有」。有就是全有，要完全沒有才行。

廖：比方說，我在此刻就已經和很多東西產生連結，諸如空氣、桌子等等的東西。但這個連結也是動態的。如果我今天走出去、去上廁所、結帳，整個連結的狀態都會有所不同。但是，去挑戰整個這樣的概念才是梅亞蘇他們想要做的事，所以不只是很單純的跟伴侶的關係，而是一個去挑戰將宇宙視作一個整體的概念，也就是要去想像連結之外的一種斷裂。

洪：連結「之外」的斷裂，就如同現今廣泛概念化的「暗物質」(dark matter)。如果說，關係的建立倚靠的是「正物質」(positive matter)；一旦我們遭遇到如黑洞般的暗物質時，關係性就可能被收束掉。這也讓我想到嘉蘭(Alex Garland)的電影《滅絕》(Annihilation)，還有班森(Justin Benson)與穆赫(Aaron Moorhead)合拍的兩部邪神體系電影——《魔物戀人》(Spring)和《永劫》(The Endless)。我覺得這幾部電影有一個有趣的共同命題：他們都在談關係最後的釋放，以及回到原初狀態的可能性。尤其是《永劫》，每當二十年，三個月亮在頭頂連成一線的時候，被邪神收

「攏期中的生命團塊就必須再輪迴一次，一直無限重複下去，甚至裡面最短的狀況是五秒就輪迴一次，這是我覺得最可怕的一幕。因為你的一切是物理時間的五秒就必須重新來過一次，而且當事人也充分體會到永無止盡的「五秒—永恆」。這種恐怖感就回應到梅亞蘇一直在思考的：科幻「之外」(extra)是什麼？「之外」會不會就是「關係」是「不關係」的時刻？例如，五秒就滅掉然後重來的一個時光膠囊？

廖：我覺得你把這個關係比做黑洞很有趣，尤其是最近剛好最近拍到了黑洞的照片。

洪：對，因為我們以往一直以為黑洞是具有「洞」無限涵括性，但其實不然，它是有拒斥性的。如果用這個概念去談不管是理論性或創作的「旁若書寫」，我的確認為「旁若」保有相當程度的拒斥性是非常應該的，或是拒斥成份本身可以帶出一些可能性：如果說我們產生了一種發炎反應，讓我們的關係看起來不再美好，而是腐敗、潰爛的狀態，那這種「壞」、「爛」、「敗」所產生的連結，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一種雖在連結之內，但還是會不禁懷疑「它還是連結嗎」之相關可能性(而且，這種「壞連結」已經不在「反連結」的想像之內了)。

廖：對啊，因為德勒茲的概念大部分都比較正向、都希望能有創造性。但當然還是有些例外的狀況。當德勒茲在寫到無器官身體(body without organs)的時候，有提到身體進入到塌陷崩壞的可能性。當然他也是把這樣的狀態當成一種「例外」狀況。然而，或許朝這個方向去想，可能可以提出壞的、醜的、爛的可能性。

洪：讓「美」的想像變得不一樣。

廖：對，當然會有一個問題性……

洪：完整感被縮限。

廖：那個塌陷的狀態，我想不是我們目前能夠處理的，因為如果去提倡這種塌陷的狀態，可能會產生倫理上的顧慮。

洪：應該是說，不管在創作層次或是學術層次上的「旁若」書寫，其實要更大膽一點。但如果假設要對任何關係去限縮或截斷的話，我也

覺得不太可行。比如說，我覺得那種「以整體(人類)物種(for the better of every (human) being)福祉為考量而必須要做一些什麼事」的修辭，其實比這種小小關係的層次更有問題。或許這就是齊澤克所說的「崇高意識形態」所創造出來的東西。當然齊澤克很曖昧，他認為有兩個「東西」(Das Ding)其實是不死的；而他對不死概念的定義也很曖昧，他的不死概念是從拉岡(Jacques Lacan)的「重複欲力」(endless drive)而來。第一種不死就像是薩德(Marquis de Sade)所創造出來的施虐文學場景：不斷被折磨，但又是光潔不留疤痕的昇華受虐體。另一種則是共產主義(者)的不死：對齊澤克而言，共產主義者是「另一種生命」，總是「不一死」(deathless and un-dead)，會製造出怪物般的存在。我是不完全知道為什麼除了薩德，他在各種意識形態當中只挑出共產主義，這背後可能也有些他的政治無意識。

廖：這可能跟他的政治立場有關。

洪：我比較喜歡的也是齊澤克的前三本著作，比如他解釋國家主義所製造的崇高(sublime)是什麼的時候。他說共產主義之所以不死，好像是因為它已經早就死不了(already undead)。可是在蘇東政權垮倒之後，經過二十幾年到現今，那個不斷成為活死狀且被民主世界視為「共同體大敵」的黨國，在亞洲東方反而長出某種有潛能的怪物性。這是當前文化政治該好好分析的現象。但是當前不死的中國共產黨國也有一個反面的「旁若域」：不斷滋生暴漲的，一個以進步、人性、民主之名的「物」(Das Ding)。不死的共產黨既是宿主也是寄生，不斷地長出自己的旁若域。

廖：那個在拉岡的脈絡應該就是剩餘絕爽(surplus jouissance)的問題。

洪：現在就是中國這個符徵－(怪)物，不斷增生，而它自己是寄生物，也是宿主，就是結束不了。它一直被進步派與保守派的西方所詛咒，希望它像蘇聯一樣消失，成為共產主義的幽魂或是活死狀，但是現在還沒有到達這個狀態，這也讓我想到德勒茲比較少人談的著作《受虐狂》(Masochism: Coldness and Cruelty)，對他來說，受虐狂獨特的性欲是

一直類高潮，持續拖延(deferral)。這時我們能提到不斷類高潮的另一個文類：「腐／Yaoi」(やおい)。

廖：但是，有時候我們需要非常小心這樣的無法結束，因為有可能是種重複衝動(repetition compulsion)的問題。

洪：「腐／Yaoi」很容易被奇觀化，尤其是近幾年在性／別的論壇上，即使是超夯的怪物都沒有談腐來得受歡迎。

廖：如果把「旁若」拿到腐這邊，就會有很多的問題可以討論，因為腐這種文類的出現本來就是來自一種「旁若性」。

洪：因為腐這個字本身就說明了「旁邊」與「彷彿」。它應該是爛掉、敗壞；但這些爛掉的主體(腐一人)卻是本來應該成為正面生命製造者，也就是被視為擁有生命創造能力的「婦一人」。

廖：在日文的脈絡中，腐是腐女子／婦女子(ふじょし)，腐的意思就是「沒救的」；我讀這種東西就是沒救的，所以腐在一開始是一種自嘲。

洪：對，但是你會不會覺得「沒救的」跟「爛掉的」在意象上雖然不是完全一樣，彼此間卻有一點關聯性。我覺得是兩種民族性的差異帶出對次文化的不同態度。

廖：不過我覺得腐現在幾乎已經不具備任何「旁若」的基進性。

洪：如果是二十年前的那個腐還可以有些可能性，現在的腐已經變得有點像「撫慰」(comfort)，就是沮喪的時候狂吃。

廖：所以這個東西是要被處理的問題。

洪：可是我也在想，或許在狄蘭尼或劉人鵬寫這些論文時，不一定會批判這件事。至少在狄蘭尼(因為劉人鵬那篇是她第一次處理旁若文學，所以焦距還是放在酷兒跟科幻的關係上)的脈絡中比較明顯。狄蘭尼那篇文章恰是聚焦在一些看起來很沒救的文本，他不去談他幾本成就最高，而是去談幾本出版困難、化名出版，場景一樣是未來，看起來卻很絕望腐壞的小說。但其實他比較經典的作品也是有這個面向，比如說被稱作科幻界《尤利西斯》的《戴爾格林》(Dhalgren)。從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也都是再造過後的字。不但是字是造的，他的整本書都當成字

(字體、字母、文法等)在打造。他的第一句就不是完整的句子，而是某個句子的後半：“to wound the autumnal city”。最後一句也是半句，呼應書開頭的前半句：“I have come to”。如此的「句型」與文法讓這本小說成為一個巨大的環形場域，收在一個句子之內。

廖：對，跟《芬尼根的守靈夜》的“riverrun”一樣。應該是有點致敬。

洪：狄蘭尼這本厚重的旁若小說(不只是文類，而是小說也「旁若了!」)裡面的字(體)不但是自創的，小說的情節更充滿各種惡意與蔓漶，我第一次看的時候認為這是個「旁若宇宙」(para-universe)。你的解釋把原本較早的經典文學拿來解釋後發的旁若作品，在時間層(temporal order)的反轉真是很有意思，像是噬尾蛇。

廖：《芬尼根的守靈夜》事實上花費了許多人的研究，才讓現在的我們比較知道那本小說大概是在講些什麼。如果只看狄蘭尼的《戴爾格林》而沒去看《芬尼根的守靈夜》，或許就會覺得那個形式非常酷炫，可是其實那個形式和《芬尼根的守靈夜》是很類似的。因為《芬尼根的守靈夜》開頭就是小寫的“riverrun”結尾的最後一個字則是“the”，所以小說呈現的是穿過都柏林城市的利菲河(River Liffey)，整個小說就是呈現河流入大海，再循環的概念。

洪：《芬尼根的守靈夜》的造字學可能是要翻轉何謂「好的敘述」與「字與字的連結」。他不像是洛夫克拉夫特一樣，專注於造出一個個很難發音的邪神名字。到了尾聲，我們可以比較後設地去評斷我們這次的專題：不是以一個專題主編與期刊總編的身份，而是專題本身的幾篇論文，再加上一個蠻困難的對談。為什麼我們會想要用對談作為這次專題的結尾？

廖：可能對談本身就是一種「旁若」。

洪：這樣吧，就把這場對談想像成不是非得存在的關係者，但有了它，會為本專題著重的「旁邊」與「彷彿」等命題增加提問與趣味，製造出更多的「似不像」(類)場域。

引用書目

「地盤解離與非正典領域重構：台灣脈絡下的旁若文學干涉與罔兩眾所有權」Dipan jieli yu fei zhengdian lingyu chonggou: Taiwan mailuo xia de pangruo wenxue ganshe yu wangliang zhong suoyou quan [De/non-Territorization?: Paraliterary Interventions and Ownerships of Penumbra Multitude in Taiwan Context], 圓桌論壇 Yuanzhuo luntan [Roundtable Discussion]。 「台灣旁若文學理論」研討會 “Taiwan pangruo wenxue lilun” yantao hui [Paraliterary Readings and Meta-fictional Dynamics on Taiwan Science Fiction Study Conference]。論壇子題：「次文化／文類書寫作為微小『帝國』之返擊?!」Luntan ziti: “Ci wenhua/wenlei shuxie zuowei weixiao ‘digu’ zhi fanji?!” [Panel subheading: Subcultural-Generic Writings as Small “Empires” Striking Back?!]。台中：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Taichu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2011年6月5日 [5 June 2011]。

洪凌 (Hung, Lucifer)。〈怪誕邪神宇宙中的怪胎情慾政治〉“Guaidan xieshen yuzhou zhong de guitai qingyu zhengzhi [The Politics of Monstrous Sexualities in the Cosmos of the Weird and the Lovecraftian Horror]。2019 比較文學學會「媒介研讀班」研討會 2019 Bijiao wenxue xuehui “meijie yandu ban” yantao hui [“Mediation”: The Preceptorial Conferenc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of R.O.C 2019]。台北：國立台灣大學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2019年3月30日 [30 Mar. 2019]。

勒瑰恩 (Le Guin, Ursula K.)。《風的十二方位：娥蘇拉·勒瑰恩短篇小說選》*Fong de shiher fangwei: Ersula Leiguien duanpian siaoshuo syuan* [The Wind's Twelve Quarters: Stories]。譯：劉曉樺 [Trans. Hsiao-Hwa Liu]。台北：木馬 [Taipei: Muma]，2019。

劉人鵬 (Liu, Jen-Peng)。「在「經典」與「人類」的旁邊：1994 幼獅科幻文學獎酷兒科幻小說美麗新世界》“Zai ‘jingdian’ yu ‘renlei’ de pangbian: 1994 Youshi kehuan wenxue jiang kuer kehuan xiaoshuo meili xin shijie” [On the Margins of “Classics” and “Human”: The Gorgeous New World of Queer Science Fiction in Taiwan 1994]。《罔兩問景：酷兒閱讀攻略》*Wangliang wenying: Kuer yuedu gonglyue* [Penumbrae Query Shadow: Queer Reading Tactics]。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Zhongli: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exualities]，2007。161-208。

Alien. Dir. Ridley Scott. 20th Century Fox (USA). 1979. DVD.

Alien: Covenant. Dir. Ridley Scott. 2017. 20th Century Fox (USA). 2017. DVD.

- Alien 2*. Dir. James Cameron. 20th Century Fox (USA). 1986. DVD.
- Alien 3*. Dir. David Fincher. 20th Century Fox (USA). 1992. DVD.
- Alien 4: Resurrection*. Dir. Jean-Pierre Jeunet. 20th Century Fox (USA). 1997. DVD.
- Annihilation*. Dir. Alex Garland. Paramount (USA). 2018. DVD. [<http://dx.doi.org/10.5040/9780571351602-div-00000005>]
- Atwood, Margaret. *Oryx and Crake* (The *MaddAddam* Trilogy). Garden City, NY: Anchor, 2004.
- Banks, Iain M. *Consider Phlebas*. London: Macmillan, 1987.
- . *Excession*. London: Orbit, 1996.
- . *Inversions*. London: Orbit, 1998.
- . *Look to Windward*. London: Orbit, 2000.
- . *Matter*. London: Orbit, 2008.
- . *Surface Detail*. London: Orbit, 2010.
- . *The Hydrogen Sonata*. London: Orbit, 2010.
- . *The Player of Games*. London: Macmillan, 1988.
- . *The State of the Art*. London: Orbit, 1991.
- . *The Hydrogen Sonata*. London: Orbit, 2010.
- . *Use of Weapons*. London: Orbit, 1990.
- Barker, Clive. *Galilee*.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9.
- Butler, Octavia. *Clay's Ark*. 1984. New York: St. Martin's, 1984.
- . *Lilith's Brood*. New York: Grand Central, 2000.
- . *Mind of My Mind*. 1977. New York: Grand Central, 1994.
- . *Parable of Talents*. 1998. New York: Grand Central, 2000.
- . *Parable of the Sower*. 1993. New York: Grand Central, 2000.
- . *Patternmaster*. 1976. New York: Doubleday, 1976.
- . *Survivor*. 1978. New York: Doubleday, 1978.
- . *Wild Seed*. 1980. New York: Grand Central, 2000.
- Delany, Samuel R. *Shorter Views: Queer Thoughts & the Politics of the Paraliterary*.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P, 2000.
- . *Dhalgren*. 1975. New York: Vintage, 2001.
- . *Hogg: A Novel*. 1969. New York: Open Road Media, 2000.
- Deleuze, Gilles. *Masochism: Coldness and Cruelty*. 1967. Trans. Jean McNeil and Aude Willm. New York: Zone, 1989.

- Derrida, Jacques. *The Specters of Marx*. 1993. Trans. Peggy Kamuf.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Haraway, Donna.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Durham: Duke UP, 2016.
- Hellraiser*. Dir. Clive Barker. Anchor Bay (USA), 2000. DVD.
- Joyce, James. *Ulysses*. 1922. London: Penguin, 1992.
- . *Finnegans Wake*. 1939. London: Penguin, 2000.
- Montgomery, Stacey. “Twenty Passings.” *GenderQueer: Voices from Beyond the Sexual Binary*. Ed. Joan Nestle et al. Los Angeles: Alyson, 2012. 238-46.
- Moore, Catherine L. “Shamblau.” 1933. *Northwest of Earth: The Complete Northwest Smith*. Redmond, WA: Paizo, 2008. 17-48.
- Prometheus*. Dir. Ridley Scott. Scott Free Productions (USA), 2012. DVD.
- Stoker, Bram. *Dracula (A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Ed. Nina Auerbach and David J. Skal. London: Norton, 1997.
- Spring*. Dir. Justin Benson and Aaron Moorhead. Anchor Bay (USA), 2015. DVD.
- The Endless*. Dir. Justin Benson and Aaron Moorhead. Well Go USA (USA), 2018. DVD.
- The Matrix: Reloaded*. Dir. Andy Wachowski and Larry Wachowski. Warner Brothers (USA), 2003. DVD.
- Žižek, Slavoj.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1989.